

中共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48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

第四十八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3年·北京

(京) 新登字071号

中共党史资料(第四十八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 北京1929信箱 邮编: 100091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宫门前甲10号

电话: (01) 2581570 **传真:** (01) 258153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环球科技印刷厂

850×1168毫米 32开 7.875印张 150万字

1993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6000册

ISBN 7-80023-538-6/K · 516

定 价: 4.50元

目 录

文 献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

口头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 毛泽东（1）

中央关于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

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

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的通知和

毛泽东对决定稿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一日、二日） ……（55）

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

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一九五三年一月五日） …（61）

回 忆 录

缅怀毛泽东同志对湖北人民的关怀 … 曾思玉（65）

毛主席指导我们建设江苏 …… 江渭清（78）

回顾七大对我的深刻教育	戴镜元 (89)
我向毛主席汇报农业合作化	张玉美 (99)

人物介绍

叶剑英与毛泽东的交往	范 硕 (112)
毛泽东与张治中的一次重要谈话	余湛邦 (147)

专题资料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前期 对毛泽东纠“左”的历史考察	刘武生 (155)
毛泽东对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 的伟大贡献	顾龙生 (195)
毛泽东、刘少奇、陈云、邓子恢 农业合作化思想之比较	孙业礼 (219)
日本毛泽东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毕剑横 (240)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毛 泽 东

同志们！我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同志们作报告。政治报告的书面稿已经印发，大家都看到了，所以我就不照这个书面稿来讲，只讲一下这个报告里头提出的一些问题，以及这个报告里头没有充分展开来说的一些问题。我讲三个问题：路线问题，几个政策问题，关于党内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路线问题

我们党的七大应该决定一条什么路线呢？一条什么政治路线呢？怎么样决定才好呢？我们想，应该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党的路线，我们党的政治路线。这里所说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就是组织我们的队伍。组织队伍干什么呢？不干别的，就是要打倒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打败以后，得来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得

到全国的解放，全国人民的解放，建立一个新中国，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中国。这就是我们的总路线。

这样的路线是不是我们党历来就有的呢？是的，我们党历来就是这样的路线。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革命的性质就起了变化，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产生以后，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三个时期里，中国人民不都是在为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吗？正是这样。

我们的路线，我们的纲领，拿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是什么性质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因此，我们的政治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我们的经济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经济，我们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总之，无论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还是当前的各个革命任务，都是这样一种性质，各个革命力量都是这样一种性质。这条路线里面有一个队伍，有一个敌人，还有一个队伍的领导者、指挥官。这个队伍就是人民大众，这个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个领导者、指挥官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什么呢？领导人民大众，领导人民大众干什么呢？干反帝反封建。

我们的纲领就这样几个字，可是常常被我们的一些同

志忘记了。是不是忘记反帝呢？有时也忘记，不过反帝不大容易忘记，比较记得牢一点。反封建有时就忘记了。反封建为什么有时会忘记呢？是因为忘记了农民。

是要农民呢？还是要地主呢？在这个问题上，要地主，就忘记了农民；要农民，可以不完全忘记了地主。要农民不忘地主比较容易，要地主不忘农民就比较困难。所谓人民大众，主要的就是农民。不是有一个时期我们忘记过农民吗？一九二七年忘记过，当时农民把手伸出来要东西，共产主义者忘记了给他们东西。抗战时期，这种差不多相同性质的问题也存在过。靠什么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靠什么人建立新中国？力量在什么地方？有些人在这个时候弄不清楚，给忘记了。

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再其次才是别的民主分子。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靠几个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分子，虽然也可以抵一抵，但是没有农民，谁来给饭吃呢？饭没有吃，兵也没有，就抵不过两三天。

所谓无产阶级领导，就是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无产阶级里头出了那样一部分比较先进的人，组织成一个政治性质的团体，叫共产党。共产党里当然

还有别的成分，有别的阶级如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有别的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但出身是一回事，进党又是一回事，出身是非无产阶级，进党后是无产阶级，他的思想、他的行为要变成无产阶级的。共产党是要革命的，革命就要组织队伍，组织队伍主要是组织农民，还有其他广大阶层，包括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有时还有大资产阶级，甚至地主。队伍要有司令官、指挥官，司令官、指挥官在中国主要是两个，或者是无产阶级，或者是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中国社会两头小，但是两头都强，中间大，但在政治上是软弱的。中间阶层是动摇的，无论哪个中间阶层都有它的动摇性。坚决的阶级就只有两个：无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自由资产阶级也同我们争领导权，不要以为自由资产阶级就革命得不得了，同共产党差不多。自由资产阶级也有它独立的意见，有它独立的政治团体，现在就是民主同盟。民主同盟里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但主要的是自由资产阶级，它有它的性质。最近《参考资料》发表的民主同盟主席张澜老先生的一篇声明，同志们不知道看了没有，那就是他的立场，他的独立的政见。最近左舜生在招待外国记者的会上，又发表一个声明，也有他独立的立场。现在，民主同盟在联合政府的主张上，与共产党是一致的，国民党说民主同盟是共产党的友党，我们要团结它，联合它。但是它有它独立的意见，它现在是“左右开弓”，区别于两方面，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是不赞成国民党一党专政，另一方面也不完全同意共产党。它说：它是站在

国民党和共产党中间。这个话说得很透彻，是对的，它自己规定了它的性质，属于中间派。

大革命后期，在执行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这条路线上，我们党是犯过错误的，那时光讲无产阶级领导，而实际上放弃了领导。在那时以前，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六年的一个很长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同志，组织工人，领导工人运动，领导学生运动，后来推动国民党改组，帮助组织国民党，最后在革命过程中组织了广大的农民协会，会员有几千万人，主要是在南方各省，北方也有。这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呢？昨天林老讲得好，那时候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到中国来，被中国人民拿到了，也实行了，但是又似乎不很多，甚至似乎没有。这就是说，在那时候有一部分人是懂马克思主义的，那时候我们党的领导中占统治地位的以陈独秀为代表，他到了大革命后期就不要马克思主义了。

什么是不要马克思主义？就是忘记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忘记了人民大众，忘记了农民。当地主哇哇叫的时候，就向农民泼冷水。他又要无产阶级的领导，又不要农民，你看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还有没有？在中国，现在搞马克思主义，怎样搞法呢？他不搞无产阶级领导，他又不要这个领导地位，那还领导什么呢？无产阶级领导，主要应当领导农民，他不要农民，当农民伸出手来的时候，就泼冷水，因为地主也伸出手来了。地主说：共产党，你可不行！于是乎，共产党就夹在地主与农民中间，最后接受了地主的影响，向农民泼冷

水。反帝反封建不要农民,还有什么反封建? 没有反封建,还有什么反帝呢? 帝国主义是干什么的? 就是看到中国身上有油水,要揩一点油。中国五个人里面,有四个是农民,如果把四万万五千万人分成五份,每一份是九千万,那末就有四个九千万是农村人口,只有一个九千万是都市人口。用五个指头去打那个“帝”,他说多了,无须乎那么多,要割掉四个,拿一个指头去打,力量大得很,那个“帝”就慌得不得了,就哇哇大叫哭脸了。(大笑)光哭还下不得台,就跪在我们面前。你看四个指头都掉了,就剩下了一个,无产阶级也孤立了,变成了无军司令,空军司令。当一个总司令,你总要有兵。你没有农民,你看小资产阶级还来不来? 他跑到你屋子一看,没有几个人,就吓得不来了。小资产阶级最容易变,有时他神气十足,把胸膛一拍,“老子天下第一”;有时就屁滚尿流。(大笑)你屋子里一个兵也没有,又没有饭吃,他老先生望一望就开了小差。这怪不怪人家? 不怪,怪我们总司令,因为你不招兵。小资产阶级的脾气就是这样,他看力量,看政策,你力量大,他就积极,“我来一个怎么样? 要不要我去打先锋?”他看见你屋子里没有几个大人,就说:“下一回来吧! 我今天还有事,家里老婆生病。”(大笑)只有无产阶级招兵买马,积草屯粮,五个指头中间有了四个指头,另一个指头无产阶级占了一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成了指甲,那半个指头是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这时如果你再说:“来不来? 同志,来开会吧!”他就是老婆有病,也不说了。他看见你有那样大的力量,就说:“我家没有事,饭有得吃,老婆很

好。”(大笑)

我们曾经犯过错误,忘记过领导权,忘记过农民群众。所谓领导权,你总要去领导一个东西,有被领导才有领导者,有被领导才发生领导的问题。你不要农民,小资产阶级跑了,自由资产阶级也跑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中力量来打我们,无产阶级就从台上滚下来了,鼻子也跌烂了。然后爬起来望一望:“为什么你打老子?你蒋介石不是朋友!”于是脑子清醒了,搞了一个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时期又来了一个急性病。但还是不要农民,不要领导权,不要中国人民最大的力量,五个指头不要四个。为什么急性病也不要农民呢?因为急性病就是要工人暴动,城市起义,对搞大城市很积极,农民虽然也要,但是是附带的,它不注意去研究农民,研究他的面貌,他的眼睛,他的个子大小,研究他姓张姓李,心里想些什么,有些什么吃的。有的人走遍了多少省份,走过二万五千里再加多少里,参加土地革命多少年,可是出一个题目给他“什么叫富农?”他说对不起,没有研究。问他“什么叫中农?”也没有研究。即便是走马观花,那也应该看啊,可是他走马不看花,这个花就是农民。当然下马看花是更仔细,那叫做调查研究。犯急性病的人连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也不要,结果自己变成了空军司令,队伍越打越小。我们党有两次变小过,大起来又小了,大起来又小了。头一次,五万党员剩下没有多少,后来一次,三十万党员也剩下没有多少。按比例说,头一次的损失还小些,五万人剩下万把人,剩下了五分之一;后来三十万剩下不到三万,只有二万五千左

右有组织的党员，还不到十分之一。现在又大起来了，小指头变成了拳头，今后不要再让它小下去了。

抗战爆发以前，我们的准备就是这样。抗战一起来，我们的方针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那时候，中央认为只有人民战争，才能打败日本。所谓人民战争，基本上，或者说主要的就是农民战争。我们从来没有说过，没有广大农民参加的抗日战争，可以打倒日本。从有马克思主义以来，已经有一百零二年了，所有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是说过不要人民的斗争可以打败敌人呢？从来也没有说过。所谓人民的斗争，或者是比较和平的斗争，比如罢工、思想斗争、经济斗争、政治斗争，或者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峰，也就是战争。如果有一个什么人，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说“不要人民的斗争可以打败敌人”，那末，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宣告了他本人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原来他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是假的。有些人有这种思想是暂时的，是暂时的动摇，好像不要人民战争也可以打败敌人。那他想依靠什么力量呢？譬如，依靠国民党，甚至依靠国民党里面的顽固部分，认为依靠他们可以打败日本。但是过一个时期，他又觉得这样不行了。那时候这些人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很多，后来才多起来的。在我们党里头，这种情况很多，这种同志也相当多。我们党一九三七年五月开了党的代表会议。八月开了洛川会议，十一月在延安开了一个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中央曾经肯定了这样一条路线，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打败日本

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这条路线被这些会议批准了、决定了。在这些会议上，中央不相信不发动人民战争的专制政府能够解放中国，这一点，在决议案上是写了的，在文件上也写了的。一个压迫人民的专制政府能够解放中国吗？依靠它能够胜利吗？我们是坚决不相信的！因为相信了这个，马克思主义就跑掉了，至少是在一个早晨暂时地跑掉了。以后就要找一下，把马克思主义找回来。马克思主义，你要找它，它就会回来，你不找它，它就不会回来，因为它不晓得你要不要它！我们不相信不要广大人民的力量，能够轻轻巧巧地打败日本。我们这样地提出问题，不是将无产阶级的纲领降低到资产阶级的纲领，而是要将资产阶级的纲领提高到无产阶级的纲领。这样的提法曾经被人家驳过，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说这个提法是要领导权。他们说，资产阶级的纲领，特别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纲领有力量，要在广大人民中，在农民中，在小资产阶级中进行宣传，共产党这一套没有用处！

对于这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加以分析，并广泛地宣传我们的主张，说：“农民们！小资产者们！各位同胞！你们要知道：只有自己团结起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制度，把它改造成有民主，有人民的军队，有人民的政府，有人民的团体，日本帝国主义才能打倒！如果没有这些，中国就是黑暗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就打不倒！即使借外国的力量把它打倒了，中国还是黑暗的！”我们的宣传员就是要讲这样一些话。对于非共产党员，我们要告诉他们，要向他们宣传：“全国人

民要团结起来，组织人民的政党，组织人民的政府，组织人民的军队；要改造国民党，改造国民政府，改造国民党的军队。”我们为什么要提出改造它呢？是要把它提高到我们纲领的水平上。但是你要它起来，它就不起来，怎么办？那就要依靠全国人民，依靠进步力量的发展，依靠中间势力的争取，还有依靠国民党里头的民主分子。我们曾经设想过改造国民党这件事，似曾犯过错误，就是说对国民党可能改造这个估计不确当，没能照那时候我们所设想的做，国民党并未改造。应当说，要“改造”它并没有错误，但是它不听你的。国民党能不能改造呢？可能，也不可能。我们那时候要改造它，就要创造一定的条件，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并且国民党内部要发生分化，但是没有来得及。进步势力没有发展得那样大，中间势力也没有来得及争取，国民党里头的民主分子又被法西斯卡住了，结果改造就落空了。这样蚀本了没有？一个铜板的本也没有蚀。我们说改造它，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发展进步势力，不发展八路军，不发展新四军，不做广大的宣传，而且说要改造它这个宣传本身就是一个收获。老百姓听了我们这个话以后，会觉得共产党的话有道理，委员长的脸上是不大好看，所以要叫他洗一下。听说西安有一次开大会，三青团的人当主席，当时到了很多农民，散会的时候台上喊口号，说：“蒋委员长万岁！”农民就喊“赶快完粮纳税！”（全场大笑）什么原因呢？因为国民党要农民开会没有别的，就是要农民完粮纳税，他们脑子里装的就是完粮纳税，所以台上有人一喊，他们就喊出来了。国民党那

个脸上黑得很，如果说要给它洗脸，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里头恐怕就有四万万三四千万人是赞成的。我们提出要他洗脸，他不洗，我们并没有蚀本，而且赚了钱，这就是让老百姓知道了为什么要他们洗脸。同志们，直到今天我们是不是还是这个方针呢？是请他洗脸，还是要割他的头？直到今天，我们还是请他洗脸，不割他的头。我们开这个会，不是决定割头！这个头割不得！还是执行“洗脸政策”，请他修改他那个错误政策。至于他洗不洗？还要看，今天他不洗！到明天洗不洗呢？那很难说，年纪大的老人不爱洗脸，老同志们不要怪我，委员长也很老，他不洗的可能性比洗的可能性大，或许稍微抹一下做个样子，也许连抹都不抹，弄得满头大汗，乌烟瘴气！

同志们！在中国境内和我们争领导权的，要把中国拖回到黑暗的世界里面去的，主要是什么人，什么力量呢？这就是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银行家、大买办的代表。

在一九三八年党的六中全会上，我们纠正了上面所讲的这类错误思想，即不要求国民党洗脸，而是说他那个脸漂亮得很，我们的脸上都是灰，比不上他，至少和他差不多。时时拥护国民政府，事事拥护国民政府，处处拥护国民政府，就是这类错误思想的一个标准的口号。这样的东西是错误的。

六中全会来了一个纠正，许多同志了解了这个问题。六中全会以后，还有人觉得国民党很好，很漂亮，后来出了一

个“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又出了一个第一次反共高潮，出了这两件事情以后，国民党“跳加官”戴的一副假面具脱掉了，他那个不好看的样子就露出来了，这时我们一些同志就逐渐觉悟了。以后又有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第三次反共高潮，还有一九四三年七月要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到这个时候，我们党内就大体上肃清了对国民党的幻想。消除了认为国民党不要改造，中国就可以有救，日本就可以被赶出去的思想；改变了认为主要不是依靠我们自己，发展我们的力量，发展解放区，使八路军、新四军不受限制的思想；树立了要放手动员人民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的领导下打倒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思想，在广大的人民中间，在同志的脑子中间，展开了一幅新图画。所以思想这个东西很怪，要去掉那一部分坏的东西，不适合于马列主义的东西，不适合中国情况的东西，就要经过一定的阶段，就要有经验，单靠讲是讲不通的。列宁说“要在经验中来教育人民”，因为人民是只信经验不信讲话的。但是讲还是要讲的。我们有两个大教员：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委员长，这两个大教员不要薪水给我们上课。没有这两个大教员，就教育不了中国人民，教育不了我们党。至于我们党里面有一些小教员，字也认得不多，也讲不出好多道理，他们去讲人家就不听。后来请了一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一个是日本法西斯，一个是委员长，这两个教员帮我们一教，就教好了。

六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坚决实行了对农民、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甚至于对地主的领导权。在我们解放区搞减

租减息、交租交息，地主也跟着我们走。由于坚决实行了这样一个领导权，我们发展了军队、解放区和我们的党。从此以后，就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无数次的进攻，并且逐渐展开了攻势，比如像去年开始的攻势，今年的攻势就更大了。抗战初期我们是攻势，中期是守势，现在是攻势为主，防御为辅，这是对日本而言。对国民党，我们打退了它的三次反共高潮及无数次的进攻，包括思想上的进攻，政治上的进攻，军事上的进攻，将国民党放在一个什么地位呢？使它的影响低落，势力缩小了。国民党也请了一个教员，跟我们是同一个教员，叫冈村宁次，他从前住在北平，现在住到委员长附近去了。这个教员一教，国民党的影响就低落了，势力就缩小了。现在国民党的影响还有没有呢？还相当大。国民党有“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又加上二十年，共有六十年的历史，我们还不到人家的一半，只有二十五年的历史。要我们的影响去，他们的影响才会走。我们的影子不去，他们的影子就不走。所以说，是低落，而不是没有，只是缩小了，但还有相当大的力量。他们有一百五十万军队，我们只有九十一万军队；他们有国际地位，我们没有；他们有两万万人口，我们只有一万万人口；他们有六十年的影响，我们只有二十五年的影响。

由于在抗战时期正确地执行了我们党的路线，坚决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的领导下打败敌人，建设新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抗日战争，就把国民党挤到了那样一个地位：影响低落，势力

缩小；而把我们党放在这样一种地位：成为抗日救国的重心，全国广大的人民都拿眼睛望着我们。

现在已经完全证明，只有这样的路线，才是正确的路线。力争领导权，力争独立自主的路线，是我们党中央的路线，是反映了全党大多数同志要求的路线，是反映了全国大多数人民要求的路线。这条路线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从外国送来的吗？也不是。它是从中国自己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鲁迅讲过：路是人走出来的。我们这条路线，也是中国人民用脚踩成的。力争领导权，力争独立自主，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也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抗日战争的路线。这条路线的正确性，现在已经完全可以证明得清清楚楚了，它不比一九三七年冬天，也不比一九三八年，甚至不比六中全会后一个时期，但是直到第三次反共高潮时，还有若干同志不相信这一条路线。那末是不是现在都觉醒了呢？都相信得那样彻底了呢？都是马克思主义万岁了呢？我看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有万岁的，有九千岁的，有八千岁的……。就是从我们党员来讲，一百二十一万党员的认识也是不同的。最近华北、华中开了很多座谈会，反映出来不但在党外人士中间有相当多的人，而且在党员中间，对于我们这样一条路线，也是不完全认识、不完全清楚的。所以说，在我们广大党员中，马克思主义是有的，但程度上差别很大，我看是从一岁到九千九百九十九岁都有，虽然万岁也有。

我们对国民党的方针，是又团结又斗争。讲到斗争，我

们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我们是在自卫的立场上和它斗，我们是有理的；这斗争是局部的，对我们有利才斗；但这种斗争又是暂时的，为了团结我们是有节制的。反过来讲，暂时的、局部的、自卫的斗争，要有利于团结。国民党天天想打我们，但也不敢和我们作大的决裂。我们的斗争也是有节的。譬如我们去了一封信，要求派人参加旧金山会议，国民党开始不肯，但结果还不是去了？至于我们说去三个，他说你去一个，一个就一个，我们不大争，现在我们的代表已经到了华盛顿。同志们！权利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这世界上有一个“争”字，我们的同志不要忘记了。有人说我们党的哲学叫“斗争哲学”，榆林有一个总司令叫邓宝珊的就是这样说的。我说“你讲对了”，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他们就向被压迫的人民进行斗争，“斗争哲学”是他们先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得比较晚，那是斗争了几千年，才有了马克思主义。放弃斗争，只要团结，或者不注重斗争，马马虎虎地斗一下，但是斗得不恰当、不起劲，这是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小资产阶级还有另外一种性质，叫革命性。他们革命是革的，但是有点软弱。现在已经完全证明软弱是不对的。有一个章乃器，我给他戴上一顶帽子，叫“章乃器主义”，我想戴得是有道理的。此人现在已同我们讲和，他对周恩来同志说，他犯了错误。这很好。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我在党的一次会议上批评过他，说章乃器的哲学不好，因为他那时提出了“少号召，多建议”。这是自由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他的意见被我们战胜了。他是中间派，只

有我们坚决地联合他，才能在长期的经验中教育他。以后自由资产阶级还会拿他的软弱性经常影响我们，因为他有那样一种性质，好像《红楼梦》上的林黛玉，洗澡后身上发出的那样一种“香”，自由资产阶级身上也出了那样一种“香”，这种香，就是“软弱香”。他出了那种“香”就要找市场出卖，有目的地向我们延安送，给我们党以坏的影响。我们的宣传有时也太刺耳，玫瑰花虽然可爱，但是刺多扎手，“羊肉好吃烫得慌”。对于那些绅士，玫瑰花虽可爱，但因为刺多他们不大喜欢。他们喜欢薛宝钗，不喜欢探春。这个是很麻烦的。同志们！麻烦还在后头，不要怕麻烦。要革命就会有麻烦，而且有时非常麻烦。如果想省掉麻烦，就坐在家里抽长烟管。现在夏天来了，坐在树底下，拿一把大蒲扇，那麻烦比较少。但是还有风波，鲁迅不是写过一篇“风波”吗？世界上不会没有风波，怕风波就不能做人，那就赶快到阎王那里去交帐。我们党现在经常遇到风波，有大风波，中风波，小风波，我们不要怕风波。现在我们的意志更加坚强了，不致于被风波淹没。要在中国的海里淹死我们党，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会的。

关于这一部分，最后我讲几句，结束一下。第一、农民的情况怎样？农民抱什么态度？八年以来也好，二十五年以来也好，农民非常欢迎我们的政策，非常欢迎像我刚才所讲的政策。但是作为党来说，作为领导思想来说，我们和农民要分清界限，不要和农民混同起来。这对于农民出身的同志可能不容易理解，“我就是农民，为什么不能和农民混同呢？”

我说你现在叫做共产党员，农民是你的出身，出身和入党是两件事情，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是这一点要慢慢地搞清楚，一年搞不清楚，两年，两年搞不清楚，三年，不要讲我们共产党开了会，你就照念。昨天有一位同志说：季米特洛夫书上写的一个德国同志，在柏林一次失业工人大会上讲话时，就照念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十三次全会的决议，所以老百姓不喜欢听。现在我们也不要照抄七大。七大说：“不要和农民混同起来”，你回去这样一讲，很多农民同志就不赞成，他说他就是农民。我说不要和农民混同，是说要把农民提高一步，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将来几十年以后，要把一切党外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如不相信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将来我们要搞机械化，要搞集体化，那就是提高他们。

第二、小资产阶级怎么样？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党内也好，党外也好，既有他的动摇性，也有他的革命性。动摇性是他们坏的一方面，但是一般地说来，能够用教育的方法去克服。从党内来说，延安整风就是一个证明。艺术家和作家，对文艺座谈会这样的方法也赞成，从前他们不知道怎样做，我们党给他们指出方针，向他们进行教育工作，不是命令主义，而是逐渐使他们自觉，这就很有成效。克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要靠我们党经常地向他们进行适当的宣传，主要是靠实际行动，靠我们自己有广大的力量，有广大的解放区和军队。

第三、自由资产阶级怎么样？自由资产阶级有更大的动

摇性,但自由资产阶级现在要民主,他们要他们所想的民主,因此他们是我们的同盟军。这种动摇性,在我们坚决的影响下,是能够使他中立,以至于跟我们一道走的。比如对联合政府这个口号,又比如在几次反共高潮中,他们就抱中立态度。国民党和共产党打架,他们在两边劝架,给这边说不要这样,给那边说不要那样。最明显的,就是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开国民参政会,我们的参政员不出席,委员长一定要我们出席,我们一定不出席。我们说:“你给我们一点东西,我们才出席。”他们说“出席以后再给”,我们说“给了以后再出席”。就这样几反几复,我要你给,你要我出,结果一个不给,一个不出,还是给的没有给,出的没有出。在这中间,一些中间人士就两面拉,对国民党说:“你给吧”,对我们说:“你出吧”。这是自由资产阶级动摇性的一个标本例子。这样的事,多得很,现在时间有限,一下子说不完。总之,在我们坚决的影响下,能够使自由资产阶级中立,以至于使他们跟我们走。

第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怎么样?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是以国民党反动集团为代表的,他们是国内抗日战线中的反动派。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就好象英国共产党对于邱吉尔一样。昨天报纸上有英国共产党总书记一篇文章,同志们可以看看。他提出的口号是同自由党、工党、公安党成立联合政府,在下次大选当中,用选举来推翻邱吉尔。他说的“推翻”在我们中国容易引起误会,因为我们的特点和外国不同,在我们这里,“推翻”就是要争取领导权,过去

我们曾经“推”过一次，我们要力争领导权。所谓力争，要注意这个“力”字，在地主、大资产阶级千方百计要争取领导权，要把广大人民，主要的是三亿六千万农民放在他们的领导之下，不受我们的影响。中国什么人身上有油水？最多的就是农民。日本人打来就是要刮中国农民的油水，蒋介石也要刮农民的油水，还要注意中国将来会有斯科比老先生来刮油水。在希腊，斯科比就是代表英国刮希腊人民身上的油水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要把中国变成黑暗的中国，因此他们是我们长期斗争的对象。

最后，讲到外国。外国怎样呢？苏联，毫无问题是朋友，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我在报告中讲得很清楚。其他外国，几个大国，同盟者，也要坚决地联合他们；但是他们搞得不对的地方，也要斗一下。为什么《解放日报》上没有登这个话呢？没有登不是永远不登，并不是否定要斗一下。他们要推出斯科比，那就不行。我在报告中提醒了这个意思。在国外还有反动势力，而反动势力还很强大。现在整个国际形势是好的，有苏联参加的反法西斯阵线的团结，主要是英美苏三国的团结。这个团结是主要的，统治一切的。现在世界的面目已完全变化了，这一方面在我的报告中写得很多，很充分。关于黑暗的一面，我写得很少。给蒋介石撑腰的那些外国人，他们的脸也不好看，有些装着天官赐福的样子，还是不好看，我们要警觉。

这是第一个问题，可以叫形势与路线。

二、政策方面的几个问题

政策有各方面的政策，纲领有一般的纲领，具体的纲领。

第一个问题，一般的纲领与具体的纲领。这样的划分是不是从这次才开始的呢？从前也是有划分的，不过从前没有在一个地方把它分开来写：头一条是一般纲领，第二条是具体纲领。比如《新民主主义论》那本小册子，没有说具体的政策，只提到一般纲领。但是我们各个时期都有具体的政策，比如抗战初期的十大纲领，抗战中期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在陕甘宁边区有二十一条施政纲领，其他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也都有大同小异的纲领，性质相同，条文小异。内战时期，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所决定的十大纲领，就是新民主主义总路线下的具体纲领，更具体的还有土地法、婚姻法、政治工作条例等等。北伐战争时也有类似的东西，党发布过很多对时局宣言，都是具体的纲领。这次我们把这个问题在这里说清楚一下，使我们的同志们懂得有纲有目，新民主主义就是我们的总纲。“纲”就是鱼网上拿在手里的大绳子，“目”就是鱼网的眼。

第二个问题，关于孙中山。在我的报告里很说了几句好话。孙中山这位先生，要把他讲完全。但是不是我在这里闹片面性呢？说孙中山好看得很，漂亮得很，和林黛玉、杨贵妃差不多，美得很，不是的。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路，是历

史辩证法的路。孙中山的确做过些好事，说过些好话，我在报告里尽量把这些好东西抓出来了。这是我们应该抓住死也不放的，就是我们死了，还要交给我们的儿子、孙子。但是我们和孙中山还有区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比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差，新民主主义的确比三民主义更进步，更发展，更完整。现在的新民主主义在将来还会发展得更加完整。我们党内有一种情绪，不喜欢孙中山，这种情绪在相当广大的党员中存在着。认真说，这种情绪是不大健全的，是还没有真正觉悟的。这是反映了内战时期的情绪，那时候，因为环境不同，连孙中山也不要了。那个时期为什么我们不大讲孙中山？因为我们被国民党一下子打倒在地，爬起来也红眼了。蒋介石手里打着孙中山的招牌到处乱杀人，这时候，群众对孙中山也不喜欢。在十年内战中他们不要孙中山，这也很难怪，因为我们的力量小得很。在抗战初期，我们的力量也还小，所以那时候我们要孙中山，所发生的影响不大，因为人家还看不起我们。将来我们的力量越大，我们就越要孙中山，就越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

第三个问题，关于资本主义。在我的报告里，对资本主义问题已经有所发挥，比较充分地肯定了它。这有什么好处呢？是有好处的。我是在这样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至于操纵国民生计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那是不包括在里面的。在写具体纲领的时候，有人提出增加一条：“没收大地主、大银行

家、大买办的财产”。其实在全文里，引用了孙中山所说的“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意思已经有了。现在如果讲没收，就是要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这三家，那就不大好。所以我没有讲要没收他们的财产，但是这个意思也讲了，因为那是孙中山讲过的。在后头，我还要讲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们就是这个革命的对象，因为他们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所谓一般的资产阶级，就是指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就是中小资产阶级。孙中山讲过的“操纵国民之生计”的特殊的资产阶级，则不在其内。将来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在大城市里也要没收操纵国民经济的财产，没收汉奸的财产（这一点，我在报告里已经讲过了）。我们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没收这些财产为国家所有的。另外，在下面我也要说到广泛发展合作社经济和国家经济，这二者是允许广泛发展的。

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当时列宁、斯大林的党是给了他们以批评的。最后，他们变成了社会革命党。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布尔什维克就不是这样。

他们肯定俄国要发展资本主义，认为这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列宁在《两个策略》中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那时粮食主要出于富农，一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才把城市的中小资本家与乡村的富农消灭。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集体农庄发展了，粮食已主要不由富农出了，才提出消灭富农，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

第四个问题，关于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在我的报告里已经提到了，但是没有强调。为什么不强调呢？如果要强调，就要列出共产主义的纲领，可是我们认为现在还是不列出的好，因为共产主义的纲领就是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把这些东西写上去，只有一点好处，就是对教育党员是有利的，因为我们有很多同志还不晓得什么叫共产主义。从前我在井冈山打土豪时，曾到一个土豪家里去看有没有书，一个老妈妈走出来问我来干什么，我说来找东西，她说：“昨天已经共了产，东西都共掉了，现在没有东西可共了。”我们的农民同志很多都认为，把地主的财产分给他，这就叫共产主义。这当然不对。

有人说，我们党要改改名称才好，他们说我们的纲领很

好，就是名称不好。“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不但蒋委员长来电报要我们改名称，中间派也劝我们改名称。像左舜生就说过：“你们的纲领实在好，如果你们不叫共产党，我就加入。”前年七、八、九三个月的反共高潮中，我们有很多东西搞出去了。他们看到之后，非常高兴，说纲领很好，就是名字不好。很多美国人也要我们改名字，我们若是改了名字，他们就喜欢了。他们喜欢我们改成国民党，大概世界上最好的名字莫过于国民党了。另外，还有一个第三党，然而它也不过是第三而已，再还有可以叫保守党的。但是，一切问题并不在乎名称，你叫保守党也好，什么党也好，他们还是叫你红党。美国的新闻记者福尔曼写了一本书叫《红色中国的报导》。还有一个美国记者斯诺写了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现在翻译为《西行漫记》。不论你名称怎样改，它都是红的。你粉白了，不要胭脂，只要水粉，他们还总是把红帐挂在你的身上。所以并不在乎名称。国民党这名称总算好吧，但是为什么人家还是那样不喜欢国民党呢？从前有许多人怕小孩害病或死掉，就故意起个坏的名字叫猫，叫狗。历史上有个人名叫王镇恶，名字这样好听，可是他还是死了。我们是不是要起一个名字使党不死呢？随便你起一个什么名字，只要他所做的还是那样，那是不会改变实际内容的。有一个新闻记者叫爱金生，多少带点自由主义，是一个旧民主主义者。他称我们为“温和的民主集中制”，可见我们并不那样“红”。资产阶级的代表都那样讲，所以我们党的名称还是不要改。我们的名字，中国人民是喜欢的。过去江西

景德镇的农民叫共产党为共伞党，这名字也很好，因为他们没有伞，一把伞几个人共，农民是喜欢这个名字的。

第五个问题，关于国民党。对国民党我们尖锐地批评它，但也很客观，并没有超过他们的实际。他们有一点好处，我们也要给他们挂在帐上。可惜国民党的好处不多，虽然想挂，却是很难，只能挂几笔，而且还拖了一个尾巴，要委员长洗去脸上黑的东西。这是我们的方针，我们一方面是尖锐地批评，另一方面还要留有余地。这样就可以谈判，合作，希望他们改变政策。我们说过打倒委员长没有呢？没有。在我的报告里，就连一个委员长也没有提。这位委员长写了一本很“好”的书，叫做《中国之命运》，本来应当提一提，但还是没有提，这实在是可惜。我的报告里提到的，死人里有孙中山，现在又加上一个罗斯福，活人里革命的有斯大林，反革命的有希特勒，其他的人以少提为妙。因此，我们给国民党留有余地，就不会犯错误；如果不留余地，实际的结论只有一条，就是“打倒”，那我们就会犯政治上的错误。关于这一条，委员长也看出来，他有几次要挑拨我们犯这样的错误，挑拨我们的军队打出去，向西安打，挑拨我们提出推翻国民党。同志们！我们要注意这些东西，注意这些挑拨。你说要合作，那好得很，但是你必须洗一洗脸，才同你“结婚”；你若不洗脸，那就不好看，就不同你“结婚”。这就是我们的方针。

关于自卫与反击。我们要站在自卫的立场反击国民党的进攻，一个是自卫，一个是反击。一切国民党的大小进攻，必须给以反击，给以回答。不论是文的也好，武的也好，特别

是武的，只要他进攻，就要把他消灭干净。我们曾经提出，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我和国民党的联络参谋也这样讲过。我说，我们的方针：第一条，就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就是说，我们不打第一枪。第二条，就是《左传》上讲的“退避三舍”。你来，我们就向后转，开步走，走一舍是三十里，三舍是九十里，不过这也不一定，要看地方大小。我们讲退避三舍，就是你来了，我们让一下的意思。第三条，是《礼记》上讲的“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还在一九三九年我们就提出了这个口号，现在还是这个方针。好比说，我们有一百条枪，你们缴了我们九十九条，我们当然不高兴，但是不怪你们，因为你们本领大，高明得很。但是，就是只剩一支枪，我们也要打到底的。只要我们手里还有一支枪，我们被打倒了，就把枪交给我们的儿子，儿子再交给孙子。有一个愚公移山的故事说，在山西有一座太行山和一座王屋山，现在这两座山比较矮，从前比较高，不大好走路。有一个人名叫愚公，是一个很笨的老头，在他附近还住着一个老头名叫智叟，是一个很聪明的老头。有一天他们两个人打起架来了，为什么打架呢？因为愚公要把太行山、王屋山移掉，叫他的儿子挖山、挑土。那个聪明的老人就告诉他不必挖了，太行山、王屋山这样高，怎么能挖掉呢？愚公说：这两座山虽然高，但是我死了还有儿子；儿子死了，还有儿子的儿子；儿子的儿子死了，还有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父而子，子而孙，孙孙子子，子子孙孙无尽，而山是不

会再增高的。后来，上帝派了一个神仙去到那里，这个神仙为愚公的精神所感动，回报了上帝。上帝就把山移走了！这个故事是书上讲的，并不是我造谣。

世界上的反革命，日本侵略者和中国的反动派，不把他们打倒是不行的。对于国民党的进攻，我们是站在自卫立场上反击的。超过这个自卫的立场，我们就要犯错误。但有些同志劲来了，就忘记了这一点，这是不好的。基本是自卫的立场，有了这样的立场，就不会犯错误。自卫就是有理，局部就是有利，暂时就是有节，这就是有理，有利，有节。违反了方针，就会犯错误。麻烦是很多的，我们和国民党的麻烦更多得很。

第六个问题，关于改造旧军队。改造旧军官，利用旧军官，这里有思想问题，要在我们全党进行广泛的宣传。旧军队多得很，这中间有很多的军官需要改造，不能个别地对付，要有整个的政策。除彻底的反动派改造不了外，大部分是可以改造的。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犯过错误，不相信旧军官能改造，认为旧军官不好搞，旧军官没有马列主义，不会有布尔什维克。其实，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许多旧军官是受蒙蔽的，是要找饭吃、找出路的，到我们这里才有出路，我们不怕他们造反。世上最怕的是造反，但造反也不可怕。造反有两种，一种是公开造反，一种是秘密造反，搞特务。公开造反我们有准备，而且公开造反已造了好多年，并未造出结果来。秘密搞特务我们要防备，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的眼睛望着他，这就是严肃性、警

惕性。另一个就是走人，如果他带了枪走，我们并不蚀本，因为枪支是他带来的又带走了。你要走，送你几块法币，开个欢送会，并且告诉他将来要来还可以来，这就叫做政治。对比较进步的军队，要适当地帮助，从前我们对这些军队也有过帮助。有两种极端思想，一种是对旧军队一个都不要，不信任还要缴枪，这是不好的。另外一种是对比较进步的军队，什么东西都送给他，这叫“帮倒忙”，也是不好的。我们改造旧军队，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

第七个问题，关于我们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山西的新军等等，也是实行统一战线的政策，内部外部都是实行统一战线政策，这就是联盟的意思。内战时期的红军也是联盟，是工农联盟，党和非党的联盟，我们的军队没有一个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军队，不像国民党那样人人都要入党，我们也讲过党军，但这是指的党的领导，不是要求军队里所有的人都是党员。历来我们军队中的党员最多只有一半，经常是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党员是占少数的。在军队里，少数共产党员应该跟多数的党外人士合作，所谓“人士”就是指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大众的军队，它属于人民大众，它为人民大众，这也就是民有、民治、民享，是新三民主义即新民主主义的军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军队。这个军队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有些人听说无产阶级领导他，他就不高兴，有些人却偏要喊你要归我领导，如果你不归我领导那就不正确，路线就发生问题。这种神气就不好，人家就不大欢迎。在这里，

我们要讲清领导的性质。什么叫做领导？它体现于政策、工作、行动，要在实际上实行领导，不要常常叫喊领导，人家不愿听就少说些。对领导权要弄清其性质，但不要天天像背经似地去念。

现在，我们的军队在尽可能地扩大和党外人士的合作。最近山东有三支伪军过来了，现在他们不叫伪军叫八路军了。我们给他们开会搞通思想，改造思想，一开始他们是害怕的，以后逐渐打破了思想顾虑，觉得很舒服。这个方法很好，《解放日报》也发表了社论。我们大会各代表，如果觉得这个方法很好，就做一个决定，大家照此去做，这叫做军内和军外合作。只要不反对革命，我们就和他合作，另外拿一只小眼睛去注意特务活动。和民主分子合作，怕什么呢？我们有饭大家吃，有敌人大家打，发饷是没有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七搞八搞便成了正果。像梁山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不知道他们是开“七大”还是“八大”，内部政治工作相当好，当然也有毛病就是了，他们里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没有进行整风。那个卢俊义是被逼上去的，是用命令主义强迫人家上梁山，因为他不是自愿的。

我们对于不是坚决的反动分子，只要愿意革命并和我们合作，就来者不拒，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姜太公他发表宣言：“你愿来就来，不愿来的就拉倒。”人家了解得很清楚，钓鱼都可以发宣言，我们也可以发表一个宣言。

第八个问题，扩大解放区。在一切可能进攻的地方，就

要发动攻势。但是我们要注意防御敌人的进攻，敌人进攻我们就粉碎他，我们要以进攻为主防御为辅。

在抗战初期，是到处开展进攻；在抗战中期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以收缩、防御为主，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又向前发展攻势。根据这两年的经验，我们规定了这样两条：第一条是进攻，第二条是防御。不要因为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受了损失，被蛇咬了一口，看见绳子就怕。根据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特别是一九四四年的经验，我们的任务需要我们发展攻势，扩大解放区，集中大的兵力（五至六个团）和小的兵力（武工队），到敌后之敌后举行攻势。因为日寇的情况变化了，它的兵力疲惫，自顾不暇，而我们的地方扩大了，我们和敌人两方面的情况都变化了，世界的情况也变化了，柏林快打下来了，所以我们应该集中相当的兵力，在可能条件下，对敌人最薄弱的地方举行进攻。这对我们的防御，也有很大的好处。现在各地作的关于一九四五年任务的计划，第一条就是进攻，第二条就是防御。这不是冒险主义，因为我们讲是在可能条件下，不是讲在没有可能的条件下去进攻，而且还讲了敌人有可能来进攻我们，要注意巩固根据地，所以这不是冒险主义。

第九个问题，准备转变。由分散的游击战争逐渐转变到正规的运动战，由游击战争为主逐渐转变到以运动战为主。在抗战初期，我们提出过，但那时只是一种希望。那时候的任务是什么呢？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搞清楚。那时我们前面的敌人是日本人，后面有国民党内的反动派，我们

被夹在中间。我们的力量在那时是小手指头。一九三六年我们在全国的军队，包括南方游击队，仅有三万人，到一九三七年增加了一点，也不多。那时候我们的任务是增加力量，长大起来。加一个指头，又加一个指头，再加一个指头，使它长大起来。怎样长法？靠打麻雀战，打游击战。麻雀满天飞，哪里有东西吃，就飞到哪里去。六中全会时我们特意为它列出十八条好处，这个方法是好的，八年来证明了这点。满天的麻雀就是种子，可以发很多芽。有了这个种子之后，党建立了，政权建立了，根据地有了，老百姓有了，饭也有得吃了，干部也锻炼出来了。那时候我们到处飞，前面的敌人日本人搞我们，后面的国民党反动派也搞我们，他们两个都在挑拨我们，挑拨我们干什么？集中兵力打大仗。他们对我们一鼓一骂，一个说共产党英勇，是抗日民族英雄，一个又骂我们是机会主义，怕死。谁愿意当机会主义，谁不愿意当民族英雄？但是我们还要学麻雀，虽然麻雀有机会主义，哪里有粮食到哪里去，虽然他现在还是小麻雀，但集合起来有九十一万。是不是就永远为麻雀，“麻雀万岁”呢？客观事实完全证明了，我们这个麻雀与别的麻雀不同，可以长大变成鹏鸟。从前中国神话中说：有一个大鹏鸟，从北冰洋飞到南冰洋，翅膀一扫，就把中国扫得差不多了。我们也准备那样，准备发展到三百万、五百万，这个过程就要从小麻雀变成大麻雀，变成一个翅膀可以扫尽全中国的大鹏鸟。

我们现在要“就敌就粮”。敌人的据点很多，但敌人只有点、线及小面。敌人要搞点、线，我们就分散搞面，这是“就

敌”。人要吃饭，集中在一起没有饭吃，要分散吃饭，这是“就粮”。内战时期搞正规化，就是因为忘记了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用脚走的，子弹是会打死人的，没有搞通这一点。军队不生产，专门吃老百姓的，吃上几个月，吃上一年，粮食吃完了，只好向后转，开步走，来个万里长征，可谓“英雄豪杰”。现在我们要集中更大的兵力，以多胜少，去打敌人薄弱的地方。你一百人，我一千人，一千人可以消灭你一百人。此外，还要转向正规化。报告里写了这样一条，有哪一天我们得到新式武器，就会更加无敌了，就能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里就包含准备转变的意思。在解放区的任务里面，我讲到进攻为主，防御为辅，就是说，进攻应在前，防御应在后。我们要有这样的准备，将来一旦得到新式武器时，如果没有准备就不好了。现在情况变了，我们的方针也要变，要来一个完全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做好准备，由小麻雀变成大鹏鸟，一个翅膀扫遍全中国，让日本帝国主义滚蛋。

要转变，但不能希望一切皆在一个早上改变。要看具体情况，有力量就打堡垒，打大城市；打堡垒时打得开，有饭吃，我们就打；打不开，又没有饭吃，我们就向后转，把队伍分散开，来一个聋子放炮竹——散了。还有一个十几年来争

论的问题，就是从乡村到城市，还是从城市到乡村，争得一塌糊涂。正确路线是要先搞乡村，要研究农村情况。大家说这是正确的路线，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走路，走到那个地方走不通就要转弯，因为那个地方走不过去。当然在乡村尽走尽走，走他几百万年，这也不叫马克思主义，而叫反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当需要在乡村时，就在乡村；当需要转到城市时，就转到城市。现在要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夺取大城市，准备到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那里有成百万的人口，譬如，北平有一二百万人口，保定、天津、石家庄的人口也很多。把重心转到城市去，必须要做很好的准备。不要想到城市就忘了乡村，说要我搞乡村我就不干，不分配我搞城市，就是干部政策不正确。你也去城市，他也去城市，城市没有房子，乡村没有人住，行吗？譬如北平，晋察冀几千万人统统跑去是不行的。所以我在报告中号召大批知识分子下乡，不要穿学生装，而要穿粗布衣。但我们夺取了大城市，像北平、天津这样大的三五个中心城市，我们八路军就要到那里去。我们一定要在那里开八大，有人说这就是机会主义；恰恰相反，八大如果还在延安开，那就近乎机会主义了。

城市工作要提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不是口头上讲讲的，而是要实际上去做的，要派干部，要转变思想。七大散了会，要把干部一批一批地派出去，在可能的条件下，一批一批地走。到城市去做秘密工作，不要像《水浒

传》里的好汉，行不改名，坐不更姓，而是要改名换姓。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庄没有城市工作就打不开。如果城市内部没有动摇，内部不发生问题，就很难解决问题。

由于作战方法从游击战转变为正规战，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向城市，我们也要准备在这个转变上发生意见分歧。在这个问题上，我看一定会或多或少发生意见上的分歧，我们准备得好，意见上的分歧可能少一点，准备得不好，意见上的分歧可能多一点。这一点中央应该有准备，各地也应该有准备，事先要头脑清醒，首先是高级干部要头脑清醒，这样意见分歧可能减少一些。

第十个问题，军队与地方。要深入农村，争取国民党统治区，争取沦陷区。我们要夺取大城市，但我们现在的旗帜并没有插在北平、武汉，还是插在山上，像清凉山、太行山、五台山等等。我们现在的根据地，是战略的出发地，但现在拥有的人口太少了，我们要发展到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一半。我们要是发展到两万万人口事情就好办了。现在我们有一百万军队，但这个军队是分散的，不可能在一个地方集中十万军队。首先因为没有饭吃，又没有飞机大炮。要是把五台山、太行山、晋绥、山东的军队，集中几万人，拿着步枪去打北平就不行。一个吉安，攻了八次没有攻进去，一个赣州攻了七次没有攻进去，原因不是热情不够，也不是马列主义不显灵，而是我们能用来攻城的东西太少了，想爬也爬不上去。如果将来有了武器，能够装备一二十万的军队，

我们就能集中地从日本人手里打开石家庄、保定、北平，一路打下去，不向后退，或者退了一两天，又向前进。能够装备一二十万军队，条件就不同了，力量就不小了。将来我们是“武器加数量”，我们要有几百万军队，全国就在我们手里。将来三百万到五百万的军队是需要的，这样才能使整个中国胜利，天下太平，使中国成为独立、民主、自由、统一、富强的中国。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扩大几百万军队，全国老百姓负担也并不太多，但是要有武器。在目前情况下，扩大军队要不加重老百姓的负担。我们将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扩大军队，但是如果到处扩大，扩大得不亦乐乎，一月、两月没有小米、大米了，老百姓哇哇叫喊，那就不对了。所谓在可能的条件下扩大，就是不加重老百姓的负担。

第十一个问题，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召集这样一个会议，是我们大会向各解放区人民的提议，这是一件大事。报纸上还没有公布。现在只能是召集代表会议，代表不是普选的，是由军队、政府、民众团体选派的，这样简便一些。开人民代表大会就要调查年龄、有没有选举权等，普选还是在战争结束后搞比较好。当然要搞也可以搞，现在各解放区也有普选，但是这次我们要求比较快，不能太慢了。决定召集这个会议，要准备召开以后发表宣言，作决议案，建立经常的领导机关，这个机关不叫政府，而叫“中国人民解放区联合会”。这是我们拟定的、心里设想的東西。报纸上现在不登也不写，只在这里讲一讲。要召集会议作出决议案，发出宣言，打电报给委员长，请他组织联合政府。同志

们！我那个政治报告名叫《论联合政府》，关于这个问题我今天讲得很少，在这里就讲一下。请委员长组织联合政府，我们请了没有呢？请过多次了，前些日子周恩来同志去请过，我们《解放日报》、新华社不是几天就请一次吗？你每请一次，他总是摇头，不大高兴。他说组织联合政府就是要“推翻政府”。组织联合政府怎么就是推翻政府呢？我们说是和他联合，他说是要推翻他的政府。我们说开党派会议，他就叫“分赃会议”，他说他的政府是赃，不赞成人去分。周恩来同志和蒋介石讲：“孙中山先生讲过，将来要召集国民会议。”他就说：“你们把我的政府当作北洋军阀的政府，你们就是总理！”那个人实在难得讲理，还有一点流氓脾气，比较坏。

我们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党外人士要占大多数。我们准备选举一个机关，它的名称叫什么好，大家都想一想，你们想的也许很好。现在拟定的名称叫“中国人民解放区联合会”。国民党有一个政府，我们避免对立，所以叫“中国人民解放区联合会”。要解放中国人民，谁人讲不要解放呢？人民都有抗日的权利，都要争取这个权利，反动派如干涉进步，取消人民的抗日权利，是绝对不许可的。提起这样的事情，有些人会骂我们“称王称霸”，我们就是称王称霸，是称解放之王，称解放之霸。什么人敢不要我们解放！（掌声雷动）

三、关于我们党内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个性与党性。这个问题有人在整风中间提出过，外面也有人讲过我们。有一个新闻记者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大公报》上，说共产党是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他们的许多文件上只讲党性，还作出增强党性的决定等等。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我在报告里讲了。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是摧残个性的，使中国人民不能发展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的身体也不能发展，精神也不能发展，都受到了摧残。我曾经讲过：鲁迅的骨头很硬，半殖民地的国家有像鲁迅这样硬的骨头是很可贵的。半殖民地的国家是穷得很的，人民生活痛苦，饱受压迫，于是有那么一些人就变成了洋人的奴隶，即买办。上海有所谓“外国火腿”，就是外国人踢了一脚，算作给一个“火腿”。到过上海的人，还看见过有的公园有“狗和华人不准入内”的牌子。民族战争就反对这些东西，外国民族压迫中国民族是不行的，我们要独立。外国野蛮的法西斯压迫中国人民，不讲道理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要求独立！中国如果没有独立就没有个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政治上要这样作，经济上要这样作，文化上也要这样作。广大群众没有清楚的、觉醒的、民主的、独立的意识，是不会被尊敬的。讲到我们党内，这一点是不是有不同？是有不同的，党这个军队同人民的其他军队比较有许多特点，它是先进的

部队，是有组织的先进部队，比较别的组织更有组织，更加严密，更加统一，共同为着一个目标奋斗。如果没有这个统一是不行的，一个军队要听号令：立正、稍息，向左看、向右看，开步走、瞄准放，不然敌人在前面，一个往东放，一个往西放，是要被敌人消灭的。党这个军队也是一样，没有统一纪律，没有民主集中制，没有民主或者没有集中都不行。封建社会皇帝专政是不行的，那是封建时代的事。革命人民的民主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旧民主是不同的，它是更广泛的民主。党是人民中优秀分子的结合，大家是自觉地愿意受约束，就是承认党纲、党章，服从党的决议案，愿意自我牺牲。所以有些人就不能加入我们的党，他不受调动，他这样工作也好，那样工作也好，往东也好，往西也好，都得由他，而党员就要服从组织，服从决议。

我们党现在是不是统一了？历史决议案上写着空前的统一，这是说比较过去要统一，没有讲党是完全统一的。有的同志讲：“放下来没有问题，提起来问题很多。”这句话有道理。因为我们党在抗战时期发展了四五十倍，一九三六年有组织的党员才两万多，现在到了一百多万，这样大的党自然不免有各种意见的分歧，所以我们做了一项工作，就是开展整风运动。这是使党推向前进的运动，如果没有整风，党就不能前进了。那时分歧达到这样的程度：有一个王实味在延安写了一篇文章叫做《野百合花》，很多人愿意看。他一九四二年春季在中央研究院整风时出了墙报，他说也要整风，他那墙报受到欢迎。桥儿沟、南门外很多人都到研究院去看

墙报,引起我也去看了一次。当时,很多文化人总是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他们说边区没有韩荆州。我们说边区有韩荆州,是谁呢?就是吴满有、赵占魁、张治国。这个故事可以说一下。唐朝时,有一个姓韩的在荆州做“督军”,所以人们把他叫作韩荆州。后来有一个会写文章的人叫李太白,他想做官,写了一封信给韩荆州,把他说得了不起,天下第一,其实就是想见韩荆州,捧韩荆州是为了要韩荆州给他一个官做。因此就出了“韩荆州”的典故。那时延安有很多人想找“韩荆州”,但是找错了方向,找了一个打胭脂水粉的韩荆州,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韩荆州,就是“前线”上的克里空。他们找不到韩荆州在哪里,其实到处都有韩荆州,那就是工农兵。工人的韩荆州是赵占魁,农人的韩荆州是吴满有,军人的韩荆州是张治国。广大的党员还认识不清这个问题,即没有整风党是不能前进的。我们做的第二项工作是解决了生产问题,没有生产党也不能前进。当时我们没有东西吃,王实味挑动勤务员反对我们,他站在勤务员的立场上反对所谓“三等九级”,吃小厨房,因为那时大厨房没有东西吃,其实小厨房东西也不多。后来我们用发展生产解决了这个问题。那时边区老百姓要出二十万石公粮,还要运输公盐,负担很重,他们哇哇地叫。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唉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主席打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那时确实征公粮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从一九二一年共产党产生,到一九四二年

陕甘宁边区开高干会，我们还没有学会搞经济工作。没有学会，要学一下吧！不然雷公要打死人。当时我们的同志，不管是参加过万里长征的也好，千里长征的也好，老共产党员也好，抗战时期到延安的青年也好，延安人民对我们是什么态度？我说就是“敬鬼神而远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觉得共产党虽然很好，他们很尊敬，但是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他们就要躲避一点。直到去年春季，赵毅敏同志带着杨家岭组织的秧歌队，跑到安塞扭秧歌，安塞正在开劳动英雄大会，那些老百姓也组织了秧歌队，和杨家岭的秧歌队一块扭起来，我说从此天下太平矣！因为外来的知识分子和陕北老百姓一块扭起秧歌来了。从前老百姓见了他们是敬鬼神而远之，现在是打成一片了。还有到杨家湾小学工作的一位知识分子女同志，和在清凉山工作的一位知识分子医生，和老百姓结合得很好。我们各个根据地都有这样的共产党员，到那个地方就和那个地方的人民打成一片，为老百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因此，没有整风和生产这两个环子，革命的车轮就不能向前推进，党就不能前进了！从前《解放日报》有一段时间有三分之一的同志进医院，周扬同志也告诉我：鲁艺的学生每天早晨起来刚抬头就打瞌睡。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东西吃。如果我们解决了整风和生产这两个问题，我们的事业就会前进。整风是前进的精神基础，生产是前进的物质基础，我们党学会整风和生产是从不自觉到自觉的。我们的党现在比较统一了，可以说是空前的统一，历史问题也比较恰当地解决了。但是还有问题。那天在预

备会议上我已经讲过：我们党并不是完全统一的，我们还需要更高的统一，更高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民主，没有民主，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把意见搞清楚是不可能团结的。许多不公平的事情要逐渐走向公平。哪一天都有不公平的问题，因此我们哪一天也要解决问题。问题是解决了又发生，发生了又解决，我们就是这样地前进。中央和各级领导机关的领导同志，要注意听人家的话，就是要像房子一样，经常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为什么我们的新鲜空气不够？是怪空气？还是怪我们？空气是经常流动的，我们没有打开窗户，新鲜空气就不够，打开了我们的窗户，空气便会进房子里来。我们的房子是什么房子呢？是政治房子、政治工厂。开工厂就得有原料，有工人，有技师、工程师。原料为什么不够？人员为什么不够？就要想想自己的责任。有没有贴广告？广告大不大？有没有出高价收买原料？事实上原料并不要花什么钱，只要贴上“欢迎”两个字，各种原料就源源而来。所以各种各样的意见，都要让它发表，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老话，但很有意义。我要声明一下，如果有什么人讲起来讲得很好，做起来不兑现，他讲的他自己也不执行，那就不对。

讲到个性与党性，党性就是普遍性，个性就是特殊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础上的。没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党性是共同的性质，普遍的性质，全党每一个人都有的性质。譬如讲，

政策上的统一、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的纲领以及各部分的纲领、整风、生产等，这些应在原则上，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这是共同的。至于每一个党员是不是不相同？当然不相同，个性不能强同，人就有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各种各样的不同，工作也各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务等的不同。在军事工作方面又有军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的不同，党务工作方面也有根据地、沦陷区等各种工作地区的不同。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程度上人们也不相同，同一个人在幼年时期和年纪大时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也不相同。总之，有工作的不同，地位的不同，性别的不同，年龄的不同等等，抹煞这种不同，就是不让同志们发展长处。这些都不能统一在一条轨道之上。太阳系有九大行星，就是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地球也是一个。它们各循其自己的轨道，按着一定的次序走，但它们都是太阳里裂变出来的，大小样子不同。至于行星上的东西，也不见得都是一样。太阳里没有人，我们地球上就有人，其他八大行星上面是不是也有一个有人，现在不能讲，我没有调查过。从前古时候地球上也没有人，没有水，没有空气，自从有了空气有了水，然后才能有生物，有了生物然后才能有人。天上的星星自己也常闹独立性，你们晚上抬头看，有时能看到有的星跑掉啦！它也闹独立性。总而言之，党员是有各种不同的个性，谁要抹煞各种不同的个性是不行的。抹煞各种差别，结果就会取消统一，抹煞特殊性也就没有统一性。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关于对党内几部分干部的问题。党内有几部分干部，平时感觉对他们不很公平，我们对这几部分同志要特别注意。

(一)理论工作者。我们整风讲实事求是，反教条主义，这样一反，好像理论工作者就不那样吃得开了。我们应该重视理论工作者，应该重视理论。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因此我们党内要学习理论，从前我在六中全会上讲过，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是很低的，现在比较过去是高了一些，但是还不够。现在我们党当然有些进步，但从中国革命运动的要求来说，我们的理论水平还不够。革命要求我们能说明中国的革命运动，说明这个运动的各个方面，说明它的内部联系，包括军事、政治、文化、经济，整个革命工作的各个侧面及其内部联系，并总结经验，把它提高起来，使之条理化，系统化。什么是理论？就是有系统的知识。马列主义的理论，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有系统的知识。

作翻译工作的同志很重要，不要认为翻译工作不好。我们现在需要大翻译家。我是一个土包子，要懂一点国外的事还是要靠翻译。我们党内能直接看外国书的人很少，凡能直接看外国书的人，首先要翻译马、恩、列、斯的著作，翻译苏联先进的东西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东西。还有历史上的许多东西，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带有进步意义的，还有一些民主主义者的东西，我们都要翻译。

因此我们要重视理论工作者，看得起他们，把他们看成

我们队伍中很有学问的人，有修养的人，要尊敬他们。

(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一定是理论工作者。我们党里头，知识分子的增加是很好的现象。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你们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魏、蜀、吴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高级的知识分子，有普通的知识分子，那里穿八卦衣拿鹅毛扇子的就是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群众要有知识分子，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奴隶主有为奴隶主服务的知识分子，就是奴隶主中的圣人，比如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我们中国的奴隶主也有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周公旦就是奴隶主的圣人。至于封建时代的诸葛亮、刘伯温，《水浒传》里的吴用，都是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因为整风审干，好像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大公平。好像天平，这一方面低了一点，那一方面高了一点。我们这个大会，要把它扶正，使知识分子这一方面高一点。是不是要反过来？那也不是。我们要欢迎他们为我们党服务，为我们党的利益而奋斗，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经济部门，我们的群众团体，要吸收广大知识分子为我们服务，我们要尊敬他们。

(三)在沦陷区、国民党区工作的同志。这些同志一到根据地里头，他们就感觉吃不开。根据地里的首长多得很，看起戏来，首长总是坐在前面，有大首长、中首长、小首长，这

些同志心里呕气。审干的时候又找了他们的麻烦。“你是哪里来的？”“上海？西安？”“有没有问题？”看了又看，有点不相信。“你住在哪一个旅馆？”“有没有介绍信？”因为我们根据地都要介绍信，以为在上海住旅馆也要介绍信，你说没有介绍信，那就怪得很。我们搞错了的就要说对不起，戴错了帽子的就要恭恭敬敬地把帽子脱下来，承认错误。这些同志对根据地的工作作风不习惯，是可以理解的，这个作风问题恐怕要三年五年才可以慢慢地一致。

(四)本地干部、本地军事干部。我在报告里头已经写了，要像看待自己的兄弟姊妹一样看待本地干部。我们的军队每到一个地方，就要帮助本地干部搞出军队来，搞出民兵、自卫军来，搞出地方兵团、地方部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搞出主力兵团、主力部队。我初到陕北，开头忽视了这一个问题。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所以陕北人就讲闲话。有人说，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出了这样的言论，是由于对本地一些军队处理得不好。至于华北、华中、华南各地有没有对本地干部和本地军队处理得不恰当的呢？如果有，我们应当承认是不对的，应当纠正，如我在陕北应当承认的一样。上面那些话，证明这些同志是受了气。我提倡做调查研究，但我到陕北后开始在这方面就没有调查研究，现在我们有了调查研究。同时希望在南方，在北方，在东方，在西方工作的地方同志多提出意见。我们要把窗户打开，让空气流通，听听消息，听听舆论，有缺点有错误的改正一下。这一条

搞不好就不行。这个问题，曾经引起我们历史上的大纠纷。这一次开完大会之后，还有很多人要到各地去。去年去湖南的有王首道、王震，去河南的有戴季英、王树声，出发的时候我就对他们讲过这些话。不要怕多讲，不要怕讲得舌疲唇焦，现在看来，舌也没有敝，唇也没有焦，我们说得还不够。世界上的人都是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也不是那样完美，多少还会有毛病，那叫什么？叫带着缺点的布尔什维克。你说他不是布尔什维克，那也很难讲，“我为党英勇奋斗，为什么还不是马列主义？”不能那样讲，我想这一条我也在内。如果说我是完全的布尔什维克，那不见得，说我一点布尔什维克气味都没有，也不是那样，许多同志给我写信，还是写此致“布礼”，我想了一下，我们可以叫带着缺点的布尔什维克。缺点中间有一个，就是背上了一点东西，比如讲多走了路，多走了二万五千里，就增加了身上的包袱。我不是讲每一个同志，或者具体指某些同志，请同志们不要见怪。但是有相当一些同志，走了二万五千里，变成了一个包袱，增加了他的负担，变成了一个驼子，因为他背的包袱太大了。你走的路多，但是你失去了根据地，江西根据地现在就没有了；人家没有走路，但是陕北还是一个根据地。同志！你走了路，把根据地丢了，人家向你要求一个根据地，你赔得起吗？你赔不起，我也赔不起。你如果要赔法币边币，还可以想一点办法，但是要赔江西根据地，就毫无办法。人家没有走路，但是有根据地；我们走了二万五千里的路，没有了根据地。你们看，就是用脚一尺一尺走的路走多了，就成了包袱。还有地

球走路，地球围绕太阳转几转就增加了几年寿命，年纪愈长，包袱愈大，年纪老的同志们不要怪我这样说，我今年也五十二岁了，地球走的路也变成了我们的包袱。青年同志也有他们的包袱。他们的眼睛尖，耳朵听得很远，前面来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我只能看到一个黑点，他们能看清眼睛、眉毛，他们就说你不行。当然眼明手快，这是他们的长处，但青年同志说老头子“昏庸老朽”，那可不行。青年同志不要讲人家“昏庸老朽”，老头子也不要讲人家“年幼无知”。大家都是从小幼来的，年幼知道得少，会慢慢地多起来。人家懂得的东西不如你知道得多，但你也不是什么都知道。要讲务农不如吴满有，要讲做工不如赵占魁，要讲当兵不如张治国。几万万样事情我们只能作一两样，那是有限度的，我们不知道的、不会做的东西多得很。如果我们把态度改好了，每到一个地方，就和那里的人民打成一片，尊重那个地方的同志，提高共产主义的觉悟，就能缩小山头主义。我们要肃清山头主义，就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这样才能缩小山头，消灭山头。所以我们要承认有山头，不承认也不行，承认以后要照顾各个部分、各个集团、各个历史不同的部分、不同的问题。如果他们的精神上被石头压着，有些石头还是我们自己的手放上去的，我们就要替他们解开。凡是他们精神上压着的石头，不论是大石头，中石头，小石头，我们都要替他们解开。是我们的手放上去的石头，就要用自己的手解下来，使得这些同志精神痛快，得到解放，发扬积极性。这样，才能够很好地团结全党，团结全国人民走向胜利。为此目的，我

们每到一处，不要当钦差大臣，要先看到人家的长处。大家都是新民主主义解放区的，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同志，不应该发生看不起的问题。内战时期我们曾在这个问题上吃了很大的亏。我们延安的同志大多进过党校，在座的同志是参加了七大的，你们懂得的东西更多，这是很好的，将来出去，人家一定很尊重你们，需要你们去传达七大精神，大家眼望延安，信仰延安。但是同志们，我们一定要采取上面所说的态度，不当钦差大臣，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鉴于历史上受了很大的痛苦，不自觉的盲目性实在要不得，要来一个自觉性，自觉地注意这一点。到一个地方，就要尊重那个地方的人民，那个地方的军队，那个地方的政府，跟他们搞好关系。这是共产党员的义务。

(五)经济工作和后勤工作干部。在军队里面有后勤工作，在整个根据地、解放区有广大的经济工作，有广大的同志在做这项工作。因为对经济工作过去我们提倡、宣传得不够，使得许多同志感觉到，在这些部门工作被人家看不起，没有地位。我曾经讲过，延安有一个同志告诉我，要他做总务处长，他不愿意当，为什么？因为人家看不起。人家问他做什么工作？他说我做一般工作。(笑声)为什么他说做一般工作呢？是因为做总务工作吃不开，现在我们应当使他们吃得开。有些同志认为，做军队工作、党务工作吃得开，在军队里面是做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吃得开，做后勤工作还是吃不开。因为他们吃不开，所以应该把他们放在一定的地位上，使他们吃得开。

(六)民运工作干部,工、农、青、妇干部。这些干部也感觉吃不开。有人把他们叫做“杂牌军”,其实都是“中央军”,没有什么杂牌军。大城市打开以后,广大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都要开展起来。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我们已经牺牲了很多工人同志,现在留下的做工人运动的干部不多了,可能有几十个,几百个,我们要照顾他们,尊重他们。同样,没有青年工作、妇女工作的干部也不行。

(七)抗战时期入党的干部。我们现在还叫他们是新干部,好像老干部就是万里长征来的,那就没有几个大人,不过一两万而已。同志们,在座的多数同志是老干部,因为你们富有经验,领导正确,所以被选为代表,这是很好的。在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做工作的同志,数目虽小,没有他们却不行,因为他们很有经验。但是如果把它当作包袱,那就不好,要轻轻快快。对同志们讲一个数目吧!现在,抗战时期入党的干部有一百一十几万,北伐、内战时期的干部顶多还有两万人,我们算一下,总共一百二十来万。这两万人的眼睛,不要只看着自己,还要看到那一百一十几万。否则,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味道大得很,在镜子前照了又照,似乎漂亮得很。唉呀,这样不好,我们年纪比较老,并不十分漂亮,还是他们比较漂亮,因为他们比较年轻。在抗战时期入党的大多数是青年同志,当然年纪大的也有。我们有我们的长处,他们有他们的长处,没有我们不行,没有他们也不行。两万人的眼睛要看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要尊重他们,不要使他们感觉这两万人是不好接近的,是不好谈话的,要谈话的时

候,先要想几天几晚,跟你谈话时,到底怎样讲法。要使他们像胡适之说的“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要怎样说就怎样说”,也就是要打成一片,使新老干部团结起来。抗战时期很长,对抗战时期入党的干部,不笼统地叫新干部,因为都叫新干部,好像只有我是老干部,我老子天下第一,你小子天下第二。

(八)党外干部。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如果在全中国,我们的党员有四百五十万,也只占人口的百分之一,而现在我们占的比例是在小数点之后再加两个圈才有数字。如果我们有四百五十万党员,在一百个人里,也只有一个共产党员。他的任务是什么?他的任务是团结九十九个非党人士。我们要组织军队,打倒敌人,就必须这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能团结多数人,团结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其他民主分子,那就不算是一个好共产党员。世界上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呢?要共产党干什么呢?共产党有无存在之必要呢?叶青说中国共产党没有存在之必要,那是反动派的提法,我们不赞成。我们自己也可以提出要不要共产党的问题:是因为世界上的小米太多,剩下了,非请我们吃不可,因此需要共产党,还是因为房子太多,专门要有一批房子给共产党住呢?当然都不是。世界上需要共产党,就是为了团结大多数人,组织军队,打倒敌人,建设新中国。此外还有什么事?没有了。这就是说,我们吃一点小米,吃一点大米,穿一点衣服,都是为了给人民做事,团结广大的群众,组织军队,打败敌人,建设新中国。如果革命不是这样的革法,那

末,就是专门革财政厅的命。有的人不革别的命,一心一意甚至几十年的功夫,专门革财政厅的命,那是不好的。同志们不要见怪,我讲的不是哪一个人,或者哪几个人,不过我总有这样的感想,就是我们要做事情,就要了解了解,要研究一下,尤其是对各种所谓小事情,如生产、卫生、文化、民众团体、政权工作等各种具体工作。老百姓的许多东西我们要学,我们的知识很差,首先我的知识很差,运盐怎样运法,我不大了了,合作社怎样开法,我不大了了,我没有办过合作社。因此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任务,就是要学习。不然,我们就只好睡觉。如果我们做一个决议,要睡觉三年,各种事情都不做,那我们的知识还是不足。经验不够,就要研究,就要工作,在工作中进行研究。

党外干部占百分之九十九,只有他们和我们一起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单靠一个党员毫无办法,是不是这样?这是不是真理?完全是真理。他们中间有领袖,有干部,我们要帮助他们,培养人民中的优秀分子,同时尊重他们,和他们好好合作。对这些党外干部,将来我们各地的领导机关、组织部门要有调查研究,要有一些办法,教育的办法,团结的办法,开座谈会,谈心等等办法,对他们进行帮助和培养。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讲真话。那一天我讲过,我们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今天说这样一点,就是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偷就是偷东西,装就是装样子,“猪鼻子里插葱——装象”,吹就是吹牛皮。每个普通的人都应该如此,每个共产党人更应该如此。

什么叫不偷？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事情，把别人写的整本小册子调换上几个名词，就说是自己写的，把自己的名字安上就出版了。不是自己的著作，拿来说是自己的，这不是偷呀？！有贼。我们党内也有贼，但是个别的，很少的。这种事情历史上就有发生的，叫做“抄袭”。这是不诚实。马克思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就是恩格斯，列宁就是列宁，斯大林就是斯大林。哪个同志讲的就是哪个同志讲的，朱总司令讲的就是朱总司令讲的，刘少奇讲的就是刘少奇讲的，徐老讲的就是徐老讲的，张三讲的就是张三讲的，你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卫，蒋沈韩杨，都不要偷。

什么是不装？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孔夫子的学生子路那个人很爽直。他曾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讲懂得一寸，不讲多了。为什么世界上会出现“装”？为什么有人感到不装不大好呢？这是一个社会现象。偷是社会现象，装也是社会现象。装的现象现在特别多，在我们党内也特别多。为什么？他母亲生下来就要他装的？他母亲怀他在肚子里就在观音菩萨面前发誓、许愿，一定要生一个会装的儿子？当然不是，这是社会现象。我们党里面历来不允许装，不知道不要紧，少知道也不要紧，你知道多少就是多少，即使马列主义知道得很少，马列的书读得很少也不要紧。我提出我们要读五本马列主义的书，马克思的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是和恩格斯合著的，但主要是马克思著的，恩格斯的一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

的两本，一本是《两个策略》，一本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这两本书写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写的那两本书也写得很好，这四本书薄薄的，读完它不用花很多时间。此外，还有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比较厚一点。这本书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又有历史，又有理论，它是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成功的历史，这本书要读。前面四本书也既是理论的，又是历史的。马、恩、列、斯的书多得很，如果先读了这五本书，就差不多了。

还有一个是不要吹，就是报实数，实报实销。在座的同志不是讨论过历史吗？有的同志在发言中说，内战时期养成了一种习惯，向上级报告工作时，要讲好一点，夸大一点，才像样子。其实这不解决任何问题。我们的工作是整个人民工作的一部分，是全党工作的一部分，我们都有份，人民都有份。为什么我现在当首长？就是恰好要我当首长，没有别的道理。本来张三、李四都可以当，但是点将点到了我的身上，要我当。至于这一份家业是哪个的？是张三、李四的？都不是，是全党的，是全国人民的。延安是谁的？延安是全国人民的延安。我曾经和一个非党人士讲过，有人说延安是共产党的，这是不对的。说共产党在这里当首长，这是正确的，因为这个天下是我们打出来的。实报实销，要求我们的情报要真实不要扯谎，要把自己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向大家公开，让大家来参观。我这个旅，有没有马屎、驴屎、微生物，自己的眼睛花，看不大清楚，如果有，就来打扫一下，洗干净，扫

除官僚主义。有人说：姓毛的，你有官僚主义。我说：同志，你讲得很好。原来是人家来了两三年，我这个老爷没有同他见过一次面，也没有同他说过话，当然要得到一个名称叫官僚主义。我们就要扫除这个官僚主义。我提倡人家将军，有些事不逼我就做不出来。鲁迅先生进过，文章是逼出来的，如果不逼就写不出来。但是我们不搞逼供信的“逼”。今天你们把我逼得好苦，我在这个地方站得不亦乐乎。

关于讲真话，我们现在发一个通令，各地打仗缴枪，缴一支讲一支，不报虚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支为一支，两支为两支，是知也。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党的作风就更切实了。我们一定要老老实实。

我们共产党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党，一个二十五年来有了很多经验的党，一个准备胜利的党。我们要在全国胜利，我们有这个志向，全党要团结起来，为全国人民解放而奋斗！（热烈鼓掌）

根据中央档案馆提供的“第二次誊抄稿”整理刊印。

中央关于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的通知和毛泽东对决定稿的批语和修改^①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一日、二日)

—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首长，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转各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并转各省军区党委，志愿军党委：

兹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一件发给你们，望你们遵照执行。关于阅读本决定的干部的范围，依照本决定第五项的规定^②，请注意组织阅读和传达。志愿军方面应在适当时机由志司组织集体阅读，而不要将文件下达。

中 央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一日

① 本文第四、第五、第六部分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② 见本文第六部分。

二

周^①：

此件请你重打清样两份，一份存你处，一份连原稿交我再看一次。打清样时请校对勿错。

毛 泽 东

十二月一日

三

周：

此件已作第二次修改，有些是我修改的，有些是采纳各同志的意见，请你加以斟酌。再打清样两份（校正勿讹），一份用电报发各地，一份印发中央一级各处及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均交尚昆^②办。

我第一次修正原稿一份，各同志修正稿六份，均还你（只有林彪^③的未见交来），均请销毁。第一次发给各同志的原稿，亦请收回销毁。

毛 泽 东

十二月二日

① 周，指周恩来。

②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③ 林彪，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四

这一计划的重点是用一切方法挤出钱来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一九五二年是我们三年准备工作的最后一年。从一九五三起，我们就要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完成工业化当然不只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一切必要的轻工业都应建设起来。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但是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为了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就要付出很多的资金，而资金的来源只有增产节约一条康庄大道，这是应为全党同志所明白了解的。因此，中央于一九五一年十月召开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决定了这一方针；并于同月至十一月一日经过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通过了这一方针。务望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团体各党组，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各省委、市委、区党委、地委、各同级军区党委、各同级政府党组和各同级人民团体党组，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展开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使这个运动成为真正的全体人民运动，而为实现上述计划而斗争。必须认识：这一方针不是消极的，而是具有重大积极意义的。它是既保证朝鲜战争能够胜利又保证国内物价继续稳定的方针，它是积累资金、取得经验、加速国家经济建设的方针，它又是整肃党纪，提高工作效率和转移社会风气的方针，总而言之，它

是带动我们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全局都将迅速进步、并奠定将来伟大建设基础的方针。

五

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现在必须向全党提出警告：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中央人民政府不久将颁布惩治贪污的条例和惩治浪费的条例，各级领导机关必须仿照实行惩治反革命条例那样，大张旗鼓地发动一切工作人员和有关的群众进行学习，号召坦白和检举，并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督促和检查。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序不等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决。典型的贪污犯，必须动员群众进行公审，依法治罪。

浪费和贪污在性质上虽有若干不同，但浪费的损失大于贪污，其结果又常与侵吞、盗窃和骗取国家财物或收受他人贿赂的行为相接近。故严惩浪费，必须与严惩贪污同时进行。浪费的范围极广，项目极多，又是一个普遍的严重现象，

故须着重地进行斗争，并须定出惩治办法。

反贪污斗争和反浪费斗争的开展和深入，必将接触到各方面存在着的各种程序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工作作风。这种作风，是贪污和浪费现象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中央要求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在此次精兵简政的工作中，在展开全国规模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中，在进行反对贪污和反对浪费的斗争中，同时展开一个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凡在其所属机关、部队、团体、学校、或企业中发生了严重的贪污现象或浪费现象，而事前毫无觉察、事后又不厉行惩治者，称为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这种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虽然没有亲手参加贪污行为或浪费行为，亦应以失职论处，决不宽恕。

为着有力地彻底地消灭贪污现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现象，必须奖励那些不贪污、不浪费和毫无官僚主义习气的模范的单位和人物，从这些单位和人物与那些贪污者、浪费者和官僚主义者之间划出明显的界线来。

六

本决定一直下达到党的地委和军队的军党委。在省委或地委召集县委人员开会、在大城市市委召集区委人员开会、在省军区或军党委召集军分区和团级以上人员开会的时候，应将本决定发给他们阅读，最好是组织集体阅读，并向他们解释由他们所提出的疑问。其他干部相当于县委团

党委和大城市区委一级者均应使其有阅读的机会(用集体阅读的方法),但不得让不可靠的分子阅读,不得在任何刊物上登载,并不得遗失。为使本决定的基本方针和各项办法能充分见之实行,必须不厌求详地向干部进行解释,使他们明确地认识全局的情况和任务的重要性。

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 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

(一九五三年一月五日)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委、地委和县委，并告中央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

中央收到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意见的报告》^①，现转发你们(原文一万八千字，现压缩为六千字)。中央认为山东分局这样集中地暴露党政组织中极

^① 指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向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以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名义写的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意见的报告。报告说，我省区、乡、村等基层组织干部(某些县以上干部也在内)中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现象，已发展到极为普遍和极为严重的程度，但是不少领导机关，对于基层干部这些严重的错误，采取了官僚主义的态度，熟视无睹，漠不关心。有些党政领导机关，在群众向他们控诉或采取其他办法向那些违法乱纪的干部作斗争时，还无原则地姑息，替干部辩护。报告在列举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严重情况后指出：事实证明，官僚主义作风，是滋长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温床；反对官僚主义，是纠正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关键。应结合当前的中心任务和整党工作，对它们坚决地开展斗争。在这一斗争中，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采取思想教育与纪律惩戒相结合的方针进行处理，对于混进我各种组织的坏分子及完全蜕化变质、不可救药的分子，则应坚决地清洗出去。报告还提出了开展这一斗争的九条具体办法。关于领导责任和领导方法，要求各级领导机关给下面布置工作，必须同时不厌其详地交代政策、交代办法。必须有布置，有检查，有指导。每次工作总结均应总结干部作风。

端严重地危害人民群众的很多坏人坏事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意见,是很好的,是完全必要的。这件事应当唤起我们各级领导机关的注意。这个问题,不但是山东的,而且是全国的。我党在三反中基本上解决了中央、大行政区、省市和专区四级许多工作人员中的贪污和浪费两个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许多领导者和被领导的机关人员相脱离的这一部分官僚主义的问题,但对于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离开自己工作机关稍为远一点的下情,不了解县区乡三级干部中存在着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或者虽然对于这些坏人坏事有一些了解,但是熟视无睹,不引起义愤,不感觉问题的严重,因而不采取积极办法去支持好人,惩治坏人,发扬好事,消灭坏事,这样一方面的官僚主义,则在许多地区,许多方面和许多部门,还是基本上没有解决。即如处理人民来信一事,据报山东省政府就积压了七万多件没有处理,省以下各级党政组织积压了多少人民来信,则我们还不知道,可以想象是不少的。这些人民来信大都是有问题要求我们给他们解决的,其中许多是控告干部无法无天的罪行而应当迅速处理的。山东如此,各省市的情况,究竟如何,我们没有接到像山东分局这样集中反映的报告,但已有不少的材料可以判断,有很多地方是和山东的情况相似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

府内的反映的问题。就我们党政组织的领导任务和领导方法来说,这是交代工作任务与交代政策界限、交代工作作风没有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即没有和工作任务一道,同时将政策界限和工作作风反复地指示给中下级干部的问题。这是对各级干部特别是对县区乡三级干部没有审查,或者审查工作做得不好的问题。这是对县区乡三级尚未开展整党工作,尚未在整党中开展反命令主义和清除违法乱纪分子的斗争的问题。这是在我们专区以上的高级机关工作人员在至今还存在着不了解和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和不关心基层组织情况这样一种官僚主义,尚未向它开展斗争和加以肃清的问题。如果我们的领导任务有所加强,我们的领导方法有所改进,则危害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就可以逐步减少,就可以使我们的许多党政组织较早地远离国民党作风。而混在我们党政组织中的许多坏人就可以早日清除,目前存在的许多坏事就可以早日消灭。因此请你们仿照山东办法在一九五三年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山东的文件请你们认真地加以研究,并在党刊上登载。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各级党委应有决心将为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和清除出党政组织,最严重者应处极刑,以平民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此外,山东文件中全部精

神贯注在揭发坏人坏事,这样做是必要的,这样才可以唤起全党同志的注意。但在开展反坏人坏事的广泛斗争达到了一个适当阶段的时候,就应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我们相信,山东和各地这种典型的好人好事是一定不少的。

中 共 中 央

一九五三年一月五日

缅怀毛泽东同志对湖北人民的关怀

曾 思 玉

今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全国各族人民满怀崇敬的心情，纪念对中国革命做出了不朽贡献的毛泽东同志。

回想起我在武汉军区、湖北省工作(1967年8月——1973年12月)期间，毛泽东同志几乎每年都要到湖北省来，少则住几日，多则住三四个月。他老人家对湖北人民的关怀，对我的谆谆教导，使我永远不能忘怀。

毛主席指示修建焦枝铁路

1968年夏，毛主席住在武汉东湖。一次他问我们：西边的铁路(指焦枝铁路)修了没有？我答：“没有修。”毛主席说：“中央、国务院早就定了修建焦柳路，总体规划和设计方案我都看了，焦柳路是从湖南的焦作经豫西、鄂西、湘西到广西的柳州。如果打起仗来，敌从从海上来，津浦路容易中断，京广路受威胁。若把焦柳路修好，纵深还有宝成路，可通云、贵，我们就灵活多了。你和其他同志及河南的刘建勋同志商量一下，先修好焦枝铁路。”

1969年夏，毛主席又来到湖北视察。6月26日我和张体学、刘丰带着地图向毛主席汇报修焦枝铁路的问题时，毛主席说：南北两线，我看还是北线好。你们是同意南线的，你们是从地方主义出发的。现在美苏两国争夺世界霸权，到处伸手，弄得世界不得安宁。我们要做好早打、大打的准备。我们不是他们的参谋长，天晓得他们什么时候挑起事端，发动战争，我们要做到有备无患。焦枝线修好了，然后再经湘西向南延伸修至广西柳州，同时修从襄樊入四川的铁路。形成四通八达的铁路网，就立于不败之地。你们同河南刘建勋同志商量一下，动员两省人民大力支援，与铁道部同心协力，争取时间把焦枝路修好，为在湖南、广西修焦柳路创造有利条件。

按照毛主席的战略意图，国务院、中央军委指示铁道部于1969年8月召开了修建焦枝铁路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务院有关部委和铁道部有关单位的负责同志。中央决定修建的焦枝铁路是毛主席讲的焦柳路的北段，它北起河南焦作，南至湖北枝城，是贯穿豫西、鄂西的南北重要干线。这条铁路的修建，对于加强战备，改善工业布局，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中央要求，要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实行人民群众和专业队伍相结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打一场修建铁路的“人民战争，”争取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建成通车。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具体修建工作由武汉军区抓总，成立“焦枝铁路会战总指挥部”，河南、湖北两省分别成立省

指挥部,各省指挥部下设办事机构。会战抽调的民工,从县到大队,依次编成师、团、营、连。营以上建立临时党委,连建支部,加强党组织的核心作用。河南、湖北两省的民工,在铁路专业队伍的指导和配合下,主要是完成全线土石方、中小桥涵、短隧道等工程;铁道部第四设计院负责全线工程的设计;第四工程局、大桥工程局、郑州铁路局和其他铁路局调来的铺轨队等专业队伍,在民工的配合下,负责全线的大桥、长隧道、铺轨等工程。

1969年11月1日,焦枝铁路全线破土动工,全国各地云集沿线的百万筑路大军,展开了一场大会战。隆冬季节,豫西、鄂西山区北风呼啸,大雪纷飞,然而工地上却热气腾腾,各路人马分工协作,呈现出“人民铁路人民建,千军万马战焦枝”的动人景象。

1970年7月1日,焦枝线建成通车。仅用短短8个月时间,就建成了一条全长753.5公里的铁路。当我们把焦枝线建成通车的喜讯报告给毛主席时,毛主席说,修铁路还打人民战争呀!说罢哈哈大笑,十分高兴。后来,周总理也肯定了修焦枝路是大打人民战争的胜利。

焦枝铁路的建成,为修焦柳线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对于促进豫西、鄂西广大地区的开发,对于宝丰、南阳、襄樊、荆门、宜昌和沿线城镇的发展,对于葛州坝水利枢纽工程、第二汽车制造厂、荆门石化总厂、荆襄磷矿等大型工矿水利企业的建设,对于长江、汉水的开发,对于沟通沿线各地和豫、鄂、湘、川、陕毗邻地区的贸易往来,都起了巨大作用。

毛主席关心江汉平原石油的勘探

1968年6月,毛主席在湖北视察谈到湖北能源情况时说:湖北江汉平原会有石油的,我曾问过李四光同志,对地球的构造研究得怎么样?他说对地球的了解还不到一张纸那样薄一层;从地质结构看,我国油气层分布于很广阔的地域。你们报告国务院,请石油部派专家和勘探队来探明情况。若江汉平原有油,战略价值可就大了。如果打起仗来,大庆和沿海地区的油田很容易被敌人破坏。江汉平原有石油,平时把油井封闭不用,战时启用,作用就大了。人没有饭吃不行,飞机、坦克、汽车没有油也不行。没有油,飞机、坦克、汽车再好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嘛!毛主席明确指出:你们武汉军区要管一管嘛!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当年8月,武汉军区即派人参加了五七厂(江汉油田)的领导班子,同时积极筹备对油田的勘探工作。在筹备工作中,我们了解到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康世恩同志在石油部江陵五七干校劳动。于是我们经请示周总理同意,请了康世恩同志等一些石油专家到江汉油田来工作。鉴于当时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势,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江汉油田会战由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委会统一领导指挥,在潜江地区办公。

1969年6月和10月,毛主席两次来湖北。在接见我和刘丰等人时,询问到江汉油田会战情况,强调指出:开发江

江汉油田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你们要从战争的角度去看待江汉油田。军队要介入油田的工作，一定要搞好油田会战。

11月上旬，我到潜江听取了会战指挥部情况介绍以后，传达了毛主席对油田的关怀和指示，大家非常激动，纷纷表示决不辜负毛主席和全国人民的厚望，一定要探明储量，把油田建设好。按照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支援江汉油田勘探大会战的通知》精神，来自全国石油战线、科研单位的工作人员及转业、复员军人和民兵共计12万人，汇聚潜江地区。

油田会战坚持走大庆的道路，学“铁人”精神，并请“铁人”王进喜同志亲自到江汉油田传经送宝。在整个会战的日日夜夜，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集体和人物。经过全体建设大军共同努力，1972年5月会战胜利结束。在探明江汉油田石油储量的同时，还探明了储量极为丰富的固体盐和卤水。在扩大范围探测中，又在河南南阳地区发现油气层。1969年底，荆门炼油厂奠基开工。经过不断扩建，形成了今天以江汉油田采油、潜江市石油机械工业、荆门炼油厂为主的配套完整的新兴石油工业基地。

毛主席督促加快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兴建

中央对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兴建早已做出决策，国务院有关部委也已做出部署，但由于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

状态,因此,二汽虽于1967年4月1日破土动工,但一直受到干扰,处于停工状态。一些职工离厂而去,留下的职工陷入对厂址东、西方案的激烈争论中。所谓东方案,是认为十堰山区狭窄,厂房摆不开,要东迁至谷城。西方案则坚持在十堰建厂。为了解决东、西方案之争,国务院有关部委组成工程组,再次到现场勘察比较,维护西方案。十堰厂址基本不动,有些分厂考虑外建。我和其他同志于1968年夏也到谷城、十堰地区进行现场察看,听取了双方的意见。考察后我们亦认为在十堰地区建厂为妥,并把坚持在十堰地区建厂的意见报告了毛主席,同时向周总理和国务院作了汇报。毛主席指示说:二汽厂址要尽快定下来,争来争去有什么好处?1968年11月19日,周总理指示:“二汽厂址可以确定在湖北省郧县十堰地区进行建设。”一锤定音,这才结束了多年来的厂址之争,使二汽在武当山区的十堰镇扎下了根。接着,国家计委、国家建委批准二汽建设方案,设计生产3种车型(为适应战备需要,首先生产两吨半军用越野汽车),年产汽车10万辆。这样,二汽建设蓝图开始在十堰逐步实现,扭转了停工局面,离开工地的职工陆续返回施工现场。

二汽的建设,是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在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以及100多个企业厂家、科研单位的支援下展开的,汇集的建设队伍多达10万人。对于这样一支庞大的建设大军,必须建立统一的领导机构。1969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一机部、武汉军区在十堰召开了建设二汽的现场会议,全国106个单位参加。会议着重解决了3个问题:第一,

成立了二汽建设总指挥部；第二，确定了总体部署方案；第三，安排了建设总进度。由于确定了建厂的大政方针，健全了领导机构，各项工作迅速展开，开始了大规模的施工建设。

1969年4月，一机部批准二汽生产5吨民用载重汽车和3吨半军用越野车样车。年底，二汽即试制出3吨半军用越野车样车。经过努力，二汽在初期建设过程中陆续试制出3种型号样车，为以后产品的改进、提高、完备打下了基础。

1970年7月3日，我们到十堰工地上召开二汽、郧阳地委、专署部分干部和工人代表会议。7月4日又在二汽召开了座谈会。我在会上除讲了建设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外，强调指出：二汽建成之后，十堰将出现一个几十万人的中等城市，二汽与郧阳地区两家要全面规划，在城市建设、服务设施、交通运输、造林绿化、吃水用水、用电问题上共同商量，科学地规划。

1971年6月10日，二汽总装车间第一条汽车总装配线安装试车成功。从21日开始，正式在装配线上装配汽车。经过三四个寒暑的奋战，到1973年，第一期土建工程已基本完成，进入了投产前的调试阶段。

在二汽艰苦创业的过程中，十堰市因车而建，因车而兴，工厂林立，高楼栉比，规划得当，文化发达，交通便利，已经发展成一座新型的汽车工业城市，对开发鄂西山区，促进城乡经济繁荣，发挥着巨大作用。

毛主席赞成兴建葛洲坝

长江是世界第三大河，流经我国 10 个省、市、自治区，流域面积 180 多万平方公里，水利资源极为丰富。三峡河段，是拦腰筑坝、开发长江最理想的地段。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毛主席十分重视长江流域水利的开发。毛主席多次视察长江，听取汇报，作过许多重要指示。1953 年毛主席在听取有关情况的汇报后指出：“费了那么大的力量修支流水库，还达不到控制洪水的目的，为什么不集中在三峡卡住它呢？”1956 年 6 月，毛主席又提出“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宏伟设想。1958 年二三月间，周总理率中央、地方有关负责同志和中外专家 100 多人，察看了荆江大堤和三峡坝址，主持了讨论会议，提出并通过了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的规划意见。

我到湖北工作后，和省里其他同志一样，深感湖北缺煤，但水资源占优势。要使湖北经济发展，必须大力开发水利资源，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非在长江上打主意不可。我们根据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研究成果，经反复讨论，认为以在长江三峡地区三斗坪建坝的方案为宜。

1969 年 6 月间，毛主席来武汉视察，我和刘丰、张体学同志向毛主席请示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问题。毛主席笑着说：你们想在中国第一条大河——长江上兴建大型水电站能行？有把握呀？张体学同志说：“实践中学习再学习。”

毛主席说：你们胆大，有股干劲，精神可佳。你们讲一讲在长江上兴建大型水电站的总体设想。张体学同志回答：“这个中方案，淹不到重庆，要淹万县一部分地方，蓄水 80 亿立方米，装机容量 600 万千瓦，10 年时间投资 30 多亿元。毛主席笑着说：我看一上马，就要 50 亿之多。修这么大的水库，打起仗来敌人丢原子弹一炸，下游统统被水淹掉。要考虑原子弹的问题。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有个叫林一山的，这个人有点干劲，过去我跟他谈过长江的流沙问题，水土保持问题。我看上游要修几个坝，重庆以上的金沙江要修两座坝。长江是金沙江、雅砻江、岷江、沱江、嘉陵江、乌江汇成。这是大的，小的不算。大概是六条江汇流到长江的。四川实际“六川”。你（指我）去过三峡吗？（我答：“没有。”）宜昌江段弯道多，江面不宽。你没有去过，可以坐一条船去看一看嘛！也可以到重庆去看看嘛！我过去是从上游重庆下来的。

我们很快到了三峡进行勘察，进行了研究比较，仍认为三斗坪建坝方案可行。

1969 年 10 月间毛主席又来武汉视察，我们再次请示兴建三峡水利工程的问题。毛主席摆摆手说：大坝修起来了，战争打起来万一被炸，那么多水泄下来，不但要淹宜昌，顺流而下，连武汉、九江、安庆、南京都要遭殃。现在修三峡工程不现实，条件不具备。当时，毛主席从国际形势和“要准备打仗”的战略考虑出发，否定修建三峡大坝，是综观全局作出的正确决定。即使不考虑战争因素，就当时的国力和技术力量而论，也是难于办到的。我们很理解毛主席的决策。

毛主席又问：你们还有什么好的方案吗？张体学同志说：“不搞三峡三斗坪高层大坝，我们考虑可先在西陵峡出口葛洲坝建低坝，利用迳流发电。”这时我们把地图摆出来，照图叙述。长江穿越三峡，至西陵峡口的南津关，江面宽阔，水流变缓。峡口下流3公里处，江心凸起两个沙洲，左为西坝，右为葛洲坝。它们把江水分成3股，从左至右依次为大江、二江、三江。我们设想在葛洲坝和西坝上建低水头坝，拦截大江、二江和三江，既可发电，又能改善航运，还能实战练兵，积累经验，为今后修建三峡三斗坪高层大坝工程创造条件。毛主席详细听取了汇报，不时询问各方面的情况，然后笑着点点头说，这还可以，有道理。“赞成兴建此坝”。

毛主席还强调指出，你们要向周总理请示报告，并要得到国务院水电部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和支持，由中央决定。望你们在设计和施工中，不要把长江变成“短江”。要做到“三救”（救船、救水、救鱼），要有利于船舶航行，有利于蓄洪、排洪和发电，有利于鱼类的生衍繁殖。毛主席最后说：祝你们成功。

毛主席同意我们在长江建坝了，大家非常高兴，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立即全力以赴地投入准备工作。一方面组织葛洲坝工程设计组继续进行勘察论证，制订具体实施方案，提请国务院审定；一方面组建鄂西水电工程指挥部，进行人力和物资方面的准备。

1970年8月20日，我们以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名义，向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呈送了关于兴建长江葛

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10月初，周总理看了报告，表示同意，叫做准备。

12月24日，周总理向毛主席递交了兴建葛洲坝工程的书面报告，总理的报告言简意明地阐述了兴建葛洲坝工程的由来、效益和要求，以及兴建三峡大坝的构想。26日凌晨，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批复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文件上作了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中央还指示，经费、设备和技术指导，由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力和物资保障，由湖北省安排。党中央、毛主席的批示，标志着葛洲坝工程已经由论证、决策转入实施，万里长江第一坝的蓝图跃然纸上。赋予我们的神圣任务，就是要把决策变成行动，把蓝图变成现实，让长江更好地造福人类。

1970年12月29日，我们派专机把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的文件送到宜昌，张体学同志作了传达，极大地鼓舞了数万筑坝大军。第二天，也就是1970年12月30日，举行了隆重的开工典礼。然后开始整理场地，围堰，盖工棚，修公路，修铁路支线，兴建荆门大型水泥厂等，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正式破土动工。从湖北各地抽调的民兵及解放军工程兵、丹江水电工程纵队等共12万余人，热火朝天地投入到了紧张的施工建设中。

为了加强对工程建设的具体组织领导，在原工程领导小组的基础上，相继成立了工程指挥部和党委。由我任第一

指挥长和党委书记，张体学同志任第一政委，张震副司令员常驻宜昌，主持指挥部的工作。为了纪念毛主席 1958 年 3 月 30 日视察长江三峡，指挥部定名为“三三〇工程指挥部”。兴建这个工程，充分发挥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真是一处建坝，八方支援，群策群力，众志成城。中央有关部委积极支持；有关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承担着大量科研试验任务；生产厂家、交通运输部门全力以赴，保证设备、物资器材的供应；水电专家把兴建葛洲坝看作为国争光的工程，积极献计献策；数万名筑坝大军，头顶蓝天，脚踏荒滩，展开会战。

葛洲坝工程建设初期，也经过一段曲折，教训很深。主要是尊重科学不够，急于求成，仓促上马。在设计、施工等方面，都出现过一些问题，特别是在论证不充分的情况下，进行边设计边施工，造成严重质量问题。幸而周总理及时发现，果断决定停工整顿，重新修订设计，并指定有关人员组成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负责解决建设中的各种技术问题，工程建设得以走上轨道。

在建设葛洲坝工程中，建设者们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创造性融合起来，表现出了高度的责任感和无私奉献精神。他们有的远离家乡，有的放弃良好的工作条件，有的放弃了婚后的蜜月，从四面八方奔赴施工工地，投入到紧张的施工中去。他们工作不计时间，劳动不计报酬，长年累月地在露天、滩头、高空和水下廊道作业，冬冒严寒，夏熬酷暑，坚韧不拔，终于把大坝修建起来。建成的

葛洲坝工程,除建设时间比原定的长一些外,其它都超过原定指标。

1973年底,我离开了湖北。1981年有幸去宜昌目睹了大江截流的壮观景象。1991年重访夷陵,登上大坝,饱览了长江第一坝的风采。葛洲坝工程之浩大,规模之宏伟,技术之复杂,兴建之艰难,效益之巨大,居国内之首,在世界上亦属前茅。它的建成是我国劳动人民聪明才智的结晶,也是中国水电建设史上的一座丰碑。它的建成为实现三峡“高峡出平湖”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年在毛主席关怀下建造的江汉油田、荆门炼油厂、第二汽车制造厂、焦枝铁路、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等,都在现今经济、国防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件件一桩桩,都凝结着当年毛主席对湖北人民的深切关怀。每当我回想起在武汉工作期间,湖北建设事业在毛主席的关怀下迅速发展和毛主席对我们的谆谆教导,就倍感亲切,激动不已。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日子里,重温毛主席的教导,使我更加感到无论什么时候都应集中力量搞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当前,我们要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牢牢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集中全力发展经济,把中国早日建成具有现代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强国,以我们的实际行动告慰于毛主席他老人家。

(邱光前 康永宝 整理)

毛主席指导我们建设江苏

江 渭 清

恩格斯曾经称颂马克思：“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我以为，用这个意思称赞毛泽东同志也是恰当的。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他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和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道，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缔造了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奋斗，推翻了三座大山，并开创了举世瞩目的社会主义宏伟事业。他的光辉思想及丰富的社会实践，不仅为我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作出了有口皆碑的历史贡献，同时，也给我们子孙后代留下了极其宝贵的不朽的精神财富。

我长期在江苏工作，建国后毛主席先后来江苏 20 余次，我有机会聆听他老人家对我们省、市各项工作所作的多次指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现作片段回顾，谨以此文表示对毛主席的深切纪念。

1949 年 4 月，百万雄师过大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下，第三野战军的第八兵团率

先一举攻占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城，七、九、十兵团攻占了上海、杭州、福州等城。第一、第二、第四野战军一鼓作气乘胜南进、西进，解放全中国；我和一部分领导同志奉命留在南京，负责接管刚刚解放的这大大都市。

是年9月，我作为第三野战军的正式代表，赴北京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事。会前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并在北京饭店大厅里与我30年代就打过交道的张治中先生一起，陪毛主席散步、聊天。那天毛主席兴致勃勃，笑呵呵地听张治中先生讲当年我俩在长沙谈国共合作的故事。我也回忆起在中央苏区瑞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往事。毛主席说：“是啊，那时的政权只是几块根据地，是全国政权的雏形，现在就大不相同了。”我们都会心地笑了。因为几天后，毛主席就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50年代初的江苏开始并没有行政省的建制，只有苏南、苏北两个行政区，徐海地区属山东管辖，而南京是中央的直辖市。当时，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是刘伯承同志，副书记是宋任穷，副市长是柯庆施，我是市委副书记兼总工会主席。二野向西南进军后，接替刘伯承、宋任穷的是粟裕和唐亮同志。刚刚夺取全国胜利，建立新政权，执政党肩上的担子是非常重的。作为全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最高领袖，毛泽东主席日以继夜地工作着，从事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以及繁重的公务活动。

解放后的头3年,是我们搞经济恢复工作时期,逐步在旧中国留下的破烂摊子上建立、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我清楚地记得,毛主席在百忙的工作中,仍然非常重视和关心南京市的各项事业,因为这座曾是“虎踞龙蟠”六朝古都的原国民党首府城市,在海内外的政治影响很大,全世界都在瞩目,都想看看中国共产党人究竟能否管理好象上海、南京这样的大都市。毛主席对南京的工作曾多次作过重要指示,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求我们市委一班人,务必用革命的干劲和科学的态度,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将南京这座臃肿、膨胀、为官僚消费服务的城市,变为为人民服务的生产城市。这个观点,他不仅在会议上讲,还给我们发过文件、电报。

改造、建设南京城,这是一项光荣艰巨的任务。当时市委负责人中,我是分管总工会和工业建设等方面工作的副书记。为贯彻落实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首先将苏北、皖北流落在南京的20万贫困农民趁土改之际,疏散回原籍,参加分配土地和生产。另又处理安排散兵“游勇”等社会闲散人员和娘姨、奶妈、孤儿及娼妓10万人。这样一来安定了民心,为恢复和发展生产创造了有利环境。当时,市委分工由我亲自组织一批同志下基层,经深入调查研究,发现国民党的堂堂首都、号称大都市的南京城,被蒋介石统治管理了20多年,全市的产业工人只有几万人,基本上没有象样的重工业,虽然有些电讯工业,也纯系修配性质的,而工业产值仅有5000多万元,实在是可怜可悲得很。

怎样才能使新南京变成为人民服务的生产大城市呢？我们决定乘当时刚开始抗美援朝的大形势，首先发展有线电、无线电、电瓷、通讯、机械等工业项目，边生产边支援朝鲜前线；同时，也逐步建立起化学、纺织、食品、建材、五金、汽车等轻重工业。为保障这一决策的有效实施，我们从部队和地方干部中反复挑选，派出了一批工作能力很强的同志去担任几家有名的大厂的党委书记和厂长。如槐亚东、李乐山、杨益林、冯伯华等同志就是我们最早派去搞电子通讯和化学、机械等工业的领导人。以党的领导为核心，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并团结使用了一大批有知识、懂管理、通技术、精业务的工程技术人员，经几个方面的共同努力，初具社会主义特色的大工业生产终以崭新的面貌开动起来了。3年后，南京市、苏南和苏北行政公署合作，成立了江苏省，南京被划为省会城市，我调任省委第二书记。这样，因工作关系直接听到毛主席指示和教诲的机会就更多了。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振兴中华民族，改变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毛泽东主席始终不渝地进行大胆的尝试和探索。这的确是泱泱东方大国前无古人的宏伟事业。毛主席曾对我们讲，要求得国民经济的大发展必须以工业为主导，而在全国、各大区、省都要有结合地方特点的合理工业布局。对此，我们省委根据毛主席的这一思想反复考虑过，在传统的农业大国，如何去体现“以工业为主导”，又怎样来布局江苏地方工业。这些问题在我们江苏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中做出了答案。有了头3年经济恢复

的良好基础，我们决定大体上苏南地区以发展轻工业为主，苏中、苏北地区以发展粮油食品加工业为主，而南京市和徐州、海州则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经过 5 年的努力实践，据 1957 年底统计，全省的工业总产值已达 32 亿多元，比 1949 年底南京市加苏南、苏北和徐州、海州合计数增加了近 3 倍，这实在是了不起的发展。就其中的汽车制造业来说，南京的汽车工业在 50 年代已跃居全国之首。毛主席曾提出，要东北长春汽车制造厂的厂长去南京汽车厂学习，当 1 年副厂长，认真学习他们的设计、工艺及生产管理经验。

毛主席历来坚持从中国是一个落后农业国的国情出发来制定革命和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新中国建立后，他曾用了大量精力关心和指导我们国家的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事业。他老人家常说，中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农业大国，要实现工业化必须特别注意农村工作，“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农业发达了才能更好地支援工业。毛主席的这一思想，闪耀着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光辉。

早在 1950 年 8 月，毛主席就对淮河的治理问题作了重要批示，请周恩来总理布置江苏、安徽、河南 3 个省的省委，要把治淮作为中心工作来抓。他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后来，我陪同毛主席在苏北地区视察时，他又当面向我交待说，我们都是农民出身的，深知农民的疾苦，不首先解决其温饱问题，几亿农民怎会拥护我们？历代苏北、皖北水患严重，农业落后，一月无雨就旱，一月三雨便涝，要彻底改变这种面貌，必须先从水利着手，解决命脉问题啊！毛主

席的指示真是高瞻远瞩，语重心长。

我们江苏根据毛主席一系列指示精神，统一思想，组织班子，发动群众，具体实施，打赢了一个又一个水利战役。如：治理淮河、拓宽运河、导沂整沭、疏浚入江水道、修建大型河闸、建设机电排灌网等等。党和政府有关兴修水利的决定，都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江苏大地，尤其是苏北农村，千百年来水灾、旱灾、蝗灾、兵灾，天灾人祸连绵，民众苦不堪言。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号召全党重视农田水利工作，首先解决几亿农民的吃饭穿衣问题，这确实具有无比的感召力。人民群众凝聚在党的周围，用勤劳的双手建设自己的家园，在与天斗与地斗中焕发出冲天的干劲。有许许多多战天斗地的场面是非常感人的，亲临过现场的人必将终身难忘。就说苏北灌溉总渠工程吧，50年代初全面开工，西起洪泽湖，东至黄海边，全长 336 华里，沿渠 18 个县的 72 万民工，仅凭着手挖肩挑，在短短 3 个月的时间里完成土方 7320 万立方米，使这一艰难工程在很短的时间内即胜利竣工。这在当时比较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应当算是个奇迹。加上不久又竣工了新中国第二大闸三河闸，可使里下河地区 1500 万亩农田免除洪涝灾害，加上其它配套水利工程，可灌溉苏北 2580 万亩农田，这些都是治理淮河最关键的工程，在国际国内都产生过巨大影响。许多友好国家曾派代表团前往参观学习，对新中国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短时间内就有如此巨大的改观表示由衷的钦佩。精神可以变成物质。实践又一次证明，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一

旦变成广大群众的自觉要求,就产生了治好淮河的巨大物质力量。

毛主席多次来江苏视察,我作为省委班子的班长也多次向他汇报工作,接受指示,听从教诲。可以说每一次与他谈话,都少不了要谈农业,谈粮棉油,谈农民生活的改善。他说,江苏应该是产粮大省,逐步解决了水利问题后,就要紧抓科学种田,粮、棉、油、麻、桑、果、药、茶、蔬等都要讲科学。他老人家自己就抽出时间钻研植物栽培学、土壤学、植保学、肥料学、种子学等科学知识,并要求各大区的书记、各省的书记等高级干部也要学。他每到一地视察,常会给当地的领导干部出题目考试,题目看起来很简单,例如:如何种植小麦、水稻?如何进行棉花的播种和田间管理?但有时算起细帐来令人吃惊。我记得他就考过我几次,有一次是问我一亩棉大约要种多少株棉花?一株棉花大约有多少棉桃?我因为曾向农业专家请教过,并啃过几本农业科学知识的书,所以那次答题使他比较满意。他批评那些不爱学习和不懂装懂的领导干部,同时鼓励、启发领导同志努力掌握科学知识用以指导工作。谁要是在他面前公然说假话,一经发现,必遭批评,而平时他是很少发脾气的,总是循循善诱的。

50年代后期,毛主席亲自提出了“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这是他走遍大江南北,深入各地基层作充分调查研究后提出来的,是当时科学种田经验的高度总结。全国广大农村在实行农业八字宪法后都不同程度地尝到了甜头,农业普遍有所增产。毛主席一贯要求

我们要理论联系实际,要注重实践、实效,他当年就提倡各地党委书记都要亲手种植试验田,用自己动手、亲身体验的方法来取得发言权,从而改进我们的工作。他老人家虽年事已高,日理万机,但也在中南海丰泽园住所的院子里开了一块地,亲自种上粮食和蔬菜。我们省委的许多负责同志,以及地(市)、县的领导同志们,当年也都这样做过。干任何工作,没知识,不懂行,又不肯学习,就一定干不好,是领导干部就免不了要说空话,瞎指挥,这样的人说得越多,指挥得越起劲,其损失就越大,后果就愈严重。这早已成为一条深刻的历史教训。

南京是座美丽的城市,除去名胜古迹外,它的植树绿化也是闻名于海内外的。由此,我又想到了毛主席对江苏城乡绿化造林工作的多次关怀。1953年2月下旬,毛主席在陈毅、罗瑞卿同志陪同下来南京视察。当时我们正在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他接见了参加会议的省、地、市、县负责同志,并讲了话。第二天,会议照常举行,我陪毛主席一行去中山陵谒陵。时值初春,天气寒冷,但出了中山门,看到一排排整齐挺拔的法国梧桐树和雪松、宝塔松,老人家颇有感触。后来他又去了紫金山天文台参观,登高望远群山苍翠,可俯瞰石城却是灰色一片。他沉思了一会儿,对我说:“中山陵的树是国民党种的,我们共产党为什么不能把整个城市都绿化起来呢?”接着又说:“渭清啊,这件事你要负责抓,书记挂帅嘛!”我说:“主席,请您过几年再来看吧!”他笑了,“好,这就算我们的君子协定。”两年后,毛主席在谭震林等同志陪同

下又来南京视察，那次我随他一起去栖霞区的十月农业生产合作社参观。他与农民群众交谈得非常高兴，当走到村头时，他突然转过话题问我：“渭清，上次我们谈过城市绿化的事，依你看这郊区的绿化该怎么搞法？”我回答道：“我们已有部署了，根据具体情况作综合安排，打算搞防风林、用材林、薪炭林和经济林；针对树木品种不同，生产快慢不同，搞长短结合、‘公孙三代’，不久就会见成效的。”毛主席听了点头称是，随后问我这里的经济林将以什么品种为主。我回答说：“根据调查研究，很适合种水蜜桃树。”他听了很开心，说：“这可好，将来南京地区的水果供应问题也就能解决了，真正是造福后人啊。”

其实，自从毛主席第一次向我们交待了绿化南京城的任务后，我们省委就找了有关领导和一些专家们共同商量，最后决定：以法国梧桐为基本品种，带上雪松和宝塔松，有的地方种植白杨、垂柳、刺槐等。3年育苗，3年绿化，让南京城区凡是能植树的马路、通道两旁，统统都美化起来。绿化的区域逐步扩大到郊区，城区的一些新辟干道，后来也种上了雪松、宝塔松等大株植，并将生长期缓慢的矮小品种龙柏树、冬青树作为城市美化的点缀品。我们坚持不懈地干了几年，确有成效了，接着再搞几年，绿荫成行成片了。如今的南京城市绿化之所以蜚声海内外，这离不开毛主席当年的远见卓识和南京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努力。到60年代，全国评选绿化先进城市时，南京就已名列榜首了。有一次，周总理召集全国各大区及省、市主要负责同志会议，会间我顺带

讲道：“前不久全国绿化先进评比，南京是第一，广州是第二，北京是第三，这样评似有不妥。我建议总理向主席汇报，是否应让北京市当第一，因为是首都城市，要考虑在全国的影响……”总理听我一说，哈哈地笑了起来，转过头便对陶铸同志说：“渭清同志的这个建议是为顾全大局啊，我首先表示同意，那么你们广州的那个第二名，是不是应该让给江苏南京呢？”陶铸同志非常顾全大局，连声答：“总理，应该的应该的，我完全赞成！”

再说 50 年代初，有一天，毛主席与我谈起徐州的云龙山，问我：“渭清啊，你说这石头山上能不能搞绿化造林呢？”我想了想，回答说：“世上无难事，石山绿化一是可以搞人工植被来解决；二是可以在石头上打眼，再向洞眼石缝中填土，播柏树种和植小柏树苗，我看总是有办法的。”毛主席说：“那好嘛，就按你说的办吧。”老人家还叮嘱道，这么的一座山，荒秃秃的多可惜，我问过专家，种一棵树就可以含吸住一吨水，既能防止水土流失保持生态平衡，又能美化环境产生经济效益，岂不一举多得。后来，徐州的同志们对山况作了调查，发现云龙山石是大片石灰岩构造，不适应马尾松生长，只能种柏树，因为柏树能抗旱。有了科学性，加上领导和群众的共同努力，终于实现了毛主席提出的号召，彻底改变了荒山的面貌。如今徐州云龙山一带，早已柏树满山青翠一片，加之 1958 年又在山脚下挖了一片人工湖，水波粼粼，湖光山色，大大美化了这座古彭城。我们江苏的广大干部群众，从自己的实践和取得的成效中加深了对毛主席深

邃思考的领会，这是造福后人造福全人类的千年万年大计啊！

敬爱的毛泽东同志离开我们已有 17 年了，他老人家生前 20 余次来江苏大地视察指导工作，在许多工厂、农村、学校、矿山、军营、机关都留下了足迹。他对江苏地区各方面工作给予了亲切的关怀，这不仅是我个人，也是江苏省人民永远不会忘怀的。毛泽东同志一生的伟绩，早已在 12 亿中国人民心中铸成了不朽的丰碑。我们如今纪念他诞辰 100 周年，就是要在党的十四大精神指引下，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搞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走下去，为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

回顾七大对我的深刻教育

戴 镜 元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是我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是一个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会，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动员大会，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次大会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是我党历史上一个伟大的里程碑。作为七大的代表，我有幸参加这次大会，亲耳聆听毛主席多次讲话，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巨大的鼓舞。

这次大会取得的一个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七大郑重决定，毛泽东思想是我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是我党经过20多年民主革命斗争实践所得出的科学总结，是用无数革命先烈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最宝贵的历史结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实践证明了的、中国革命正确的理论原则。我党自成立那天起，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但是，党在幼年时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认识还很肤浅。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解决好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问题。大革

命时期，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但党和人民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继续顽强地战斗。经过前仆后继艰苦奋战，积聚了越来越大的力量。然而，大好形势又被几次左倾机会主义所断送，特别是1931—1934年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使革命力量遭到极其严重的损失，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失败，主力红军被迫长征，经军从30万人到长征结束时只剩下不足3万人。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红军在毛泽东同志指挥下，四渡赤水，二次占领遵义，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胜利到达陕北根据地。1934年10月，我从江西瑞金出发，跟随毛主席长征二万五千里，深切体会到，没有毛主席的领导，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没有毛主席的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可能要推后许多年。从毛泽东同志几次受打击、受排挤到全党承认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确立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革命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啊！当七大确定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指导方针的时候，我和全体代表都热泪盈眶，无比地激动和振奋，只觉得全身热血沸腾，充满了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无比深厚的感情和衷心信赖。

在七大期间，我进一步认识到作为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其精髓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

要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革命之所以从失败走向胜利，而后又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无不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结果。“左”、右倾机会主义者之所以把革命引向失败，就因为他们不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个法宝，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百战百胜的武器，坚持实事求是就能胜利，违背了就要失败。大会为了让代表们永远坚持实事求是，发给了每个代表一个纪念册。在纪念册的扉页上，写的就是毛主席手迹“实事求是”4个大字。这本纪念册，我至今仍然珍藏在身边。

我时常想起毛主席有关实事求是的教导，具有无比的威力和生命力。1943年6月，蒋介石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狂叫“解散中国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同年6月下旬，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部队闪击延安，妄图一举消灭我党我军首脑机关，夺取陕甘宁边区，挑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我党我军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就是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智取胜的一个典范。当时蒋介石、胡宗南把驻守黄河河防的第三十四集团军撤离河防向陕甘宁边区秘密开进，妄图一举攻占延安。形势十分危急。我军在延安以及在边区的留守部队和地方武装不过2万多人，而胡宗南在边区周围原有两个集团军（三十七、三十八集团军），加上三十四集团军共40万人，敌众我寡，当时要在军事上打退敌人的进攻是比较困难的。毛主席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中央军委叶剑英参谋长的建议，作出了英明的决策。为了有效地粉碎国民党顽固派进攻边区突袭

延安的企图，一方面在军事上做好必要的自卫准备，一方面使用我军获取的国民党军事情报，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进攻边区、夺占延安的阴谋，作为退兵之计。7月4日，朱德总司令致电胡宗南，6日致电蒋介石、何应钦，严词质问国民党为什么“调兵遣将，准备进攻边区”；7月7日，新华社发布新闻，公开揭露蒋介石、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7月9日，在延安召开了军民紧急动员大会，发表了《关于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7月12日，毛主席又为《解放日报》撰写《质问国民党》的社论等，在政治上充分揭露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破坏抗日的罪行。由于我陕甘宁边区军民进行了充分的自卫准备，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和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人士也纷纷集会，声讨国民党顽固派，支援陕甘宁边区的反顽自卫斗争，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胡宗南被迫停止了对边区的进犯。党中央退敌的英明决策，是在深刻了解了敌、我、友各个方面的实际情况及其相互间的联系的基础上作出的，这是实事求是、以智取胜的光辉胜利。

我深切体会到，自己在革命征途中，能为党为人民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完全得益于党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得益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决心把遵循毛泽东思想，坚持实事求是，永远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七大还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充分发扬民主。大会对3个主要报告，都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尤其对毛主席的政治报告，先后讨论修改达9次之多。每次讨

论,都有补充修改的地方,大会总是集思广益,积极采纳大家的意见,有时尽管只是一句话、几个字的修改意见,大会也都印发给大家再深入讨论。充分发扬民主的结果,达到了高度的集中,形成了全党统一的意志。这说明,集中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实现高度的正确的集中。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时,也充分发扬了民主。在选举前,毛主席专门讲了选举的方针:第一,对过去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不能一掌推开,只要他承认错误,认识并决心改正错误,还可以入选。第二,对中国革命在长期分散的农村环境中,不可避免而形成的“山头”,既要承认、照顾,又要缩小直到最后消灭。各个地方,各个方面的先进代表人物都可以选进中央委员会。第三,不要求每个中央委员都通晓各个方面的知识,但要求中央委员会这个集体,要通晓各个方面的知识,使中央委员会成为由各个地方、各个方面的优秀人物组成的,有威信的,团结的领导机构。当时要选 33 个中央委员,44 个候补中央委员。为了达到上述目的,采取了大差额选举办法。开始,同志们对有些过去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意见很大,预选时他们没被选上。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又作了选举的第二次讲话,深刻说明了应如何正确对待过去犯了错误,但承认和检讨了错误,决心改正错误的同志,使代表们受到了深刻教育。最后在正式选举时,一些过去曾犯过错误的同志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连错误最严重的王明也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对此,我体会很深,深刻认识到,发扬民主是要有无产阶级宽阔胸怀的。毛主席为了中国人民和

中国革命而善于团结那些过去曾起劲地反对自己，但实践证明反对错了的同志一道工作，他的博大胸怀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第二个特点是认真进行自我批评。过去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大多数进行了认真、诚恳的自我批评，有些同志对自己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检讨。如博古同志对自己过去犯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非常内疚和痛心。他发自内心、痛哭流涕地检讨了两个多小时，痛切地表示，要实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脱小资产阶级之胎，换教条主义之骨，重新做起，在毛主席领导下，多做对革命有益的事情。他的发言受到了全体代表的欢迎。

毛主席还深刻阐述了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深刻阐述了党的三大作风是我党区别于任何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毛主席根据长期革命斗争实践和整风的经验，以及党内还存在种种不纯思想的情况，特别强调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他深刻指出，反映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就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我体会，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认真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一定要从客观实际出发，而决不能从主观想象、一时的热情或死的书本出发，一定要在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实践中认识真理，又运用这种真理的认识去自觉地改造社会，改造世界，说到做到，不尚空谈，这样才能做到无

往不胜。

毛主席在政治报告中，通篇贯串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而且还集中讲了密切联系群众的问题。他谆谆教育全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出发。他特别强调：“要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我从当时的切身经历中体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做人民的公仆，一个心眼为革命，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为党的事业奋斗。

毛主席还特别强调开展自我批评。他以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写文章要反复修改，重要的文章要修改 10 多次来说明错误是难免的和进行自我批评的重要性及必要性。他深刻指出，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符合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毛主席这些语重心长的教导，都讲到了大家的心坎上，我们这些代表听得热泪盈眶，倍受鼓舞，浑身是劲，至今仍然记忆犹新，永志不忘。

毛主席在大会闭幕时，作了深刻而有深远影响的讲话。他以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号召全党，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搬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当讲到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时候，引起了全体代表的共鸣，全场顿时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人人激动，振奋不已，个个焕发出无穷的力量。毛主席还风趣地用文章是逼出来的，牛奶是挤出来的事实，教育大家不要怕困难，不要怕压力，要把困难和压力当动力。毛主席还说过，人就是要压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他说他的文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都是逼出来的，大家听了都深受教育。我当时理解，革命是在不断克服困难和压力中前进和发展的，胜利是在不断克服困难和压力中取得的。革命已经克服了无数困难和压力，取得了伟大胜利。但革命还将遇到很多困难和压力。在困难和压力面前，一定要跟过去一样，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决心，还一定要有恒心。只要有了这“三心”，像愚公一样，每天挖山不止，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任凭什么困难和压力，都是可以克服的，任何敌人都是可以战胜的。毛主席的闭幕讲话，把全体代表的情绪引向了高潮，极大地增强了全党必胜的信心、决心和恒心。会后大家都满怀信心，斗志昂扬，互相祝愿，摩拳擦掌，决心大干一场，夺取伟大胜利。

时隔48年之后，我觉得参加七大期间那激动人心的场面和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仍然使我激动不已，使我感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巨大的鼓舞，它将有力地鞭策我继续为党的事

业不懈奋斗。

不久前，我们党召开了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我党历史上又一个决定我们国家和人民前途、命运的大会，是又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是又一个伟大的里程碑。这次代表大会同七大相比，历史条件不同，形势任务不同，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同，但总的宗旨和目的完全相同，那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实现党的宏伟目标而奋斗。两个会议都要求我们坚持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七大在总结了 20 多年民主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十四大则在总结几十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 14 年来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教育培养了整整一代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在教育培养新的一代干部和人民。七大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制定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取得了伟大胜利。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定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大胜利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日新月异，祖国面貌焕然一新。事实雄辩地证明，十四大是七大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我从回忆参加七大的感受中，深刻地体会到，继承和发扬七大的光荣传统，就必须深入地贯彻十四大精神，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贯彻十四大制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自觉地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头脑，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下定决心，排除万难，齐心协力，艰苦奋斗，时刻警惕并坚决克服一切腐败现象、拜金主义与权欲思想等极端恶劣的错误倾向，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我向毛主席汇报农业合作化

张 玉 美

1953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二)上午9时许,我突然接到上级要我和地委书记李吉平同志马上去火车站等候的电话通知。我们到达火车站不久,见一列浅绿色专车由北往南,徐徐进站。车刚停稳,车厢内走下公安部长罗瑞卿同志和省委书记马国瑞同志。

李吉平同志把我介绍给他们,随后罗瑞卿同志说:“玉美同志请上车,吉平同志已经完成任务,你可以回去了。”

我上车来到接待室,马国瑞同志告诉我:“毛主席外出视察,想听听基层工作同志的汇报,省委经过研究,决定推荐你来完成这项光荣任务。”罗瑞卿同志随后说:“主席大年初一夜里从北京出发,沿途要作些调查研究,第一个就由你来向主席汇报。”

听说要见毛主席,还要当面向他老人家作汇报,我顿时心潮澎湃,惊喜万分。但转而一想,我事先一点准备也没有,而且自己文化水平不高,农村工作千头万绪,我能汇报好吗?再说,由于来车站仓促,我身上也没带钱,咋能白吃白喝白坐车呢。

我把这一想法告诉给罗瑞卿同志。他笑着对我说:“你

是主席请来的客人，我们自然管你饭吃，车票也不用买。至于汇报嘛，主席问什么，你就讲什么好了。”

我问罗瑞卿同志：“你知道主席叫我汇报什么内容吗？”

罗瑞卿同志答道：“这个问题不大好说。因为这是主席进京后第一次外出搞调查，估计各方面情况都会了解，涉及面可能宽些。特别是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情况，主席一向非常关心，让你汇报的可能性很大。”

随后，罗瑞卿同志又说：“主席夜间工作，这时正在休息，很快就会醒来，咱们到前边会议室等吧。”

于是，我和罗瑞卿、马国瑞同志一块儿走进南面车厢的会议室。只见车厢四周挂着古画和书法条幅，靠近车厢右侧，摆着拼成丁字形的长桌，上面铺着白布，桌子两侧放着整齐的沙发坐椅，整个会议室布置得既朴素大方，又清洁雅致。

在会议室，罗瑞卿同志首先介绍我与陪同主席视察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见了面。

不一会儿，车厢门外传来稳健有力的脚步声，所有的同志立刻站起来，毛主席出现在车厢会议室南边门口。

我快步迎上前去，两手紧紧握住他老人家的右手，热泪盈眶，千言万语竟不知从何说起。

这时，罗瑞卿同志说：“主席，这就是邢台县委第二书记、县长张玉美同志。”

毛主席听后，微笑着向我点了点头，并同我紧紧握了握手。随后拉着我走到会议室桌子东侧，用手指了指身边的沙

发椅，示意我挨着他坐在右侧。

接着，站在会议室桌子西侧的罗瑞卿、马国瑞同志和桌子南端的杨尚昆、何载（记录员）同志也相继落座。

毛主席身材高大，双肩宽阔，面容慈祥。虽然当时已年近 60 岁，但看上去不过 40 岁左右，显得十分年轻。他着一身灰色中山服，穿一双棕色皮鞋，虽然擦得很亮，但鞋帮上已磨起皮毛。

罗瑞卿同志见我只顾望着毛主席出神，便提醒我说：“玉美，这就是主席。”

我顺口答道：“见过。”

“在什么地方见过我呀？”毛主席惊奇地问。

“见过您的像片。”一句话把毛主席和在座的同志全逗乐了。

毛主席亲切地问我是什么地方人，多大岁数，读过几年书，我均一一作了回答。当毛主席听说我只上过 8 个月夜校，而现在认识不少字，主要是从工作当中学来时，便递给我一支钢笔说：“你写几个字，让我看看好吗？”

我说：“行。”

于是，我随手掏出装在兜里的笔记本，在上面写了“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 20 多个字，然后把笔和本一块儿递给毛主席。

毛主席看了之后，又默默地翻了一阵笔记本，笑着鼓励我说：“字写得不错嘛，相当于中学生了。你这不是‘农大’毕业了吗，已经够上农民知识化了。”

然后他抬起头，面向随行人员说：“看来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也要劳动化。”

接着，毛主席转过身问我：“家里几口人？”

“35万”，我回答道。

毛主席高兴地点点头说：“好，你这个书记心里装着全县人民哩！”

毛主席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我的紧张心情也随之平静下来。

毛主席问我：“建国后你们县镇压了多少反革命？这些人服管不服管呀？”“你们县‘三反’、‘五反’搞得怎样？”

我一一作了回答。

毛主席又用商量的口气问我：“把你们县互助合作的情况给我详细谈谈好吗？”

我马上说了声：“沾。”又觉着回答不妥，就说：“原来不知道给主席汇报，手头没材料，恐怕说不好，耽误主席时间。”

毛主席宽慰我说：“不要紧，你们怎么搞的，就一五一十地讲嘛。”

于是，我首先向毛主席汇报了全县的地理概况和互助合作运动的大致过程：邢台县自西向东，由山区、丘陵和平原三部分组成。抗日战争时期，山区是革命根据地，平原属敌占区，丘陵处于中间地带，敌我双方互相拉锯，属于游击区。随着三个地区解放时间的先后不同，互助合作运动搞得有早有晚，基本上呈梯形向前发展。老区搞得最早。那是在

1941年春，邢西县委和抗日县政府为了领导人民进行生产自救，度过灾荒，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出了“组织起来，搞好春耕”的号召，开始在根据地部分村成立变工队，组织互助组，并重点培养了王俊生、郭爱妮等带头开展互助合作的模范个人。1943年春，县委、政府响应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领导群众走互助合作道路，并在水门、折户等村搞了变工队改互助组的试点。1944年春，全县对互助合作进行了整顿，肯定了常年互助和临时互助两种形式，提出了“耕三余一”的口号，推广了水门村王俊生互助组农副结合、发展生产的经验，使互助合作组织进一步得到普及。1945年10月邢台解放后，开始向丘陵区扩展，后又发展到平原新区。

这时毛主席插话说：“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群众观点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生产运动才能开展起来。你这个地方是个老区，应当总结经验。农民一定要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不走不行。”

毛主席一边说，我一边赶忙往本子上记，有时记不下来，就先划个记号。

接着，毛主席问我：“你对情况这么熟悉，都干过什么？”

我告诉毛主席，我1938年入党后，一直没离开邢台。先在村里当支部书记，后到区里担任区委书记，参加过打日本、反磨擦，搞过减租减息、锄奸反霸、支前参战，领导组织过土地改革、互助合作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1952年从区里调到县里。

毛主席听后，连声说：“好！好！你是本县人，又长期在基层工作，是从基层一步一步上来的。这样好，人熟地熟，情况也熟。”

然后，他转过身对杨尚昆、何载同志打了一下手势说：“记下来，建国以后，干部应当稳定一段为好。”

接着他对我说：“继续谈吧。”

于是，我又向毛主席汇报了近两年来全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

1951年，河北省党代会提出，各县可试办一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1952年初，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结合本县互助合作时间早、基础牢的特点，决定采取梅花布点的方法，适当加快办社的步伐。我们按山区、丘陵、平原三大区域，选择水门、东川口、前炉子等7个搞得较好的村党支部书记和劳动模范，于12月中旬赴饶阳县五公村参观了耿长锁创办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回来后经过1个多月的宣传发动，7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先后全部建立起来。由于农业生产合作比互助组具有更大的优越性，所以7个社当年秋麦两季都普遍增产。这样一来，一下子吸引了全县农民的视线。群众说，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场上粮食堆成山。

谈到这里，毛主席点点头说：“是啊，农民就是经验主义者，办社就是为了多打粮食嘛。增产与否，应该成为检验农业社成败的主要标准，看来互助合作要比单干好啊。”

接着，我又汇报了到秋后种麦前，全县农业生产合作社

已发展到 20 个,参加农户 1270 户,占总农户的 2.2%。同时,新建社在内容上也有一些新发展,如尹贾乡的尹化成农业社,不仅土地入股,而且牲口也折价入了社。

毛主席听后把手一扬,诙谐地说:“不错呀,人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驴子也组织起来走合作化了。”在场的同志都跟着笑了。

我继续汇报说:“到目前,全县各区报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 200 多个,加上原先成立的 6400 多个互助组,社、组农户占全县总农户的 87%。”

毛主席一听,惊讶地问:“互助合作的进度这么快!原因是什么?”

我答道:“一个是我县互助合作有 10 多年的历史,组织起来搞生产互助早已深入人心。一个是我县试办农业社的实践证明,党中央在《决议》草案中提出的方针、原则及办法顺民心,合民意,广大农民群众打心眼里拥护欢迎。”

接着,我重点汇报了水门、东川口村建社时的情况:

水门村共有 120 户,是全县互助合作最早的模范村,群众基础很好。这个村从 1946 年土改后,就提出土地入股的要求,群众办社的积极性相当高。区里考虑到该村前后 10 多里、居住较分散、不便进行领导,原想以王俊生互助组为基础,先建一个二三十户的小社。结果会上一发动,第一批就有 80 多户报了名。邓天贵互助组当时没批准,干脆采取先宣布入社后报领导审批的办法,迫使县区不批也得批,真是动员群众缓入社比发动群众入社还困难。

东川口是个 70 户的小村，区里原计划以王志琪互助组为主，先成立一个 20 来户的小社。经过宣传发动，群众几乎全部报名，党支部只好采取“关门”措施，结果两次“关门”也没有关住。后来又开展了一次“倒宣传”，还是没有动摇群众入社的决心。前后只用了 1 个多月时间，全村就实现了合作化。1952 年，也就是建社的当年，粮食总产达到 27 万斤，比上年增长 12%。群众高兴地说，要不是农业社，咋能增产这么多。

这时，毛主席点了点头，无比兴奋地说：“是啊，多数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这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关键是我们领导采取什么态度。这两个村群众办社的热情很高，思想发动工作搞得也不错。”

接着，毛主席又问：“办社当中有什么困难和问题？”

我说：“主要是好建难管。”

毛主席夸奖说：“高度概括，接着往下讲。”

随后，我汇报了建社后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劳动管理。水门王俊生社仍实行“死分活评”，现正酝酿“包工包产”，问题不算太大。东川口王志琪社开始干活不评分，后改为“死分死记”，去年又改成“死分活评”，结果群众还是不满意。今年计划推行“按件记工”，情况估计会好些。

毛主席听后明确指出：“生产关系调整了，需要摸出一套劳动管理办法来，这个办法要能够反映多劳多得。”

我说：“通过试办农业社的实践，证明了农业社比互助组有更大的优越性，但也出现一些问题。”

毛主席关心地问：“都是什么问题，给我讲具体一些。”

我说：“开始入社时，多数村没什么阻力，但个别村群众认识不统一，思想斗争挺尖锐。有的富裕户仗着自己土地多、家底厚，老想搞独立，甚至和地主富农拉起手，与贫下中农唱对台戏，企图孤立瓦解贫下中农，阻碍互助合作运动。县委对此态度非常坚决，一方面支持贫下中农组织起来，参加农业社，一方面对思想不通的群众进行说服教育，对个别挑事或散布不满言论的严厉批评，属于地富分子的坚决打击，表现好的可吸收为候补社员，不好的不准入社。”

汇报到这里，毛主席用指头敲了敲桌子，果断地说：“这样好！以前是少数统治多数，现在是多数统治少数。经验来自基层，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我接着说：“农业社的另一个问题是分配办法不统一。有的是土地参加分红，有的是土地、牲口、果木树，甚至农具也参加分红。”

毛主席插话说：“牲口、果树、农具入股，股金不能高于土地，不然贫农就要吃亏了。”

接着，毛主席又问：“你们是怎样进行分配的？”

我答道：“农业社的分配基本上体现了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原则，比例多是地二劳八，也有三七和四六的。”

毛主席听后，摆了摆手说：“不要，不要。三七是个界限。三是社会主义，七是按劳分配，这个界限不要突破。破了这个界限，不是伤害劳，就是伤害地。”

我继续向毛主席汇报说：“当前农村还有一个问题，这

就是有的村出现了两极分化。特别是平原区个别村，有的户劳力少打不了粮食，还有的生活困难卖了孩子。而有的户却富了起来发了家，如前晋祠支书和 10 多名党员都是常年不下地，干活靠雇工。”

这时，毛主席问我：“对党员雇工是怎么处理的？”

我说：“撤了支部书记的职，党员进行批评教育。”

毛主席摇了摇头，似乎对单纯组织处理不大满意。

接着，毛主席又问：“还有什么问题？”

我说：“主要是刚才谈的这些。”

列车风驰电掣般地前进，不知不觉已到下午 1 点。这时，罗瑞卿同志请示说：“主席，该吃饭了，上午就到这里吧。”

毛主席站起来说：“不讲了，吃饭去。”

于是，我跟随毛主席从会议室北门穿过接待室和警卫车厢来到餐厅，只见餐桌上摆着果子酒和 4 个菜，主食是米饭、小饼和包子。毛主席先斟酒和我碰杯，接着让我吃饭，还不断往我碗里夹菜，让我每样菜都尝尝，使我感到在他老人家身边既亲切又温暖。

饭后，我随毛主席一块儿回到会议室。毛主席一边走，一边给我介绍车厢内悬挂的古画名称、作者和朝代。大约过了十几分钟，便又入座听我继续汇报。

毛主席问：“合作化搞起来了，妇女的情况怎样？参加没参加呀？”

我接着说：“参加了。不但现在参加了互助合作，早在抗

日战争时期就参加了。那时，老区的妇女组织起来搞纺织，在太行全区都出名。特别是折户村的郭爱妮，曾两次参加太行区群英会，被评为全区纺织英雄，1950年还出席了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受到您老人家的亲切接见。建国后，妇女由纺织转向田间生产，郭爱妮为使孩子母亲能够腾出手参加劳动，带头在全村创办了托儿互助组。随后，县委及时在全县进行了推广。到1952年初，全县托儿互助组已发展到458个，入托儿童1229个，解放妇女劳动力1881人。”

这时，毛主席欠了欠身子，提高嗓音强调说：“妇女要解放，必须在政治上解放，这是先决条件。但要真正解放，还必须在经济上和男人一样，必须参加生产劳动，这是基础。”

接着，毛主席又问：“《婚姻法》公布后，贯彻得怎么样？妇女地位提高了没有？”

我向毛主席汇报说：“《婚姻法》在全县已普遍贯彻。山区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开始贯彻边区制定的《婚姻法》，妇女和男人一样参加政治活动，一样参加生产劳动，真正实现了男女平等。县委对妇女工作也很重视，从1950年到1952年，3年有3位女劳模进京参加了国庆观礼，并荣幸见到您老人家，一时在全县全省传为佳话。”

接着，我又列举了郭爱妮、王葆荣、韩秀娥等妇女典型，具体说明了妇女地位的变化。

毛主席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随后对我说：“妇女的伟大作用在经济方面，没有她们，生产就不能进行。你们县妇

女工作搞得不错,要充分发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劳动,在生产中必须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

接着,毛主席又问:“县委在互助合作运动中是怎样进行领导的?”

我便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抓点带面等6个方面向毛主席作了汇报。

毛主席听后,满意地说:“你们的作法不错,概括起来就是积极领导,全面规划,典型引路,稳步发展。”

这时,窗外的光线渐渐发暗,工作人员进来,请毛主席吃饭,我便和毛主席一块儿共进了晚餐。吃完饭后,毛主席还从餐桌上拿了一个又红又大的苹果送给我。

饭后,列车将到郑州站。毛主席在会议室对我说:“玉美,今天你谈得很好。看来,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作法。今后有什么新情况、新经验,可写成材料报中央办公厅给我看。”

我说:“主席忙累了一天,对县里工作有啥看法,请给予指示。”

毛主席略微思考了一下,抬起头语重心长地说:“邢台是个老区,合作化可以提前。在合作化问题上,一定要本着积极、稳妥、典型引路的方法去办。你们县妇女工作也不错,要很好地总结这方面的经验。”

杨尚昆同志随后说:“主席的指示很重要。中央最近要将《决议》草案作为正式《决议》下达,具体可按这个文件办。”

接着，毛主席用商量的口气问我：“出过门没有？愿不愿跟我们到外地转转？”

我心想，自己连北京都没有去过，要是能跟毛主席到外地看看，那当然好。可又一想，这样做不合适。毛主席日理万机，连春节都顾不上休息，还要到外地视察，自己咋能给他老人家添麻烦呢。

于是我告诉毛主席：“县里已经安排召开三干会，这次我就不去了。”毛主席微笑着点点头说：“也好。”

火车徐徐进入郑州站。我告别了毛主席，下了车。临下车时，毛主席握住我的手说：“今后有什么事情就找我。”同时，让罗瑞卿同志打电话派人接我。

我在郑州住了一夜，第二天便赶回县里，在县委、政府领导班子成员中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和接见的场景，研究了落实的方案和具体措施。我们努力在工作中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使全县的互助合作运动揭开了新的一页。

1955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邀请王志琪进京汇报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情况，并把他的汇报整理成文。毛主席亲自修改，命题为《只花一个多月时间就使全村合作化》，还写了份量较重的按语。同年9月，县妇联制定的《关于发展合作化运动中妇女工作的规划》报送中央，毛主席阅后同样写了按语。以上两篇均收入1956年1月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不久，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全县927个初级社和33个互助组，合并升级为308个高级社，实现了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

岁月易逝，往事难忘。毛主席的这次接见至今已整整40年了，他老人家离开我们也已17年了。当年我这个35岁的基层干部如今也进入古稀之年。但是，毛主席接见我时那种虚心倾听基层干部反映和群众呼声的态度，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的作风，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精神，一直鼓舞着我勤勤恳恳为民办事，兢兢业业为党工作。

(王明哲 宋学玲 冯银魁 整理)

叶剑英与毛泽东的交往

范 硕

“导师创业垂千古，
 济辈跟随愧望尘。”

叶剑英在《八十书怀》中的这两句诗，真切地表达了他对毛泽东由衷敬仰和爱戴的深厚情感。半个多世纪以来，叶剑英献身于崇高的革命事业，跟随党和毛泽东，赤胆忠心，奋斗不息，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赢得了毛泽东的信任和倚重，但他自己却深感“愧望尘”，表现了他谦虚质朴的高尚品质。

叶剑英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漫长岁月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从下面记述的叶剑英与毛泽东交往的片断中，可以看出这两位伟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和珍贵友情。

一、在中央苏区，叶剑英拜毛泽东为师。在毛泽东被撤消对红军的指挥权后，叶剑英在红军学校和反“围剿”作战中仍坚持贯彻古田会议精神和毛泽东的战略方针。毛泽东称赞叶剑英是能上能下的好干部。

叶剑英真正与毛泽东相识，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剑英在苏联留学。1930年初回国，先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随后主动要求到中央苏区搞军事工作。经周恩来同意，他从上海出发，经香港、闽西，于1931年4月到达红都瑞金。

当时，蒋介石正调集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中共苏区中央局召集紧急会议，讨论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叶剑英作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部的负责人也参加了这一讨论。讨论中，有的负责同志主张大撤退，大转移，退出中央苏区，到云、贵、川去建立新的苏区，摆脱敌人。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些同志则坚持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在苏区里迎击敌人。

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由于当时中共苏区中央局的负责人打着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四中全会指示的旗号，因而其主张得到了许多人的赞成。叶剑英刚到苏区不了解情况，虽未明确表态，但倾向于

他们的意见。毛泽东始终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他从实际情况出发,坚持自己的主张。

毛泽东分析敌我形势说:敌军数量虽多,但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他们内部矛盾重重,各自为了保存实力,以邻为壑,且地形不熟,情况不明,给养困难,士气低落。而我军有3个有利条件:第一红军好,士气旺盛,上下团结,军民一家,求战情绪高,且有丰富的作战经验;第二群众好,苏区人民翻身得解放,分了田地,拥护红军,仇恨敌人;第三地形好,红军熟悉地形,可以把敌人引到我们预想的战场去消灭。

叶剑英还是第一次听毛泽东作这样精辟的发言,他边听边记,认真思考,心中顿时豁然开朗,改变了原来的看法。于是,他在会上发言,拥护毛泽东的意见。会议经过充分讨论,终于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准备在苏区内迎击和歼灭敌人。

接着,会议又讨论了如何打的问题。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又获得与会多数人的赞成,叶剑英也发言表示同意。

于是,第二次反“围剿”战役在毛泽东正确思想的指导下,在朱德、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红军以3万兵力,在15天内,由西向东横扫700里,连打5个胜仗,歼灭国民党军3万余人。叶剑英参与了这次战役的指挥。他在总司令部里,认真学习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作战的艺术,同时注意调查研究,掌握敌情、我情,逐步取得了运筹指挥的发言权。

第二次反“围剿”战役胜利之后,中央苏区军民在毛泽

东指挥下,又从7月至9月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战役的伟大胜利。

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关于战略问题的讨论和两次反“围剿”战役的伟大胜利,使叶剑英受到了极大的教育。他自己后来常说,那几个月使他的思想认识产生了关键性的“飞跃”。通过会议的争论和战争实践,他深深感到毛泽东是我党我军中最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毛泽东料敌如神,知己知彼,素孚众望,深得人心。他下决心拜毛泽东为师。他特地找到毛泽东,主动地向他汇报了自己思想变化的过程和体会。毛泽东对叶剑英这种谦虚的态度表示赞赏和欢迎。

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江西宁都召开。会议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有关决议和指示,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所谓“反倾向的斗争”,激烈地批评和指责毛泽东过去坚持的正确方针政策。会后,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以要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的名义把他调回后方,随即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由周恩来兼任。叶剑英当时已经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他虽未参加宁都会议,但对会议撤销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表示了不同意见,他仍然拥护毛泽东的作战方针。

宁都会议后不久,中共临时中央又电示苏区中央局,令叶剑英和刘伯承对调,叶剑英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并兼任瑞金卫戍区司令员。

叶剑英到工农红军学校后,虽然毛泽东已经离开红军

领导岗位,但叶剑英在领导学校工作的过程中,仍然继续贯彻古田会议精神和毛泽东倡导的从战争中培养干部的训练方针。他在刘伯承建校经验的基础上,参照苏联军事院校和中国黄埔军校的办学经验,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进一步修订了红军学校的军政训练计划,同时将红军浴血奋战的宝贵经验加以整理和总结,用于教学实践之中。他邀请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到校作报告,并给以指导。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反“围剿”战役时,叶剑英被任命为中央苏区东南战区总指挥兼政委。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叶剑英又被调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兼第一方面军参谋长,后又兼任建宁警备区司令员、闽赣军区、福建军区司令员等职务。他在前方参与指挥反“围剿”的作战中,仍然尽自己最大努力,贯彻毛泽东制定的“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并向军委提出正确意见,尽量缩小左倾错误领导者“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方针所造成的影响。

但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叶剑英负责指挥的一次战斗失利,为此他主动承担责任,并作了检讨。而对叶剑英怀有成见的李德,即借口把他从福建前线调回军委总部任四局局长。叶剑英对这次“降职”使用并不计较,任劳任怨,积极工作。他说:“那时李德打击我,把我参谋长撤了,我当时考虑到,革命事业还很长,我做什么工作都是为革命,不能斤斤计较。”他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同情和保护。后来,毛泽东、周恩来夸奖他是能上能下的好干部。

二、在长征开始突围中，叶剑英留恋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发出慨叹：“越过千水与万山，红军西游何时还？”遵义会议前后，叶剑英坚决拥护毛泽东重新领导党和红军。在危难中，叶剑英首先想到毛泽东，患难见真情。

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在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下接连失利。1934年5月间，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仍没有适时作出转变战略方针的决断，转移的准备工作也只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进行。

1934年10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决定将军委、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部队组成“第一野战纵队”，又称军委第一纵队，叶剑英任司令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李德等随其行动。

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叶剑英率领军委第一纵队从瑞金等地出发西进。

在突围行军中，叶剑英看到部队处处被堵截，被动挨打，损失惨重，对比之下更加感到毛泽东领导的正确。联想到丢掉中央苏区后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他情不自禁地吟出“越过千水与万山，红军西游何时还？”这样的诗句。他日夜盼望迅速恢复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1935年1月15日，党中央经过充分酝酿终于在遵义

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会议改组了党中央领导，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成为中国革命的一次伟大历史转折。

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纵队未单独设立司令部，由总司令部兼理。叶剑英在总司令部拖着带伤的身体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作战，日夜守候在作战值班室，处理紧急军务。

叶剑英十分关心遵义会议的进展情况，热切期望能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当他得知会议的结果时，十分高兴。他衷心拥护会议的正确决定，拥护毛泽东的领导。他冒着大雨，连夜向部队传达会议精神。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在遵义附近与敌人兜圈子。一天，中央机关行军到一条山谷时，突然从北边山坡上冲来敌军一个连的兵力，向中央机关人员猛烈开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在敌射击圈内，情况非常危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叶剑英率队从后面跟了上来。他亲自带领一个排迅速冲上南面的制高点，集中火力向北边压下来的敌人还击。敌军被击退，中央机关人员转危为安。

1935年2月，叶剑英奉命前往三军团任参谋长。3月上旬，中革军委在打鼓新场附近召开重要军事会议，会议中间，敌机突然来空袭。叶剑英眼疾手快，一把拉着毛泽东的

手,跑出屋子到山脚边的茅草地里隐蔽起来。患难见真情。危急时刻,叶剑英首先想到的是革命领袖的安全。

长征途中,叶剑英两次为中央机关解围,保护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故事,在红军中传为佳话。毛泽东十分赞赏叶剑英遇险不惊,急中生智的胆识。

三、长征途中,叶剑英为党立了大功。

毛泽东称赞叶剑英“吕端大事不糊涂”。

1935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然而,就在广大干部战士欢庆会师的日子里,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与党中央之间,在红军前进方向和战略方针上,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

党中央根据华北事变后,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已走向新的高潮,华北已成为抗日斗争前线的形势,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但张国焘却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看不到革命形势发展的趋势,主张红军向边远地区实行总退却,提出向新疆、青海、西康发展的意见。他仗人多枪多,向党中央闹独立。为了解决这一重大战略方针问题,党中央于6月26日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讨论,张国焘勉强同意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数人关于北上的意见。中革军委根据这次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和作战部署,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但张国焘回到驻地

理县后，立即致电中央，仍坚持南下，并在部队中散布不信任中央的言论，策动他的支持者向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名单，请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并给予“独断决行”的大权。中共中央坚决拒绝了张国焘的无理要求。但为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中央于7月18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这才勉强同意四方面军向松潘西部的毛儿盖前进。党中央决定派叶剑英、李卓然等到四方面军工作。

7月21日，中革军委决定以原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并应四方面军徐向前的要求，任命叶剑英为参谋长。

叶剑英接到命令后，向毛泽东等同志告别，毛泽东同他进行了亲切谈话。随后，他带领红军总司令部机关10余名作战参谋和机要干部，立即奔向毛儿盖，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工作。

8月3日，中共中央由于张国焘反对北上贻误战机，被迫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决定改经草地北上。据此，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将一、四方面军编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下，从卓克基出发，经阿坝北进；右路军在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下，从毛儿盖出发，经班佑北上阿西，党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可是，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出阿坝不远，便借口地理、气候、粮食等困难条件，拟令部队返回阿坝，妄图改变北上方针。他一意孤行，不但对毛泽东等人一再发给他电报进行劝

告置若罔闻,而且在9月9日密电陈昌浩,公然违抗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和决定,命令右路军南下,并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密电到来时,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正在开干部会议,陈昌浩正在讲话。译电人员把这份电报交给了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看了电报内容,觉得事态严重,需要审慎处置,他借故离开会场急速赶到中央驻地,把电报送给了毛泽东。

为了执行党的北上抗日的决议,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党中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率一、三方面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考虑到叶剑英的安全,通知他迅速离开前敌总指挥部回红三军。

党中央北上后,张国焘变本加厉,发展到另立“中央”,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并狂妄要求取消党中央。他的反党篡军的罪恶活动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如果没有叶剑英及时将情况报告党中央,使中央脱离险境,后果将不堪设想。

对于叶剑英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毛泽东、周恩来等在事后的讲话中多次提到,赞扬叶剑英“吕端大事不糊涂”,“板荡识诚臣”,为党为人民立了一大功。

四、到达陕北后，叶剑英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对叶剑英委以东征战役中路军指挥之重任。

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迫切需要对新的形势变化作出科学的分析，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在讨论党的战略方针过程中，大家在认识上并不一致。叶剑英积极提出建议，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1935年12月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瓦窑堡召开，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19日，毛泽东特复电叶剑英等：“对战略方针的提议均收到，我完全同意兄等的意见，洛甫同志及中央各同志在大会上均无不同意见，政治局已开了三天会，很好的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力量与任务。”

1936年1月底，毛泽东来到陕西省延长县，与彭德怀、叶剑英等召开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着重讨论要不要东征作战的战略问题。由于认识有分歧，会议围绕着“巩固地向前发展”还是“从发展中求巩固”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一些人主张“巩固地向前发展”，意思是要先巩固后发展。毛泽东则认为必须进入山西，在发展中求巩固。他说：“一般情况下，是需要巩固的向前发展。这是一般的道理。但今天在陕北的特殊情况下，必须从发展中才能求巩固。”

叶剑英是个胸怀坦荡的人，心里怎样想就怎样说。他原来也认为应该“巩固地向前发展”，但是听了毛泽东的分析，

觉得有道理,就放弃了自己原来的意见,他诚恳地对毛泽东说:“我原来坚持老原则,也认为要巩固地向前发展,没有看到这种特殊情况,我现在懂得了要从发展中求巩固的道理。我想通了。”毛泽东很欣赏叶剑英这种光明磊落、谦逊质朴的性格。

叶剑英一经认识到毛泽东这一方针的正确性,就不折不扣全力以赴地贯彻执行。他立即组织地方党政机关,做东渡黄河的准备。

毛泽东根据叶剑英报来的情况,决定20日20时发起东征战役。

东渡黄河后,为了发展胜利,中央军委决定以这一地区作为作战枢纽,组成右、中、左路军,分兵南下北上。叶剑英指挥中路军,负责牵制和吸引晋军主力,支援左、右两路军的进攻行动。叶剑英领导的中路军兵力虽然不多,但他英勇机智,巧于用兵,吸引和钳制了晋军主力,圆满地完成了军委的战略意图,受到毛泽东的赞许。

五、叶剑英奉毛泽东和党中央之命去 蟠龙、安塞、延安等地“侦察”,开展 对东北军、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

1936年6月15日,时任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副书记的叶剑英同李克农一起奉毛泽东和党中央之命去蟠龙、琉璃坡、石家砭等地,了解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的兵力部署和进军动态,及时向毛泽东、周恩来通报敌情;利用各种关系,

向东北军一〇七师、一一七师官兵进行政治宣传,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在此期间,为阻止敌军进攻瓦窑堡,他们向中央提出许多建议,并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进行了大量救护伤员、保障供给、整修道路等方面的工作。从6月15日至22日,一周之内,叶剑英亲笔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14封。这些信的内容涉及敌、我、友各个方面,深得毛泽东、周恩来的重视。他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对于推动统一战线工作和加强我党我军内部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7月9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要剑英到安塞附近侦察”。党中央派叶剑英到安塞领导东线工作委员会(又称东线工委),与朱理治、边章伍等一起作陕北地区东北军的工作,争取他们联合抗日。

叶剑英到安塞后,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立即深入到各地工委调查研究,于7月26日召开安塞、延安两县工委及县一级机关负责人会议,对工作进行了部署。在工作中,叶剑英及时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请示报告,发出了大量电文,有时一日数封,有时派人专送。他们的工作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和指导帮助。

六、毛泽东委派叶剑英在西安、南京与国民党代表谈判，开展统战工作。叶剑英从毛泽东的安全考虑，急电“毛不必去”南京出席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毛泽东对叶剑英出席蒋介石召开的全国参谋长会议，“单刀赴会”，“舌战群儒”，极为赞赏。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叶剑英工作更加紧张忙碌。他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在西安与各界抗日爱国人士频繁交往，听取他们的呼声和建议，商谈抗日救国的办法。7月9日，他将西安各抗日救亡团体的意见概括整理成4点建议，向毛泽东和党中央作了报告。4点建议是：促请南京政府派部队增援在卢沟桥奋起抗战的二十九军；红军立即作准备增援华北的动员；向在卢沟桥英勇抗战的二十九军致电表示支持和慰问；派人前往华北，组织抗日义勇军。

毛泽东当晚即复电叶剑英：“请答复救国会及各方，他们要求各事，我们都同意，并且正在做。请他们努力在外面与政府、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对付大事变的统一战线，唯有全国团结，才能战胜日本。”

叶剑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以中共和红军代表身份，继续与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等保持联系，就国共两党合作具体事宜、红军改编、使用等问题，进行会谈，并将谈判情形和有关建议及时报告给党中央。

7月底，叶剑英获悉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即将召开国防会议，蒋介石拟请毛泽东、朱德赴会。他立即将这一消息以“万万火急”电告毛泽东和党中央：“蒋目前的困难是平津陷后，和平无望，牺牲已到最后关头……蒋无可借口，亦无谎可说，蒋只有决心抗战才能维持统治。”叶剑英根据当时的情况，从毛泽东的安全考虑，在电文中建议：“毛、朱已在被请之列。我想毛不必去，朱必须去。免为汉奸人所借口。”

毛泽东和党中央采纳了叶剑英的建议，确定派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的国防会议和各种座谈会上分别发言。叶剑英在发言中，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着重讲了政略战略问题。

1940年3月，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各战区军以上参谋长会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出通知，邀请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和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参加。蒋介石企图通过会议统一口径，宣布共产党、十八集团军的“罪状”，进而发动更大规模的反共高潮。

当时叶剑英正因摔伤了胳膊进行治疗。但为了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党我军的种种诬蔑，阐述我党的方针政策，他带病出席，“单刀赴会”。

在会场上，叶剑英沉着冷静，针对蒋介石和各个战区参谋长的种种造谣诬蔑，他充分摆事实，讲道理，一一予以驳斥。由于他的演讲大义凛然，有理有据，合情合法，使会场上的许多军官心悦诚服。蒋介石垂头丧气，被迫放弃了立即向

八路军发动大规模进攻的阴谋计划。

后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大的一次发言中说，叶剑英在长征中获取张国焘的密电送给中央，立了一功，挽救了中央和红军，避免了损失。在重庆与国民党斗争，“舌战群儒”又立了一功，有这两条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七、在延安最高统帅部，叶剑英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毛泽东、朱德采纳叶剑英的建议，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

随着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叶剑英于1941年2月2日从重庆乘飞机返回延安。从此，他结束了长达4年之久的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的统战工作，回到毛泽东的身边。

1941年2月14日，毛泽东让中共中央书记处通令全军：“叶剑英同志已回延安，现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驻延安办公。”

因叶剑英曾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因此对敌、伪、顽、友等各方面情况了解得十分清楚，加上他本人的军事造诣和出色的谋略才干，在延安很快就成为毛泽东、朱德指挥全国敌后抗战的得力助手之一。

叶剑英作为军委参谋长，深知自己肩上的份量，日夜思虑着如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给中央军委当好参谋。当时由他代军委起草的许多文电，都要毛泽东、朱德审批后签发，

或者由他们联名发出，叶剑英很少用个人名义发出。毛泽东习惯于夜间工作，因此军委总部的一切工作节奏要适应这一特点，叶剑英也坚持夜间工作。同志们反映：叶参谋长工作细心谨慎，事事周到。

叶剑英十分关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1941年下半年，他与王稼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结合各根据地对敌斗争的实际，共同主持起草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经毛泽东、朱德审阅修改后，于11月7日由中央军委正式下达各根据地遵照执行。

随着这一指示的贯彻落实，叶剑英同军委总部同志一起认真整理和总结各根据地斗争经验，从群众的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套对付敌人的办法，经过整理上报毛泽东后转发各根据地。

为了及时交流、汇报敌、伪、友、我等各方面的军事动向，叶剑英组织总参谋部人员汇编了《每周战报》等国内和国际内部资料，因此受到毛泽东的好评。

1943年夏，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调动50万大军准备进攻只有三四万留守部队的陕甘宁边区。

叶剑英向中央建议：破例使用我们掌握的敌情动态，公开揭露国民党的进攻阴谋，发动全解放区军民以至全国进步力量，奋起反对和制止反动派破坏抗日、挑起内战的罪行。

毛泽东、朱德采纳了叶剑英的建议。一方面作好给来犯者以迎头痛击、保卫边区的自卫准备，一方面动员一切與

论,广泛开展宣传战,公开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兵力进犯边区、破坏抗战、制造内战的阴谋。

这一场以军事实力作基础的声势浩大的政治宣传战,赢得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同情。由于我方掌握了国民党军队的行动计划直至兵力部署、行军路线等确凿的细节,并对其揭露无遗,使得国民党当局十分狼狈,最后只好下令收兵。

八、毛泽东指派叶剑英参加军调部,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叶剑英主持后委工作,使后委成为中央的“最佳参谋部”。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由实行联共抗日的政策改变为反共的内战政策。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同国民党的反动政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经过1个多月的重庆谈判达成协议,决定尽快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叶剑英作为中共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之一,于12月16日从延安飞抵重庆,同时协助周恩来同国民党代表就停止国共军事冲突等问题进行谈判。经过谈判,确定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经毛泽东提名,党中央派遣叶剑英出任军调部中共代表,于1946年1月中旬从重庆乘飞机抵达北平,参加军调部工作。

叶剑英在军调部工作期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周恩

来的直接领导下，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挑起内战的阴谋，从全局上有力地配合了我们党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1947年2月2日，叶剑英带领参加军调部的我方最后一批人员飞回延安。他们的工作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赞扬。

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出延安，毛泽东决定同周恩来等继续留在陕北指挥作战，同时指定由叶剑英负责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简称后委），叶剑英任书记，进驻晋西北地区，统筹中央的后方工作。

3月底，叶剑英率领中央和军委机关3200余人，冒着凛冽的寒风，东渡黄河，到达晋西北临县三交镇的后委驻地，这里还驻有军委总参谋部、总政治部、中央各部和中央办公厅等单位，总共达5000人左右。中央决定这些单位由后方委员会负责统一领导。

后委担负着繁重的中央后方保障和参谋工作。叶剑英充分利用驻地固定和电台集中的有利条件，开展通讯和情报工作，及时掌握国内外特别是国民党军的动态，整理上报中央和毛泽东，通报各个战区；同时负责沟通中央与全国党政军各方面的通讯联络，成了中央和各地的“耳目”，为保证毛泽东直接指挥陕北作战和全国解放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后委被赞誉为中央的“最佳参谋部”，毛泽东对后委的工作非常满意。

九、叶剑英迎接毛泽东进北京， 安排毛泽东住进中南海。

1948年底，在北平即将解放的前夕，叶剑英被任命为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准备接管北平。毛泽东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亲自找叶剑英等人谈话，交代任务。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入城以后，叶剑英即忙于各个机构、各条战线的接管工作。

为了安排好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关进京后的驻地，叶剑英经过调查研究，并征得周恩来的同意，把中央领导人的居住点和中央机关的办公地点初步选在中南海，并组织力量进行整修。

3月24日，毛泽东等同志离开西柏坡，坐吉普车到达涿县。25日，叶剑英到涿县迎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他向毛泽东介绍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况。他说：“北平的所有名胜古迹，都受到了保护，没有遭到任何损失和破坏。北平的男女老少都称赞北平的和平解放。和平解放北平，这是一个大奇迹。在古今中外的战史上，国都、大城市或重要阵地，不是攻打不下被迫退兵，就是强行攻占，将敌人消灭。有条件的和平解放，在战史上几乎是没有的。”

“是啊，战史上见不到，咱们今天就见到了，这是傅作义将军的功劳，他带了一个好头。”毛泽东笑着说，“今后，南京

政府、各地的地方政府和国民党军队，还可能这样做。这样做，对国家对人民对他们自己都有好处。”

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说：“北平和平解放时，不少民主人士来信来电，表示他们坚决拥护共产党，要和共产党更好地合作，希望共产党在北平成立全国性的政府。”

叶剑英继续说，北平和平解放后，工厂照常生产，商店照常营业，学生照常上课。原北平的政权机构和官办机构，都派了军官和接管人员。社会秩序很好，也没有发生骚乱。过去那些社会流氓也没有敢出来捣乱。反动分子和潜伏下来的特务，现在还没有公开出来进行破坏。

毛泽东听了很满意。他要求对参加军事管制的人员讲清楚：我们不但解放大城市，我们还要管理好大城市。人民解放军和全体党政干部，要学会管理城市和学会做经济工作。

当天下午，叶剑英陪同毛泽东、朱德驱车去西苑机场检阅了参加平津战役的人民解放军部队。

这天晚上，毛泽东等在颐和园休息，随后又移往香山的双清别墅。

这期间，经过几个月的日夜辛劳，中南海里里外外已是焕然一新。

1949年6、7月间，叶剑英正式拟了一个报告，请毛泽东和党中央迁入中南海。他亲自去双清别墅，坚持请毛泽东搬家。

于是，毛泽东移住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直到他谢

世。

十、叶剑英奉毛泽东之命统帅南下大军解放华南，建设华南。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解放华南、建设华南的任务提到了中央的议事日程。

为了加强对广东、广西地区党政军工作的统一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毛泽东提议，任命叶剑英为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并要叶剑英和第四、十五两兵团负责人统帅一支部队向广东进军。

行前，毛泽东找叶剑英谈话，问他对解放两广有什么考虑。叶剑英提出华南解放晚，干部力量不够。于是毛泽东指示中央组织部尽力为华南分配一些干部，从北平、山东、华北军政大学及一些大学生中，挑选一批干部，陆续送到华南。

关于工作部署，毛泽东同叶剑英商量，确定第一步由叶剑英带领南下干部先到江西赣州同四兵团、十五兵团负责人及方方等人会合；第二步召开会议，着重解决好党、政、军领导机构的组成和各级干部的配备、解放广东的作战部署、接收和管理广东的各项政策，以及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干涉等各个方面的问题。

毛泽东最后嘱咐叶剑英说：“两广素有革命传统和基础。随军南下的同志对原华南分局及各级党委工作的成绩

要有恰当的估计。”并且指出：“突出的是团结问题，搞好团结才有力量，可以战胜一切。”

9月上旬，叶剑英到达江西省赣州。经过赣州会议，确定了具体作战计划。然后与陈赓等指挥的部队分路向广东敌军发起攻击。10月14日广州解放。

广州刚解放，国民党飞机时常来袭扰，地面暗藏特务亦活动猖獗，敌人曾两次把炸弹扔进市政府院内。国民党特务机关还从香港派遣特务潜入广州，企图暗杀叶剑英。一次，叶剑英在外出开会归来的途中，遭特务枪击，幸未中弹。市公安局立即将情况报告华南分局和党中央。毛泽东知道后，对叶剑英和华南分局其他领导同志的安全极为关心。他一面指示公安部门加紧采取反特措施，一面给叶剑英发电嘱咐：注意安全，不要在公开场合露面，如集合、讲演等。叶剑英对毛泽东的关怀由衷感谢，但在工作中却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他一方面在工作中加强了对敌人的防范，一方面照常出现在各种群众活动场合，开展各项活动，给人以很大的鼓舞。

社会治安好转之后，叶剑英便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城乡建设方面。1950年，他主持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主要研究在生产系统进行民主改革和工厂管理的方针，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政策，很有成效。

同年6月，党中央召开七届三中全会，其中一项重要议程是研究进一步调整工商业的问题。在会上，叶剑英结合广东的实际情况发言说：“广东在公私、劳资、城乡、内外的这

些工作上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也的确有些毛病和麻烦。应该采取调整的办法。”“依靠调整、限制，达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要以调整的方法来解决生产中间所发生的毛病，不要使这些毛病发展到激烈的对抗，要互助互利，达到各得其所，这是有利于恢复发展生产的，也是有利于人民的。”

叶剑英的发言，得到毛泽东和与会同志的赞赏。他回到广东，立即主持召开全省市镇工作会议，结合广东实际，贯彻落实中央全会精神，加快了工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速度。

广州局势稍稍稳定之后，毛泽东于1950年11月17日向叶剑英发出“迅速将广西土匪肃清”的指示，叶剑英接到指示后，即与陶铸等到广西南宁，与张云逸主持召开省委扩大会议，研究部署了广西剿匪工作。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广西全境股匪基本消灭，为建立和巩固城乡各级人民政权和应付外敌的可能入侵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剿匪反霸的同时，叶剑英主持华南分局召开专门会议，从实际出发，贯彻中央人民政府1950年6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广东地区进行了土地改革。从土改准备、试点到全面铺开，每一个计划，每个步骤，运动进展的情况，都上报给中共中央、中南局，并得到批准，因而，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是，平地起风波。1951年1月和4月，中南土改委员会的工作组两次到广州，个别负责人听信片面反映，对广东土改试点县的工作提出了不适当的批评。

毛泽东片面地听取了中南局和华南分局的少数领导人反映的情况，于1952年6月将叶剑英、方方、陶铸召到北京，批评华南分局领导工作中存在“和平土改”和“地方主义”的“错误”。

实际上叶剑英在领导土改中，政策掌握得很稳，是符合中央政策精神的，并不存在“和平土改”。在干部政策上也不存在所谓“地方主义”的错误。虽然，毛泽东在批评“地方主义”时，指出叶剑英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责任，但叶剑英为了照顾大局，在此后不久召开的华南分局扩大会议上，还是主动承担责任，并违心地作了自我批评。

1953年10月，叶剑英奉毛泽东之命返回北京，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翌年，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

十一、“文化大革命”开始，叶剑英从“不理解”到“紧跟”转而抗争。主持制定“八条命令”和“七项规定”。“二月逆流”的风波。毛泽东召叶剑英上庐山参加“批陈整风”，委以调查陈伯达政治历史面目的重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军委副主席兼任军委秘书长的叶剑英，正负责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重任在肩，异常繁忙，心情一直处于紧张和矛盾

之中。他出于对毛泽东的信赖和深厚感情，虽然对这场运动“不理解”，但还是拥护的，并积极参加领导运动。然而随着运动的深入，问题暴露的越来越多，他觉得运动的矛头所向不对，开始为国家和军队的命运前途担忧，对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错误逐步进行抵制和斗争。但他仍然努力贯彻毛泽东的意图，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依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来解决各种复杂的问题。

叶剑英始终坚定地认为：“天下不能乱，长城不能毁”，只要军队不乱，天下就保得住。因此，叶剑英要求军队必须保持高度戒备，听从统一指挥，并同徐向前、聂荣臻、陈毅等几位元帅多次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稳定军队的规定和措施。

但是，运动的发展日益猛烈，在林彪、江青一伙的煽动下，到这一年11月，进入北京的军队院校师生已达10万人，他们冲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国防部，直至冲击毛泽东的住地中南海。

叶剑英为了稳定首都局势，经报毛泽东批准，于11月13日，由总政治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即第一次10万人大会）。11月29日又在同一地点召开了军队院校师生代表大会（即第二次10万人大会）。叶剑英和几位军委副主席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强调稳定军队，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非正常现象和错误作法提出了严肃批评。

林彪、江青一伙为了迫害几位元帅，指使“造反派”纠缠叶剑英在两次“10万人大会”上的讲话，硬逼叶剑英检查。

此事上告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想使叶剑英开脱，说：“检讨一下，了此一案。”12月31日，叶剑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被迫到军队院校所谓师生代表会议上违心地进行了“检讨”。

但是，斗争仍在继续。1967年1月，军委在京西宾馆的碰头会上，江青、陈伯达、康生等蓄意挑起事端，围绕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叶剑英在盛怒之下，拍案而起造成了右掌骨骨折。“大闹京西”事件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于1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军委碰头会的同志。毛泽东特意招呼叶剑英等坐在他的身边。毛泽东说，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要防止帝国主义侵略，抓紧战备。军队要稳定，要团结，不要你搞我，我搞你，不要分裂。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叶剑英主持军委碰头会议，研究如何稳住军队。经过反复研究，并经毛泽东批准，于1月底和2月初，相继颁发了“八条命令”和“七项规定”，消除了一些地区的混乱现象，保证了部队的正常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挫败了江青等人乱军夺权的阴谋。

紧接着，于2月14日发生了“三老”“四帅”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尖锐斗争的所谓“大闹怀仁堂”事件。

毛泽东片面听取了江青等人歪曲事实的汇报，于2月18日深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激烈地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几位老师和老同志。从此，林彪、江青一伙多次开会围攻这些老同志，并给他们加上了“二月逆流”

的罪名。

但是，叶剑英逆流而上，继续坚持斗争。他坚决制止一些“造反派”到各大军区打砸抢和扰乱部队正常秩序的错误行为，竭尽全力维护部队的稳定。

直到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亲自找几位老帅谈话，并在1969年1月3日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由此，对所谓“二月逆流”的批判才开始降温。以后，毛泽东多次讲“二月逆流”平反问题，中共中央专门作出决定，为“二月逆流”平反翻案。

1970年8月，叶剑英上庐山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会上，与林彪、陈伯达一伙妄图抢班夺权的阴谋进行了斗争。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庐山住地同周恩来、叶剑英连日研究“批陈”问题，确定逐步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并把调查陈伯达历史的任务当面交给了周、叶。于是，叶剑英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亲自带领工作组前往福建陈伯达家乡以及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地调查，查清了陈伯达的历史，比较系统地揭露了这个“红色理论家”的反革命真面目。

十二、林彪叛逃后，叶剑英受命整顿军队。叶剑英向毛泽东积极建议恢复邓小平工作。参与主持八大司令员对调。与毛泽东的最后诀别。叶剑英挺身而出除“四害”。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以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由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10月4日，叶剑英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军委各直属单位、各军兵种和各院校传达中共中央57号文件的反映和军委下一步的工作打算。他在信中一再表示，希望能经常得到指示，以便在工作中少出差错。毛泽东读了叶剑英的信后，当天即召集叶剑英和军委办公会议的同志们谈话，就军委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整顿军队的指示，叶剑英集中力量抓好军队系统从上到下关于林彪事件的传达；揭批、清理与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纯洁各级组织，统一全军指战员的思想；着手准备解决全军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

叶剑英多次向毛泽东、周恩来建议恢复邓小平的工作。邓小平从江西回来，叶剑英又向毛泽东建议，让他参加主持军委工作。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研究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并参加军委工作。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问题。在这次会议

上,毛泽东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然后指着叶剑英说:“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讲话。”最后,他让叶剑英把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都找来,参加会议,叶剑英负责具体主持这项工作。12月22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令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在召集这些军区司令员参加的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叶剑英也在会上讲了话。会后,各大军区司令员在规定的时间内到位任职。毛泽东对叶剑英参与领导完成这项重大工作,十分满意。

1974年元旦刚过,正当叶剑英受毛泽东、周恩来之命,紧张投入指挥西沙自卫反击战的时候,江青一伙突然发难,掀起“批林批孔”、“批儒”的恶浪,把矛头对准周恩来、叶剑英。西沙之战刚刚胜利,江青一伙又于1月24日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军队系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为了稳住军队,叶剑英没有具体部署军队进一步开展“批林批孔”。江青一伙气极败坏,扬言“要整整军队”,并借走后门问题点名批评叶剑英。1月30日,叶剑英直接写信给毛泽东,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并就军队干部子弟当兵等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在叶剑英的信上批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毛泽东制止了江青一伙准备在全国播放“批林批孔”大会录音的企图。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意见发

出通知，提出领导干部送子女参军问题，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叶剑英给毛泽东的信，对江青一伙是个打击，有效地制止了“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攻击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而大整老干部的阴谋。

1976年元旦刚过，周恩来总理不幸逝世。只隔几个月，朱德委员长又与世长辞。老战友走后，天灾人祸不断降临，毛泽东病情日益加重。在毛泽东弥留之际，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均守候在他的病房，排着队走到病榻前，一个一个同他诀别。当叶剑英走进病房时，毛泽东双目微睁，看到了站在他面前的叶剑英，眼睛突然亮了起来，并且活动手臂，轻轻相招。可是，叶剑英只顾伤心，泪眼模糊，并未察觉。待他走出病房时，毛泽东忽又意识清醒，以手示意，招呼他回来。一位护士见此情景，马上跑到休息室找到叶剑英说：“首长，主席招呼您呢！”叶剑英立刻转身回到病榻前，只见毛泽东睁开双眼，嘴唇微微翕动，想说什么，但是说不出来。叶剑英握着他的手，又急又悲，凝神注视，伫立良久，最后只好移动着沉重的脚步离开病房。他陷入了沉思：主席为什么特意招呼我呢？还有什么嘱托？他的心情很沉重，意识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这是叶剑英与毛泽东的最后诀别。

在毛泽东逝世后，叶剑英在与“四人帮”进行激烈斗争的日子里，他想到毛泽东晚年对付“四人帮”的“两着棋”：一是对他们多次进行严厉批评，表示要加以“解决”；二是没有让他们窃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职位。他又想到毛泽东多次向老同志讲过汉朝周勃、陈平铲除吕氏叛乱、巩固汉室的

故事；同时联想到，毛泽东弥留之际，想托以后事欲语不能的情景，他决心挺身而出，解决“四人帮”问题，为民除害。

10月6日，叶剑英在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的基础上，与华国锋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一起，根据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果断地作出重大决策，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在这场斗争中，叶剑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位老革命家以非凡的胆略，忠诚的信念，为党为人民又一次作出了重大贡献。

十三、两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战友和诗友。叶剑英酷爱毛泽东的诗，以自己的诗词讴歌尊敬的“导师”。毛泽东喜爱并推崇叶剑英的诗，对叶诗作出高度评价。

中国《易经》上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叶剑英和毛泽东这两位政治家兼诗人在一生交往中对诗词有一种特殊的爱好。他们在戎马倥偬、政务繁忙之中，写下了大量优美的诗篇，流芳于后世。他们都具有革命诗人的气质，彼此间息息相通。

叶剑英酷爱毛泽东的诗词，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多年与这位伟大领袖相处，十分敬仰他的诗品和人品；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位诗人，“心有灵犀一点通”。

早在延安时代，叶剑英就习惯于吟诵传抄毛泽东的诗词，而且奉之为上品。建国以后，1957年1月，《诗刊》第一次公开发表了毛泽东的18首诗词，叶剑英读后兴奋极了。虽然许多诗篇是他早已熟悉的，但他仍然反复吟诵，爱不释手。以后每次发表毛泽东的诗词，都同样吸引着他。他不但自己吟诵，还给身边的子女、工作人员、服务人员讲解，帮助他们学习。

叶剑英不仅酷爱毛泽东的诗词，而且以自己的诗词来讴歌毛泽东。1958年，他随毛泽东、周恩来等到十三陵水库劳动，写出了“万众欢呼毛主席，普通劳者出堤旁”的诗句；1963年3月26日，他来到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参观，有感而赋七绝一首：“六亿同胞呼万岁，五洲志士称导师。欲溯河源到星宿，韶山风物耐人思。”1965年9月，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之际，叶剑英重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以此为题写了一首七律，歌颂毛泽东的丰功伟绩。

诗者心声，乃感情的真实流露。叶剑英在自己的诗歌中，不仅有对毛泽东的歌颂赞美，偶尔也有规劝警策之句。这集中表现在1954年夏在青岛养病的一首五律中，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是：“忽忆刘亭长，苍凉唱大风。”

汉高祖刘邦曾经当过亭长（乡村小吏），当了皇帝以后杀戮有功之臣。后途经故乡沛县，邀集父老亲朋饮宴，酒酣，唱大风歌，慷慨伤怀。

据叶剑英自己解释，这首诗的后两句，是对毛主席提出善意的批评。他在诗里采取隐喻的手法，引用刘邦唱大风歌

这个典故，意在劝谏毛泽东继续保持革命战争年代联系群众、团结同志的好作风，以加强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巩固无产阶级的新生政权。这两句诗也多少反映了他当时因受到所谓“和平土改”和“地方主义”错误的公正的批评而调离广东的心境。叶剑英心地善良，怀抱沧海。他对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时刻铭记在心上，而对自己做过的好事却从来不讲。他曾讲过这样的话：“别人为你做一件好事，你要记一辈子，千万不要忘记；你为别人做一件好事，一件也别记住，千万不要挂在心上。”直到晚年，他在谈到毛泽东“文革”中的错误时，仍然念念不忘他的功德。他对毛泽东的感情和敬仰始终不渝。他曾多次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今天可能还在黑暗里徘徊，还在上海的租界里开会。他回顾党和军队的历史，深感“导师创业垂千古，侪辈跟随愧望尘”。他说，我很惭愧，没有做多少事，是个“打杂”的。不跟毛主席，我很平庸。现在有人批评毛主席，不能说他一无是处，不能因为他晚年犯了错误就否定他。毛主席是很伟大的，不论过去和现在，我们都仰仗毛主席。叶剑英说得很动情，每每谈起就流泪呜咽，激动不已。这就是叶剑英对毛泽东的基本态度。也许正因为这样，他总是从维护大局出发，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为此，在党的斗争中他总是站在毛泽东一边，曾违心地批评过别人，也曾违心地作过多次自我检讨。他的赤心是一直向着毛泽东的，他的行动始终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

叶剑英的古典文学造诣很深，旧诗词功底很厚。毛泽东

生前很欣赏他的诗词和诗才。1965年，毛泽东给陈毅写信谈诗，说“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诗，要向他们请教。”这是毛泽东对叶剑英诗歌成就的高度评价。

1965年秋，叶剑英在大连开会有感，写下七律《望远》，后来发表在10月6日的《光明日报》上。毛泽东72岁寿辰之际，毛岸青和邵华去祝寿，毛泽东当即挥毫，一字不差地背抄此诗，赠送儿子和儿媳。毛泽东不但背写出此诗发表的日期，而且有意地将原诗题目改为《远望》，并加“在大连，棒棰岛”几个字，可见其对这首诗的写作背景和内容之熟悉。后来，毛岸青和邵华特将父亲录写的《远望》原件送给叶剑英，并附信云：“叶伯伯，记得1966年元旦前，我们去看望父亲，父亲挥笔写了《远望》诗一首，以教育、鼓励我们。”叶剑英将毛泽东录写的《远望》加以裱糊，珍藏起来。

毛泽东喜欢古典诗词，推崇古代诗词大家，但很少评论当代诗人。叶剑英是他作过评论并欣赏的诗人之一。直到他垂暮之年，在与为其侍讲古典文学的北大教师芦获的一次谈话中还说，叶剑英的诗酣醇劲爽，形象亲切，律对精严。可见，毛泽东对叶剑英的诗一直是很推崇的。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叶剑英和毛泽东彼此间相知甚深，相依甚重。他们的深厚友谊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基础之上的，而且经过了血与火的长期考验。他们的个人情感始终溶化于党的事业之中，他们的交往始终有利于维护党的团结，他们为了革命事业共同奋斗的精神堪称楷模。

毛泽东与张治中的一次重要谈话*

余 湛 邦

1949年4月1日,张治中以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名义,率领代表团由南京飞抵北平。次日,国共双方代表即采取三三两两的形式就国内和平问题开始商谈。当时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住在香山双清别墅,先后接见了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刘斐、卢郁文等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成员。8日,毛泽东首先接见张治中,和他进行了重要的谈话。

毛一见张,就马上起立紧握张的双手,满脸笑容地说:“谢谢你在重庆谈判时的殷勤接待,照顾得无微不至;不过我很抱歉咧,当时你用好酒席招待我,而你后来三到延安,我没办法,只好用小米饭招待你,很抱歉咧!”毛的态度,有如老朋友久别重逢,使张感到十分亲切友好。

“不敢当。当时从谈判到事务,一切都是和恩来先生商量好的。是他想得周到,我不过略尽地主之谊而已。”张谦逊地说。

* 这篇文章生动记述了1949年4月8日毛泽东与张治中的一次重要谈话。作者余湛邦曾任张治中的机要秘书,该文是他根据张治中生前对这次谈话的记录整理的。

“到这里后生活怎样？住旅馆方便吧？有什么需要和意见，请随时告诉接待同志。”毛诚恳地说。

“没有什么，很好，很好。”张说。

“这几天大家谈的怎样？”毛不多寒暄，直接进入本题。

“我已经和恩来先生谈了不少，涉及各个方面。同来的代表也和中共代表个别谈了很多。当然，分歧还是有的，需要慢慢来谈，好好协商。”张答。

“是的，国共两党从第一、二次合作到现在，经过了无数次的商谈。有些问题当时得到解决或局部解决，有些得不到解决就暂时搁下，有些当时解决了，但事后又有反复，是需要耐心地慢慢协商的。不过，主要的是双方要有诚意。现在中共方面已经表示了诚意，因此事情就有了百分之五十的把握，只要你们也有诚意，事情就比较好办了。”毛说。

“李代总统早就表示过以您在元月14日提的八条为谈判基础，我们当然要以此为依据来谈，但是事情总是复杂的。”张治中到北平前，两次到奉化溪口，就毛所提八条请蒋介石表示意见，进行了摸底。在南京时又由何应钦主持研究出《和谈腹案》九条，胸中早有成竹，现在是想知道毛泽东的底数。

“当前核心问题是和谈，和为贵。但我们不是为和平而和平，我们有其远大的目标，就是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我们所提的八条也是环绕着这个远大目

标而设想的。”毛对和谈作了一个概括。

“要和，也不能回避历史问题。国共两党的斗争已二十多年，谁是谁非，一时难以算清。为了实现和平，我们得现实些。战争罪犯问题和战争责任问题，看来是和平的两大障碍，我已和恩来先生、中共其他代表谈过，是不是可以暂时搁下，静待历史公断？”张直接提出他最关心的两个问题。

“重庆谈判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协决议、停战协定、整军方案等都是你亲身参与缔结的。谁撕毁这些协议，谁首先发动战争，你比别人都清楚。这不是我们要提出的问题，而是客观历史自行鉴定的问题，完全否定它们，全国人民是不会同意的。”毛坦率坚定地表示。

“国内的情形您是清楚的，国民党内部的情形您也不比我们知道得少。战犯名单、首恶元凶这些具体字样，希望所有的人都加以接受是很难很难的。这样的现实障碍不去，是根本无法获致协议的。”张委婉地加以解释，事实上是想为蒋介石争回些面子。

“原则上可以灵活些，我们是对具体的人作具体的分析和处理的。不问是谁，只要他能认请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的，都可以给予宽大的待遇。至于文字措词，等到双方谈判得到协议，是可以量情斟酌的。”毛的话含有暗示性和伸缩性。

“希望形式上不提名单，对人则作具体处理，那么协议就比较容易达成。”张似乎不大放心，再补提这两句。然后又

说：“恩来先生对我提到，由于国民党违背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也就是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遗教，所以兵连祸结。对此，我们满怀惭愧。国民党的失败，确实是症结在此。多年来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渴望和平能够实现，现在是双方隔江对峙，人民希望流血惨剧到此为止，希望国共双方约束自己的部队，化干戈为玉帛。”张的含义是希望宣布停战，划江而治，此话险些脱口而出。

“革命是必须进行到底的，不然人民不会同意。国民党二十多年的反动统治，人心失尽，必须引咎自责，以谢国人。至于何时渡江，如何渡江，双方代表团是可以协商研究的。”毛已明白了张的用意，委婉地关上大门。

“从目前情况看，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国共两党斗争亦将结束了。孙中山先生去世二十四年了，我们没有把中国变成自由、平等、独立的国家，我们的同胞，在国外受人家的轻视鄙视，我们实在感到惭愧和耻辱！作为一个革命党人，我们有诚意承认错误，有勇气承认失败，今后是你们的政权了，你们怎样做呢？”张坦诚地说出心里的话。

“不，不是的，是我们大家来做的，是靠大家合作来做的。我们知道，国民党内部也不是清一色的，其中有不少开明进步分子是不赞成独裁的。我们希望他们能和我们合作，一切真正主张和平的人，我们都欢迎和他们合作，而且希望他们多出主意，多提意见。”毛也坦诚地说。

“今后怎么办？我倒有一个意见，不知您可愿意听？”张说。

“那很好，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毛说。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民党政权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亲美的反动集团。他们的一面倒亲美、死硬反苏的错误政策是一个致命的孤注，给国家民族带来严重的灾难，不但危及国家民族的命运，而且影响到远东的和平，因此我坚决反对一面倒亲美，主张美苏并重，就是亲美也亲苏，不反苏也不反美，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我是一生坚持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但在亲苏联共的总方针下，不妨在外交策略上美苏并重，保持同等距离。我曾经向蒋委员长反复建议过，可惜他犹豫不决，不能实行。不知您以为如何？”张试探地提出自己的主张。

“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分成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互相对立，剧烈斗争。以苏联为首的是社会主义集团，以美国为首的是资本主义集团，前者是革命的、民主的、要解放全人类的，后者是垄断的、侵略的、压迫剥削穷人的，我们只能倒向以苏联为首的集团，而不能倒向以美国为首的集团。”毛扼要地说明中共的主张。

“我的设想是从全世界局面出发的。现在中国在远东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美苏争取的对象。如果我们争取善意的中立，那么对苏有利，对美也有利，对中国更有利。中国善意中立之后，如政治上运用得宜，还可以通过国共合作以促进美苏协调，通过美苏协调以加深国共合作。这一长远的战略政略如运用成功，还可以保证远东的和平进而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张振振有辞地说了这番话。

紧接张的话头，毛告诉他：“必须从根本上看到，两大集团的冲突，是根本的冲突，两大集团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一边是社会主义，另一边是帝国主义，当今之世，非杨即墨，不是倒向苏联一边，便是倒向美国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我准备写一篇专文，与你以及和你具有类似观点的人进行辩论。”然后又幽默地说：“我们准备为此辩论一百年！”

“如您刚才所说，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之后，就要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就是说要进行全国性的建设。以中国之大，人口之众，建设不可能只靠自己，还得向外寻求援助。我认为，光靠苏联援助不够，还得向英美等国去争取援助才行。”张换一个角度继续发表意见。

“在目前，这是一种幼稚的想法。英美的统治者现在还是帝国主义，他们会给我们援助吗？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帝国主义只会侵略、压迫、剥削我们中国，谁曾见过哪个帝国主义者援助过我们？孙中山先生一生中向资本主义国家吁请过多次援助，结果落空，反而遭受打击，所以他临终总结经验，谆谆嘱咐大家要把目光转向‘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而不要再上帝国主义者的当。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一边的，真正的援助只能向苏联一边去争取，而绝不能把目光投向帝国主义的一边。”毛温和而坚定地解释道。

“但是，我们还是要做生意。现在世界交通日益发达，各国人民贸易往来，有无相通，是正常的事。我们要和所有国家做生意，尤其和发达的英美苏等国做生意，而不能像清廷政府那样闭关自守，一律排斥外来的东西。”张从问题的另一角度提意见。

“是的，我们要做生意，完全正确，生意总是要做的，大家须知，妨碍我们和外国做生意以至建立邦交的，不是别人，正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洋行买办等人。我们要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击破国内外的一切反动派，我们就有生意可做了，我们就可以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和各国建立邦交了。”毛进一步说。

“我们既然主张和平，既然要和各国建立邦交和做生意，那么我们就得注意态度，不一定对别人，例如对美国采取敌对或刺激的态度。”张又从另一角度提问题。

“首先，我们要区分反动派与革命派的界限。对于国内外的反动派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你刺激它是这样，不刺激它也是这样。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反正它要吃人。我们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毛设想到张治中对敌我友界限一时还不容易区分清楚，所以严正地说明。

谈话至此，张治中告辞，毛泽东与他握手道别。

在以后不久的时间里，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对“一边倒”、“要做生意”、“要国际援助”等问题，作了深刻的、系统的阐述，进一步回答了以张治中为

代表的一部分人的疑问和主张。

当国民党反动派顽固拒绝中共提出的条件,使北平和谈彻底破裂后,张治中接受毛泽东、周恩来劝告,留居北平。毛对张说:“我们将举行新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请你参加。”张说:“过去一个阶段的政权是我们负责的,今已失败成为过去了,我这个人也应成为过去了。”毛笑笑对他说:“过去的阶段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大年初一做起!”

从新做起,在毛泽东的关心、帮助下,张治中在新中国担负了许多重要职务,为人民做了不少的好事。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 前期对毛泽东纠“左”的历史考察

刘 武 生

1958年,中国大地上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随之出现的是,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比较早地发现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混乱现象。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党中央和毛泽东采取一系列措施,力求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本文拟对毛泽东这8个多月纠“左”的历史作一番考察和评论,以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防止重犯“左”的错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一

首先,围绕毛泽东主持召开几次重要会议考察他这次纠“左”的历史进程,从而说明他曾经认真地纠正左倾错误。

(一)第一次郑州会议是这次纠“左”的开端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后,毛泽东相继视

察了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农村，发觉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一大堆混乱思想”，有许多人急于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急于实行全民所有制，主张消灭商品经济，等等。针对这种情况，他于11月2日至10日在郑州主持召开中央和地方部分领导同志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着手研究解决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种种问题。会议期间，他多次讲话，带头提出了一些纠“左”的意见。

——强调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我国社会是社会主义，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针对当时普遍存在混淆两个社会发展阶段、混淆两种所有制的思想情况，毛泽东为会议安排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要不要划一条线，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他在讲话中指出：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①。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②。他肯定人民公社的性质，目前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③。毛泽东反复强调划清两个社会阶段和两种所有制的原则界限，对于澄清混乱思想，遏制严重泛滥的“共产风”，是有积极作用的。

——指出取消商品经济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大发展。毛泽东在会上多次批评陈伯

^① 毛泽东1958年11月4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本文的引文，凡没有加引号的，均引自讲话记录稿；凡加引号的，均引自批语、书信、文件和经本人审定的讲话记录稿。

^{②③} 毛泽东1958年11月10日上午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达等人主张取消商品经济的错误观点。他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有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他主张，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①。毛泽东关于商品经济的这些论述，是在30多年前说的，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重温这些论述，我们仍然感到很有启迪作用。

——提倡实事求是，不许说谎虚报；坚持走群众路线，不许强迫命令。毛泽东提出，要把改进干部作风、注意解决工作方法当成重点。他强调：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说谎。人民是骗不了的^②。他修改会议决议草案时，专门增加一节“工作方法”：“在人民公社中，由于群众生活的集体化程度更多了，干部作风的好坏对群众生活影响更大了，必须特别注意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允许用简单化的行政命令手段去处理有关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对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要采取老实态度，反对虚报成绩，隐瞒缺点。”^③

——建议读两本书，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澄清混乱思

^{①②}毛泽东1958年11月10日下午、11月9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③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的《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

想,统一思想认识。会议期间,毛泽东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信,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他在信中写道:“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①。他还在会上多次讲述自己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感想和意见。毛泽东在这次纠“左”的过程中,反复倡导读马列的书,力求用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党员干部的头脑,以统一思想和行动。这是一种高屋建瓴的领导艺术。

尽管第一次郑州会议只是为这次纠“左”开了个头,但它却标志着毛泽东带头提出并要求纠正他已经觉察到的左倾错误。

(二)武昌会议为继续纠“左”作思想准备

第一次郑州会议后,毛泽东在致邓小平的信中,要求把会议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提交武昌会议征求意见。并说,“郑州会议就是一个为武昌会议准备文件的会议,因此不要发公报。”^②在致刘少奇、邓小平的信中提出,“为了对武汉会议先作精神准备”,建议中央和各

① 毛泽东 1958 年 11 月 9 日写的《关于读书的建议》。

② 毛泽东 1958 年 11 月 12 日给邓小平的信。

省部分同志分别讨论两个问题，“只是当问题提出，征求意见的性质”。“例如对划一条线弄清界线问题，提出划线好，还是不划线好？对于商品问题，提出现阶段要商品好，还是不要商品好？其他问题，以此类推。”^①

为继续纠“左”，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他在会上多次讲话，关于纠“左”的意见，有以下几个要点。

——批评抢先过渡的共产主义的空想，再次肯定我国现阶段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说：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苏联有41年了，我们只有9年，现在一吹吹得那么厉害，我看过渡共产主义，一定要苏联先过。这是不是机会主义呢？是机会主义就改^②。

——强调要压缩空气，把根据不足的工农业生产高指标压下来。毛泽东反复强调：我们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③。他指出：以钢为纲，带动一切，究竟什么指标为好？今年搞到1100万吨，明年翻一番，是2200万吨，有没有把握？他说：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帐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

① 毛泽东1958年11月13日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

②③毛泽东1958年11月21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在这里反冒进，从前别人反我们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①。现在看来，武昌会议压缩的工农业生产主要指标仍然过高。但是，毛泽东在会上讲的这些话，确实反映了他当时要求压缩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心情。

——指出人民公社有两种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毛泽东尖锐指出：杜勒斯、蒋介石他们都说，我们不搞人民公社还不会亡，一搞这个东西，就一定会亡。你不要一定说他没有道理，你搞得不好，它一定不亡？！总有两种可能性，要么亡，要么不亡。他袒露自己的矛盾心态说：这一向在我的脑筋里头，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就是刚才讲的那些问题，究竟这样好还是那样好^②？

——批评弄虚作假的浮夸风，要求经济事业越搞越合乎实际。毛泽东在会上专题讲了反对作假的问题。他强调指出：我看我们的经济事业是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合乎实际。他风趣地说：这个东西跟作诗是两件事。什么“端起巢湖当水瓢，哪里有旱哪里浇”。我就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的。那个巢湖怎么端得起？！他要求人们讲老实话，说现在有一种空气，只讲成绩多，脸上有光，得到奖励。一讲实话，比如讲尾巴生在牛屁股后面，这是个老实话，动物的尾巴总是生在后面的，没有人听^③。

——指出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现在还有

① 毛泽东 1958 年 11 月 23 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② 毛泽东 1958 年 11 月 21 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③ 毛泽东 1958 年 11 月 23 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用,不能破除,我们要保护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就提到过,在这次会上又专题讲了这个问题。他说: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三风五气、老爷架子、工资过大过高的悬殊、猫鼠关系,这些东西要破除,彻底破除,反得越干净越有利。另一部分,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还带有一点强制性,则不能马上破除。社会主义时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现在有用,因为它有用,我们要保护它,使它为我们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现在资产阶级法权有用的这一部分,你给它破得体无完肤,总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就是了。陷于被动,我们要扶起来,承认错误^①。毛泽东的这些说法表明,当时,他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是有分析的,而不是一概否定。但是,他对马克思提出的“资产阶级权利”是有误解的,因而他的上述说法并不准确,而且到后来还有发展。这是导致他在经济上推行左倾政策,并成为他在政治上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理论根源。

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武昌会议,对于进一步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和降低高指标,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为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继续纠“左”,作了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

(三)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前一阶段纠“左”的认识成果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① 毛泽东1958年11月23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在武昌举行。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一方面，对人民公社给予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从理论上和政策上阐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决议》再次批评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空想，重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原则区别，强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重要性。《决议》对企图否定商品经济和按劳分配的错误观点提出了批评，强调继续发展商品经济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两个重大原则问题。《决议》还批评浮夸风，要求发扬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把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尽管全会强调“压缩空气”，降低生产指标，但会议通过的《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规定的粮、棉、钢、煤等生产指标仍然偏高。

全会期间，毛泽东于12月1日撰写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在写到事物的两种可能性时指出：“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做分析，只爱热。”

毛泽东在全会上讲了12个问题，对继续纠“左”提出了以下意见。

——对“苦战三年，基本上改变全国面貌”的口号有怀疑。毛泽东指出：“本来是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农村面貌，但是后头不知道哪一天就推广到全国去了。我的意见就是说，

我对于这个口号有怀疑。苦战三年，基本上改变农村面貌，我曾经是有怀疑的。在4月武昌10个省委书记开会的时候，我提出这个问题，我说，可不可以改为苦战三年，初步改变农村面貌。我说，我们把这个基本改变全国面貌的口号的时间提长一点，无非是当机会主义。我说，这样的机会主义我很愿意当，当了有味道^①。

——指出围绕人民公社问题，有一大堆思想搞不清楚，这个决议的主要锋芒是向着急这方面的。毛泽东在讲到党内外争论问题时说：最近围绕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有各种议论。我看，大概可能有几十万干部对于这个问题有一大堆思想搞不清楚。一人一说，十人十说。大体上有几说：一说就是性急了一点，纷纷宣布自己是全民所有制，纷纷宣布两年或三年或四年进入共产主义。缺点是急了一点，我们这一回这个决议，主要的锋芒是向着急这一方面的^②。

——要求计划留有余地，让群众的实践超过计划。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学说，在我们国家1958年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他说：现在要搞一个空气压缩机，把空气压缩一下。我们脑筋里的空气还是那么多，但是压缩一下。要留有余地，提出的计划低一点，让群众的实践超过我们的计划。我看，这也是个辩证法的问题^③。

——强调存在巩固和垮台两种可能性，都要估计到。毛泽东指出：巩固和垮台，这两个可能性都存在。他说：我倒是

①②③毛泽东1958年12月9日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

要借这个机会讲一下这些倒霉的事情，无非是托儿所垮台，人民公社垮台，共产党垮台、崩溃、灭亡、分裂，或者我们这个国家被美国人灭掉，剩下一点游击队。他强调：不过，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规律管着，就是说，我们这些倒霉，尽管怎么样，总是暂时的，就整个说，是局部的。帝国主义、世界上的资产阶级，一定要灭亡，是永久的，以后就没有了。而社会主义事业，有损失，有失败，因为我们搞得不好，那种挫折，那种分裂，那种失败，甚至灭亡，都是暂时的，不久就要恢复^①。毛泽东的这番话是就人民公社问题说起的，一方面，他希望人民公社巩固，力求它巩固；另一方面，他又担心人民公社中的某些东西会垮掉，或者说要作垮掉的思想准备。他进而引发出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发展两种可能性的论述，反映了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深邃认识和郑重态度。毛泽东的这番话是在 30 多年前说的，对于我们今天正确看待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发生的剧变，正确看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挫折，仍然具有震聋发聩的指导作用。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及其通过的《决议》，主要锋芒是纠正左倾错误，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前一阶段纠“左”的认识成果。

（四）第二次郑州会议触及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一些实质性错误

八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于 1959 年 1 月底至 2 月初主

^① 毛泽东 1958 年 12 月 9 日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

持召开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讲话中，围绕经济建设，反思了一些问题。

一是承认抓经济建设工作，是新手，不会搞。毛泽东说：现在我们搞建设，要攻这个敌人，我们是新手，我们不会搞。多数同志，譬如我、省委第一书记，大家都承认^①。

二是指出对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不甚了解，要研究。讲到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时毛泽东说：这个问题，我现在是不甚了解，要研究。我们中国的国民经济，究竟怎样搞才叫合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法则^②？

三是认为向自然界开战，这个战略战术我们就是不懂。毛泽东说：我们对于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子，虽然我们现在的年纪不小了。应该承认这一点，向地球作战，向自然界开战，这个战略战术我们就是不懂，就是没有注意^③。

四是强调我们是从实践中找经验。在谈到总结经验教训时，毛泽东说：从总的看，不论我们定的这些指标、这些主观愿望、这些计划合不合适，对于我们都是从实践中找经验。这一场战争，我们经验不足^④。

毛泽东上面说的这些话，反映了他是从客观经济规律上思考“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

1959年2月下旬，毛泽东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研究，发现人民公社化后农民同国家的关系紧张，不少生产队瞒产私分。他觉察到，这是人民公社内部所有制还有问

^{①②③④}毛泽东 1959年2月2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上的讲话。

题，需要解决。于是，2月27日至3月5日，他在郑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在讲话中，他强调要调整公社内部的所有制，进一步解决“共产风”问题。

——指出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目前必须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毛泽东说：“现在，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部，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①他强调，目前人民公社以生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所有制为基础，有“极大重要性”。

——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错误倾向。在分析“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后，毛泽东指出：“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②为纠正这两种错误倾向，他提出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③

——揭示“共产风”的实质就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毛泽东指出：公社化后刮起了“共产风”，“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

①②③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情况。”“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① 在会议期间，他在一个批语中进一步指出，这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想”^②。

第二次郑州会议对人民公社问题的认识，在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的基础上又有所提高。特别是毛泽东提出的一些重要意见，触及了人民公社化的一些实质性错误。

(五)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继续调整人民公社内部所有制结构，进一步降低工农业生产指标

第二次郑州会议后，全国各地召开各级干部大会，传达会议精神，整顿人民公社。毛泽东用转发文件加批语和党内通信的形式，对各地提出的重大问题及时予以指导。当发现有些地区对基本核算单位有不同意见时，他在党内通信中指出：“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而在目前这个时期脱离群众，是很危险的”^③。当各地干部大会讨论生产小队（相当于原初级社）部分所有制问题时，他又写了一封党内通信给以指导，认为这个问题“值得讨论”^④。

为解决人民公社整顿中提出的问題，进一步降低工农业主要生产指标，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紧接着，4月2日至5

① 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② 毛泽东1959年2月28日对中共山西省委《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的批语。

③ 毛泽东1959年3月15日写的党内通信。

④ 毛泽东1959年3月17日写的党内通信。

日,他又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会上,他作了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并在会议期间写了一些批语和党内通信,对继续纠“左”提出了一些意见。

——把旧帐^①一般不算改为旧帐一般要算,认为算帐才能实行价值法则。毛泽东在一个批注中指出:“旧帐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会议讲话里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帐一般要算。算帐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②这次全会明文规定了清理旧帐的10条“具体处理办法”。

——明确规定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小队应该有部分的所有制和管理权限。“各地人民公社在实行三级管理、三级核算的时候,一般是以相当于原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单位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就是包产单位,这种生产小队应该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以下的管理权限。”会议通过的文件,明文规定了6条管理权限^③。

——调整、降低工农业生产指标,肯定陈云的意见是对的。在全会审议《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时,毛泽东要求调整生产指标,并多次肯定陈云的意见是对的。他说:去年武昌会议的公报,陈云同志提议,四大指标是不是

① 指在人民公社化和大炼钢铁运动中平调生产队和农民的财物和劳力等。

② 毛泽东1959年3月30日对陶鲁笏《关于山西省各县五级干部大会的情况报告》的批注。

③ 中共八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

不写^①，被顶回去，没有反映。武昌会议是陈云正确，陈云一个人正确，但未及时反映到我耳朵里^②。八届七中全会后，毛泽东委托陈云就进一步落实钢产量的指标继续研究。

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解决人民公社整顿过程中的一些方针、政策问题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进一步作了调整、降低；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从工作方法的角度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但是，由于没有触及产生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因而纠“左”的任务仍很艰巨。

(六)庐山会议前期，总结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左倾错误

八届七中全会后，为进一步纠正浮夸风，毛泽东写了一封党内通信，就包产一定要落实、密植不可太密、要节约粮食、播种面积要多、要机械化、要讲真话等6个问题，向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提出意见和要求。关于讲真话，信中写道：“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③这封信对当时抵制左倾错误的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给予了很大支持，对解决当时农业生产中

① 指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陈云建议在全会公报中不要公布钢、煤、粮、棉的生产指标。

② 毛泽东1959年4月5日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

③ 毛泽东1959年4月29日写的党内通信。

的一些问题起了积极作用。

为进一步纠正“共产风”，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从1959年5月7日至6月11日，连续发出3个指示，决定恢复自留地，允许社员喂养家禽家畜，宣布房前屋后的零星树木归社员所有等。

为给庐山会议作准备，毛泽东于6月5日召集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开会讨论工农业生产和市场问题，6月29日和7月2日召开各协作区主任座谈会。在这两个会上，他对经济工作讲了一些意见。

一是认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毛泽东说：一些指标定得那么高，使我们每天处于被动地位。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都是我们同意了，都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认识不够。讲了多少年有计划按比例，就是不注意，就是不讲综合平衡^①。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综合平衡。说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②。

二是提出重、轻、农的关系要反一下。毛泽东提出：过去安排是重、轻、农，重、轻、农的关系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要把农、轻、重的关系研究一下。他说：现在讲挂帅，第一应该是农业，第二是工业^③。

三是再次提倡读书，系统地想问题，懂得经济发展的规

① 毛泽东在1959年6月15日在部分中央领导同志会议上的讲话。

②③毛泽东1959年6月29日、7月2日在协作区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

律。毛泽东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不大了解，不懂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他提出：设想给县、社党委每年有一个系统思考问题的时间。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不要整年整月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而要使他们有时间想问题^①。

1959年7月8日至8月1日，毛泽东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至16日，在庐山举行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统称庐山会议。庐山会议前期，指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印发彭德怀给他的信之前。前期庐山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总结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解决经济工作中的问题，继续纠“左”。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提出18个问题，加上周恩来建议增加的国际问题，共19个问题，供与会同志研讨。7月2日，他在组长会上宣布这次会议先安排到7月15日，延长不延长到那时再定。对会议讨论的问题如何形成文件，他分别作了安排。接着，他在会上讲了对这些问题的意见。

会议期间，由于毛泽东仍然没有从产生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上提出问题，许多同志在讨论时仍然不愿或不敢敞开思想，发表意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纠正左倾错误。彭德怀在信中指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

^① 毛泽东1959年6月29日、7月2日在协作区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

易犯‘左’的错误。”“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视了主观主义的‘左’的方面。”^① 这封信反映了当时实际存在的左倾错误，表达了广大党员和群众要求继续纠“左”的意愿，也体现了彭德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信的基本内容是正确的，写信的作法也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但是，毛泽东却于7月16日把这封信冠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个标题，批示印发全体与会同志，并向中央常委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从此，会议转入讨论这封信，进而对彭德怀等同志进行错误的批判。于是，庐山会议进入后期，会议主题由纠“左”转而开展反右倾斗争。

综上所述，通过比较系统地回顾和考察毛泽东这次纠“左”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形成一点基本的认识，即在这8个多月的时间里，毛泽东曾经纠正他已觉察到的左倾错误，而且是认真的。有一种意见认为，从1957年下半年起，毛泽东的指导思想越来越“左”，他怎么会去纠“左”？！诚然，从1957年下半年起，毛泽东的指导思想确实日益左倾，这是一方面的历史事实；另一方面的历史事实则是，在这期间的8个多月时间里，毛泽东确实曾经纠“左”，尽管这次纠“左”是不彻底的。毛泽东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犯了左倾错误，又在其中的一段时间里纠正左倾错误，这是一种矛盾现象。

① 彭德怀1959年7月14日写给毛泽东的信。

“从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这个结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是在纠正‘左’的错误。庐山会议前期还在讨论经济工作。”“看起来，这时候毛泽东同志还是认真纠正‘左’倾错误的。”^②邓小平的这番话，是历史见证人所作的公正评价。

二

考察毛泽东当时的思想活动轨迹，从而剖析他这次纠“左”不彻底并转而反右的原因。

既然毛泽东曾经认真纠正左倾错误，那么，为什么不彻底，并且转而反右呢？这是人们关注而又难解的一个问题，需要深入研究解答。现从四个方面分析于下。

（一）没有从急于求成、急于求纯的左倾指导思想上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

1956年前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开始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经济建设速度问题上，曾经发生过一场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的争论。实践证明，力争现实可能的较高速度，是必需的和正确的；超越现实可能性，

^①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② 邓小平1980年4月1日的谈话。

片面追求盲目冒进的高速度,则是不成功的。毛泽东的左倾指导思想在经济上的集中表现是,对生产和建设速度急于求成,对所有制变革急于求纯。急于求成、急于求纯,是经济上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高指标、“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则是经济上左倾错误的主要标志。所谓高指标,可说是急于求成思想的量化表现;所谓“共产风”,可说是急于求纯思想的外在表现;所谓浮夸风和瞎指挥,可说是急于求成和急于求纯思想在工作作风上的具体表现。

在这次纠“左”的过程中,毛泽东在一些讲话中也触及过“急”的问题。比如,在谈到北戴河会议提出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时限时,他说过,我并不因为我这个人快要死了,就急急忙忙赶快搞一下。他认为,就是这个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恐怕犯了冒险主义错误^①。对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他曾经指出,这个决议主要的锋芒是向着急这方面的,就是说,不要太急了,太急了没有好处^②。在批评平均主义和本位主义时,他说,两种主义都有,但是我们在党内主要锋芒还是反“左”^③。在讲到调整人民公社内部所有制结构时,他曾指出,“问题只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一点。很明显,这种

① 毛泽东 1958 年 11 月 21 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② 毛泽东 1958 年 12 月 9 日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

③ 毛泽东 1959 年 2 月 27 日同新乡、洛阳、许昌、信阳地委书记的谈话。

缺点只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的问题。”^①在所有制的变革上犯了急于求纯的超前错误，正是这次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之一。但在毛泽东看来，这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足见他始终没有从产生这些错误的指导思想认识问题。

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转变指导思想，虽然毛泽东采取了许多措施，提出了许多要求，但纠“左”并没有完全奏效。比如，尽管他反复要求“压缩空气”，降低脱离现实可能的高指标，但实际上仍然制定和保留了一些过高的指标；尽管他反复强调要刹住穷富拉平、无偿占有和剥夺农民劳动成果的“共产风”，但实际上仍然保留了公共食堂、供给制这些平均主义的东西；尽管他多次批评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社会发展阶段、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两种所有制的界限的错误思想，要求放慢过渡的步骤，但却规定了一个过渡的模式，而且设想的过渡时限仍然是过急的；等等。这说明，不从根本上转变急于求成和急于求纯的指导思想，要彻底纠正由此产生的左倾错误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这次纠“左”不彻底的根本原因。

（二）完全肯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内容是正确的

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急于求成和急于求纯的左倾指导思想的产物。“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虽然反映了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

^① 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忽视了客观经济发展规律，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而且片面强调“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大跃进”不顾客观现实可能性，盲目追求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和高指标，实践证明是失败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超越农业生产力和农民觉悟水平，实际上是搞“一平二调”的“穷过渡”。这些作法的结果是，欲速不达，反而致使生产力被破坏，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倒退，造成国民经济三年严重困难。这个教训是十分沉痛和深刻的。

但是，在这次纠“左”过程中，毛泽东自始至终是在充分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前提下进行的。他认为，它们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内容是完全正确的，不容怀疑和否定。因此，在他的一些讲话和主持起草的文件中，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评价都是很高的。比如，《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人民公社的出现，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一九五八年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产物。”“人民公社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成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的形式”，“成为我国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的形式”^①。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有些人怀疑或者否认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怀疑或者否认人民公社的

^① 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优越性,显然是完全错误的。”他强调,“这种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完全肯定了的。如果对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①很明显,在毛泽东规定的这种框架内和前提下纠“左”是不可能彻底的。

毛泽东这次纠“左”的本意是,纠正他已觉察到的错误,以便更好地坚持和发展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因此,他也曾袒露过自己的一些思想顾虑。关于总路线,他说过:我担心我们这个建设。有一种白杨树,钻得非常快,叫钻天杨,就是不结实。钻得太快了,可能搞个天下大乱。所以,这个问题我总是担心得很。什么路线正确,你晓得正确不正确,到了那个时候,天下大乱,你还正确呀^②?! 因为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③。关于“大跃进”,他说过:跃进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夸大^④。关于人民公社,他说过:要么亡,要么不亡^⑤。巩固和垮台,这两个可能性都存在^⑥。毛泽东的这些话,是从一般意义上就事物发展的两种可能性而说的,并不意味着他认为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错误的,因而要放弃对它们的执著追求。

(三)对这次左倾错误的严重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对纠

① 毛泽东 1959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5 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②⑤毛泽东 1958 年 11 月 21 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③④毛泽东 1959 年 7 月 10 日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

⑥ 毛泽东 1959 年 12 月 9 日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

“左”的成效估计过高

毛泽东这次纠“左”之所以不彻底，还同他对左倾错误的严重性缺乏认识有关。在毛泽东看来，指导思想和路线是正确的，缺点、错误只是工作中的问题；成绩总是第一位的，是主流；缺点、错误总是第二位的，是支流。在这次纠“左”的过程中，他始终套用这个模式来分析日益严峻的形势。比如，对1958年以来的形势估计，他认为：形势本来很好，但是带有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没有想到困难。现在形势又好转了，盲目性少了，大家认识了^①。对缺点、错误的估计，他常说：从局部来讲，从一个问题说，可能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或者三个指头、两个指头。但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从具体事实来说，确实有些得不偿失的事。但是，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因此，还是湖南那句话：成绩是伟大的，问题是不不少的，前途是光明的^②。由于对左倾错误的严重性缺乏清醒认识，因而对纠“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就缺乏足够的认识，势必造成纠“左”不彻底。

这次纠“左”不彻底，还同毛泽东过高估计这8个多月纠“左”的成效有关。在他看来，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经过八九个月纠“左”，“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问题，已经逐步得到解决。八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

① 毛泽东1959年6月29日、7月2日在协作区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

② 毛泽东1959年7月10日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

社十八个问题》的决定后，“共产风”的问题已经大体解决。1959年5月，钢产量降为1300万吨，“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①。他说过，这一年经过了许多会议，我们总是把问题加以分析，加以解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内有些同志不了解整个形势，要向他们说明^②。他设想，庐山会议只需要在这个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认识，安排好经济工作，动员全党全民完成1959年“大跃进”的任务，形势就会进一步好转。因此，当彭德怀等同志要求进一步纠“左”，要求从指导思想清理左倾错误的根源时，毛泽东却认为：我们反了9个月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了，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③。由此可见，过高估计这次纠“左”的成效，也是导致纠“左”不彻底的因素之一。

（四）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不同意见难以申张

1958年，毛泽东连续几次批判反冒进，把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不同意见，说成是犯了政治方向的错误。他还提出有两种个人崇拜，把崇拜真理和崇拜个人混为一谈。这就助长了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发展，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从此，党内民主生活开始不正常，不同意见难以得到发表、听取和采纳。虽然毛泽东作过许多社会调查，但这时已很难了解到真实情况。因此，当彭德怀等同

① 毛泽东1960年6月18日写的《十年总结》。

② 毛泽东1959年7月10日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

③ 毛泽东1959年8月2日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

志提出一些比较中肯的意见时，毛泽东却武断地认为，彭德怀等不是同他一起去纠正缺点错误，而是向他和党中央“下战书”。他指责彭德怀是“右派海瑞”，提意见“居心不良”。他逐条批判彭德怀等同志的意见，说他们不能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重复了反冒进的错误，是在帝国主义压力下表现了资产阶级动摇性^①。他指出：“现在党内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②可见，党内生活不正常，不同意见得不到申张，要彻底纠“左”自然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这次纠“左”是有前提、有限度的。超越他构想的前提和限度的框架提意见，他是不能容忍的。因此，在彭德怀等同志提出一些比较尖锐的意见后，毛泽东认为超越了他构想的框架，于是，急转直下，从纠“左”转而反右。他发动这场反右倾运动，同他 1975 年底发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有些类似。他本想通过整顿解决“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种种混乱问题，但当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形势明显好转时，他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革”的错误，于是，转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不过，历史的发展不会简单重复。

① 毛泽东 1959 年 7 月 23 日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

② 毛泽东 1959 年 7 月 26 日对李云仲来信的批语。

党内生活不正常的另一方面情况是,1957年以来,一些敢于实事求是向党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党内外同志受到打击,从而助长了不敢坚持原则、不敢讲真话的不正之风,甚至给一些阿谀逢迎之徒以可乘之机。在这次纠“左”过程中,包括庐山会议前期,有一些同志不愿或不敢多讲缺点、错误,不愿多听批评意见,对缺点、错误护短,甚至认为纠“左”过头了。这里可举一例。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讲话以后,有些与会同志对于这篇讲话“觉得有些不对头”,“道理有些不妥”。针对这种反映,毛泽东致信刘少奇、邓小平和与会各同志,在说明他讲话中的思想观点形成的过程后,指出“同志们的思想有些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观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错的,但是还不完善。”他建议读一读河南省六级干部大会会议记录。“二月二十七、二十八两天的记录,极有味,极有益,其中有许多批评我右倾和倒退的意见。”^①这个事例说明,对毛泽东发表的纠“左”意见,也有人认为“右倾和倒退”,而对这种说法,毛泽东却认为“极有味,极有益”,足见彻底纠“左”之艰难。

以上这些主、客观原因综合促成了这次纠“左”不彻底,并且转而反右。当然,起决定作用的是毛泽东主观方面的内因。

^① 毛泽东 1959 年 3 月 1 日写给刘少奇、邓小平和与会各同志的信。

三

考察毛泽东在这次纠“左”过程中提出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等,从而论列其中一些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以资借鉴。

在纠“左”中,毛泽东通过讲话、批语、通信和主持起草文件等,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些论述对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长远意义。这里仅就其中的若干基本观点论列于下。

(一)关于社会发展阶段问题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等同志就着手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在这次纠“左”时,针对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界限的错误思潮,他多次论述过两个社会发展阶段的问题。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不同的两个发展阶段。“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而在这整个过程中,社会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经济发展上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①说“相

^① 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当长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有利于打破急于过渡和抢先过渡的空想；说“经济发展上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有利于从原则上划清两个社会发展阶段的界限。

——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必须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① 热心于共产主义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生产力，这句话说得很好，它体现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因为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一定变革。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②。

——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既不能停滞，也不能超前。“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在社会主义阶段停步不前，但是也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认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

^① 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② 邓小平1984年6月30日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时的谈话。

间,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没有隔着也不允许隔着万里长城;我们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的阶段论者,我们认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事物的质的变化,不应当把这些不同质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①这段话阐明了对于社会发展阶段问题应采取的正确认识和态度。强调“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事物的质的变化”,就是说,要尊重客观发展规律,把握事物质的规定性,避免超前或滞后的随意性。

(二)关于商品经济问题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有一些人主张取消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和价值法则等。毛泽东多次批评这种错误观点,强调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

——取消商品经济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避开使用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36条的写法就是证据^②,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③。“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

^① 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② 指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1958—1972年)》中的第36条。这一条最初两稿都避而不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初稿的写法是:产品交换“在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间普遍推行合同制度。”第一次修改稿的写法是:“在国家和公社之间,应当逐步地从合同制度过渡到调拨制度。”

^③ 毛泽东1958年11月10日下午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错误的。”^①在社会产品没有极大丰富和存在多种所有制的情况下,强行取消商品经济,势必就要取消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否定价值法则,必然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

——不能把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作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作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中国是商品生产最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落后。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商品生产看它同什么相联系,商品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些论述说明,商品经济本身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应当大胆地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

——大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以为有了公社,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②。“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以及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③毛泽东之

① 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② 毛泽东1958年11月10日下午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③ 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所以如此强调发展商品经济,并把它视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因为发展商品经济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可逾越的必由之路。

(三)关于按劳分配问题

在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错误倾向的过程中,毛泽东多次批评否定按劳分配的错误观点,强调坚持按劳分配“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

——平均主义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由于生产和劳动的情况有所差别,从而他们的收入也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①在毛泽东看来,平均主义不承认差别,穷富拉平,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实质上也是一种剥夺。这种“穷过渡”是对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

——在社会主义时期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更合理,但是这只有在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以后才可能实现。没有这个条件而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会妨害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就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产品的增加,也就不利于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②毛泽东指出的否定按劳分配必将造成种种

^{①②}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恶果,归根到底,将严重影响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要按劳付酬,引导到平均主义不好,过分强调物质刺激也不好。国家建设也好,革命也好,要有一部分先锋分子、积极分子。没有这部分先进分子,什么都要用钱买,怎么办?我们为革命死了多少人,头都不要了,还给什么报酬?!天天讲物质刺激,就会麻痹人的思想^①。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在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勤劳致富的同时,确实需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发扬创业精神和奉献精神,防止和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

(四)关于综合平衡问题

讲到综合平衡问题时,毛泽东认为,综合平衡是经济工作中的根本问题,并且首次提出要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发展。

——综合平衡是经济工作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要有三种平衡:农业本身的农、林、牧、副、渔;工业内部;工业和农业。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②。这就是说,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但经济工作要为平衡而奋斗。因为只有综合平衡,国民经济才能持续、稳定、协调地较快发展。

——要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发展。农、轻、重、

① 毛泽东 1959 年 7 月 10 日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

② 毛泽东 1959 年 6 月 29 日、7 月 2 日在协作区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

商、交方面，过去是两条腿，后来丢掉了一条腿，重工业挤掉了农和轻，挤掉了商。如果当时重视一下农业、轻工业就好了。到底如何搞法？建设如何安排？过去安排是重、轻、农，重、轻、农的关系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要把农、轻、重的关系研究一下。过去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这样还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原则。重工业是不会放松的。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①。这是毛泽东总结“大跃进”严重失误的教训得来的一条重要原则。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发展，肯定了农业的基础地位，强调了农业的基础作用，从而落实了农业为基础这个方针，至今仍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把衣、食、住、用、行安排好，是关系人民安定的问题。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5个字安排好，这是6亿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安排好了之后，就不会造反了^②。关心和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也是我们党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宗旨的体现，事关安定团结的大局。

(五)关于实事求是问题

在批评浮夸风时，毛泽东反复强调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弄虚作假，要求经济工作越搞越合乎实际。

^{①②}毛泽东 1959 年 6 月 29 日、7 月 2 日在协作区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

——坚持革命热情和科学精神相结合的原则。“必须教育全社的工作人员发扬优良的作风，首先是群众路线的作风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党在任何工作中必须坚持革命热情和科学精神相结合的原则。……目前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是浮夸。这是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相容的。”^① 既要有革命热情，又要有科学精神，还要把两者和谐地结合起来，这是坚持实事求是必须遵循的一个原则。

——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制定和实现计划。“我们的经济工作必须愈作愈细致，我们的各级领导工作人员必须善于区别事物的真象和假象，区别有根据的要求和没有根据的要求，对情况的判断必须力求接近客观实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制定和实现我们的计划。”^② 制定和执行计划既要积极，又要稳妥，这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经济建设工作中的遵循和运用。

——经济事业要越搞越合乎实际。因为现在横直“放卫星”，要有名誉，他没有那个东西，结果他就撒谎。问题是现在我们自己也相信那些东西。主要问题是我们的中央一级、省一级、地一级这三级相信就危险。我看，我们的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致，越搞越合乎实际^③，浮夸风，是一种弄虚作假行为。领导人根据不真实的情况作出决策、制定计划，严重

^{①②}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③毛泽东1958年11月23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脱离实际，确实很危险。

——一定要保护真理和科学。破除迷信，现在有一些把科学也破除了。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①。只有坚持真理，尊重科学，革命和建设才能无往而不胜。

——要按照群众的意见办事，关心群众的迫切要求。“总之，要按照群众的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能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②“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一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③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一个基本点。民心向背，是革命和建设成败的关键。民心不可违背。

(六)关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种种问题，着重讲过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他认为，现在中心问题还是工作方法，要会做工作，“使同志们找到一个较好的工作方法”^④。

——多谋善断。现在有些同志是少谋武断。做计划工作的同志要多谋。经委、建委工作的同志，还有各部，缺乏多谋。多谋，就是多听听人家不同的意见。集中各方面的意见，

① 毛泽东 1958 年 11 月 23 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② 毛泽东 1959 年 3 月 15 日写的党内通信。

③ 毛泽东 1959 年 3 月 17 日写的党内通信。

④ 毛泽东 1959 年 4 月 5 日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

加以分析,然后才能善断^①。

——留有余地。我们过去打仗,用三倍、四倍、五倍、六倍以至七倍的兵力去打敌人,这里面有很大的余地。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现在我们搞工业,就是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是否真正积累了经验?工作方法有相当部分是不正确的,这是政治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问题。长期计划留有余地,让年度计划去超过,这个方法是苏联同志告诉我们的^②。

——波浪式前进。我说过,马鞍形不要紧。我在1957年反对马鞍形,重点是批评反冒进。马鞍形总是会有的,即一年高一年低。不能每天高潮,那样就死人。事物的前进都是有波的,飞机、汽车、走路都有波,军事上也有波^③。

——观察形势和当机立断。有些同志不善于观察形势。观察形势,才能当机立断。断得不恰当,有点武断。我也有武断,如郑州会议说,一般不算旧帐,恰恰相反,一般要算旧帐。这些错误我们也常犯的。要善于观察形势,要当机立断,及时改过来^④。

——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人,因为真理在他手里。有时要反潮流,列宁就是这样。要把自己的观点讲出来。马克思说过,共产党员不要隐讳自己的政治态度^⑤。中国人讲中庸之道,深怕于己不利。我们的同志

①②③④毛泽东1959年4月5日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

⑤这句话出自马克思、恩格斯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写的《共产党宣言》。原话是：“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

胆子太小^①。

毛泽东一贯重视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他看来,在方向、路线正确的情况下,要把工作做好,把党和国家领导好,关键在于必须把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搞对头。

从以上列举的几个问题的基本观点,我们可以认定,在这次纠“左”的过程中,毛泽东确曾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而且它们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有些同志可能会问,既然毛泽东这次纠“左”不彻底,并且转而反右,怎么还能提出一些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观点呢?这是因为毛泽东提出总路线,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纠正他已觉察到的左倾错误,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探索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而这些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观点,是他在探索的历程中获得的一些理论成果,尽管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不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误的教训,都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艰辛探索所创造的一种精神财富或提供的一种思想资料。“我们都是列宁时代的党,大家都还在探索道路,多少都会犯些错误。”^② 周恩来的这句话,道出了对待探索中的失误应采取的态度。

① 毛泽东 1959 年 4 月 5 日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

② 周恩来 1957 年 1 月 17 日同波兰领导人的谈话。

总起来说,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曾经认真纠“左”,并且提出过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但是,这次纠“左”不彻底,而且转而反右,“左”的错误继续发展,直至“文化大革命”时期泛滥成灾。打倒“四人帮”后,彻底纠正左倾错误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肩上。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从指导思想上彻底清理左倾错误,到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胜利完成了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从根本上消除了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十分有害的左倾指导思想。有一种论调认为,“‘左’的思潮是现代中华民族一切灾难的根源”。这是违反历史真实的说法。应该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才是现代中国一切灾难的根源。我们党所犯的左倾错误,确实曾给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过严重损失,但最终都是我们党自己纠正的。这个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是对人民高度负责的。

通过对毛泽东这次纠“左”的历史考察和反思,谨以邓小平这句经验之谈作为本文的结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①

^① 邓小平 1992 年 1 月 18 日至 2 月 21 日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毛泽东对和平改造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贡献

顾 龙 生

在对待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实际，采取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以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和平改造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对民族资产阶级则采取了和平赎买的政策。这一正确政策的实行，有效地改造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扩充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力量，加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物质基础，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得以健全地发展。

毛泽东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改造、关于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由低级到高级的逐步过渡形式、关于和平赎买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和实践，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发展。

一、允许城乡资本主义在一定时期内 存在和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允许城乡资本主义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存在和发

展，是与中国经济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相联系的，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实际，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和书面政治报告即《论联合政府》中提出，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认为想不经过资本主义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是一种“民粹派”的思想。毛泽东强调说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只要加以节制，发展资本主义是有利的。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在革命取得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①。毛泽东指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与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一起，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同时指出，对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要在其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加以必要的限制。决不能任其自由发展。但是，为了整个国家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当前的和长远的利益，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限制得太死，必须允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

^①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

余地。

1951年12月19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农业贷款和私商联营的意见稿时指出：在私商的联营中，公私联营、私资联营和私资联合下乡采购，这三种私商联营的形式均接受国营经济的领导，对我们是有利的，应予支持；而对有意与国营、合作社商业对抗的私商联营，与国营、合作社商业争夺市场的私商联营，则应予以反对，并与之进行合法斗争。

1952年3月，毛泽东在与黄炎培谈话时指出：我们要从经济观点，向大的远的方面看，现在中国的私人资本，在全国工商业经济上，比重还是相当大，向着社会主义走，公私双方都需要发展的。只不要让它向坏的方面发展。要教育改造工商业者，中间还要特别重视工业，要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依据国家经济需要，有步骤地把商业资本转向工业，这于国家是有利的。

当毛泽东得知经过三反五反运动后，中小工商业的发展有困难时，他提出了三条合理解决办法：（一）中小工商业可以走向“联营”的道路。三五家、七八家、一二十家从业务的联合逐渐地趋向资金的联合，从此成为“公司”的方式。（二）从中小工商业的产生来说，大都依靠大工商业而来，尤其是小工厂依靠大工厂而产生。但在情势变化以后，尤其是经过这次三反五反运动，大的对于小的，可能失掉了提挈的作用。政府贷款和加工定货，不可能直接及于小工厂，这是无可如何的。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可以指

定某家小工厂，责成一大工厂去扶助，政府向这一大工厂进行贷款，加工定货，附带一个条件，要求它负责扶助这些小工厂。例如加工定货，大工厂在监督指导之下，酌量一方需求情况，一方接受能力与合理的酬报，分配给予这些小工厂；小商店则由大商店尤其是国营百货公司之类，将货品依照合理的价格，批发给他们经营，从此小工商业得以恢复活动。当然，实行时还需商定出种种适当办法来，这是“大带小”方式，也许是中小工商业今后的一条道路。（三）在条件具备之下，中小工商业改变为合作社，当然也是一条道路。这几条道路，究竟哪一条适宜，也许此外还有适宜的道路，都要看实际情况来斟酌采用^①。毛泽东指出的解决私营中小工商业出路的这三种办法，为以后提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等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理出了思路，这三种办法归结到一点，就是要维持中小工商业的生产，使私营中小工商业继续存在下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以适应新民主主义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1952年11月16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这个指示决定国营贸易企业在1953年全部实行经济核算制——笔者注）中，根据当时公私关系的紧张形势，失业人员大量增加，许多中小工商业者、家庭商店及摊贩，已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570—571页。

在埋怨我们的情况，他提出：为“使中小工业家、手工业者和农村家庭副业的产品找到较多的销路，不使他们发生困难”，“在零售方面，公私商业的比重，就全国平均数来说，目前仍应按今年六月中央财政会议所规定的百分之二十五和七十五的比例，如有增减，应报中央批准。”^①毛泽东要求在当前阶段，注意维持私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

1953年1月2日，毛泽东在当时商业部正、副部长曾山、姚依林给毛泽东等同志写的信的批语中，肯定了来信中提出的国营商业在销售上要尽可能多卖钱，但又要注意不致把私商挤垮等做法的正确性。

同年5月，毛泽东又就私营工商业问题提出：“私营问题的中心，和国营一样，是民主改革与增产节约，这个问题解决了，劳资关系等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②

在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密切注意工商业的情况，了解工商业者的态度，利用、支持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并为随后而来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作了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准备。在这段时间内，我国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有所发展。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10—611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24页。

二、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在总路线提出后进行的。

在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写的《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手稿上，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手稿指出：党的任务是在10年至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指出：“社会主义成分是可以逐年增长的，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是可教育的。”^①

1951年6月28日，毛泽东在胡乔木6月27日的来信上的批语中说：“现在的资本主义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和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其领导的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它的性质已完全不同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私营企业。因此，不能以国民党时代的态度来对待这些资本主义企业，否则就是错误的。

在7月9日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讲得更加明确、系统，他说：“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51页。

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有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①

1953年7月20日，毛泽东在对全国总工会党组7月14日报送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加强资本主义工业企业中的工会工作的指示》作的修改中指出，加强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工会工作，必须贯彻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这里所说的改造还不是指取消资本家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使之变为社会主义企业的那种最后的改造步骤。这里所说的改造，是指在承认资本家的受限制的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的条件下，使资本主义企业逐步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即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用各种方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下的资本主义，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即是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它是带了若干（有几种程度不

^① 毛泽东：《关于国家资本主义》，1953年7月9日。

同的情况)社会主义性质的。”这种带有若干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目前并不是一切或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工厂已经做到了这一步，还没有，还需要几年的努力才可以做到这一步”^①。

毛泽东认为，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方式，已经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的由低级到高级的几种形式，这几种形式都是切实可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和平改造私营工商业的较为健全的方针和办法。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要稳步前进，不能急躁，既要反对遥遥无期，又要反对急躁冒进。

1953年9月4日毛泽东提出：“我们的一切工作，围绕一个总目的，这就是要达到：在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在正确地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过程中，稳步地完成过渡时期建设和改造我们国家的伟大任务，即是说，我们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须要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发扬正确的思想，批判错误的思想。只要我们大家了解，做法适当，我们是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79—280页。

有信心逐步地完成这个任务的。”^①毛泽东还指出：要鼓励和引导资本主义工商业转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从而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

1953年9月7日，毛泽东邀约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座谈，李济深、陈叔通、黄炎培、章伯钧、章乃器、李烛尘、盛丕华、张治中、程潜、傅作义等参加了座谈。毛泽东对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问题作了系统的发言。这次谈话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4年3月12日，毛泽东在杭州给黄炎培写信，对黄炎培3月1日在上海工商界讲话的讲稿提出自己的看法。黄在讲稿中借用“无痛分娩法”这个医学术语来比喻工商界在进入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没有什么痛苦，对此，毛泽东提出：“‘无痛分娩法’一词最好不写在印刷品上，因实际上那些不甚觉悟的人们总会觉得有些痛苦的，支票开得多了，可能引起幻想，而不去加重教育和学习，不去提高政治觉悟，结果感觉痛苦的人就会对我们不满。”^②毛泽东同时给周恩来和李维汉写信，告诉复黄炎培信函事，并补充说，“阶级消灭，个人愉快”似以改为“阶级消灭，个人存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22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68—469页。

在”为适宜^①。这两段话，表明了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改造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困难和问题给予了足够的估计，并以务实的态度处置这个问题，不给民族资产阶级以不切实际的幻想。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过程中，毛泽东不断给予正确指导。他在一次讲话中说：“国家资本主义，是讲逐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只有公私合营一种形式，而是有各种形式。一个是‘逐步’，一个是‘各种’。这就是逐步实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以达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原则，要达到这个原则就要结合灵活性。灵活性是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形式不是一种，而是‘各种’，实现不是一天，而是‘逐步’。这就灵活了。”^②

在一次座谈会上，毛泽东分析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1949年全部没收，一个钱不给，这个办法好不好呢？还是拖到15年、18年，用工人阶级替他们生产一部分利润，而把这个阶级逐步转过来这个法子好呢？实际上是这么一个问题，这样是比较好。这两个方法，一个恶转，一个善转；一个强力的转，一个和平的转。我们现在采取的这样一个方法，经过许多的过渡步骤，经过许多的宣传教育，采取了与对地主、官僚资本主义不同的政策，和平地改造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同时，毛泽东还指出，要照顾私营工商业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68—469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09页。

的利益，不要将他们挤垮，这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毛泽东对国家资本主义还有一种特定的解释，认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有各种不同的形式，那就是国家所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在多种复杂形式下的经济联盟，而不是一种独特的所有制形式。

三、在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同时， 用和平赎买的方法改造民族资产阶级

建国初期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我们用和平赎买的方法改造了民族资产阶级。

毛泽东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是可以教育的，其成员是可以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这是由于：

第一，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机器，有着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

第二，民族资产阶级既有剥削工人的一面，也有拥护共同纲领的一面，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第三，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与民族资产阶级从民主革命时期起就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就结成过联盟。

因此，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用和平的方式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就具有客观的和现实的可能性。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期，毛泽

东即肯定了整个工商界的基本情况是好的，是向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的。

这种对民族资产阶级总体情况的估计是必要的。如果缺乏一个基本的估计，那么无论是中国共产党，抑或是民族资产阶级本身，就会对社会主义改造失去信心，就会不利于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改造。

毛泽东在分析私营工商业者情况的时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和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作用，都作了充分的估计。他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做了好事的，有益于国计民生。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其他各国不同，从孙中山起就为民主共和国奋斗，后来我们接手，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性质。中外的资产阶级都有过积极的作用，曾经革命的力量对生产力发展都有作用。资产阶级在革命时也有唯物论，不是历来都是唯心论。因此，希望他们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不要有惧怕的心理。

在谈到“两个联盟”的问题时，毛泽东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和农民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结成了一个巩固的联盟的基础之上，又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了另一个联盟。当然，为了结成和继续这个联盟，为了借助国家资本主义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这个代价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

在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内也不是没有斗争的，有些人反对对资产阶级和平赎买，

不承认资产阶级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对此，毛泽东指出：在我国条件下，不承认资本家这个阶级的绝大多数（90%以上）有用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可能，忽视或者否认宣传教育的方法在改造资本家的问题上的重大意义，这就是不承认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不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力量，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威信和能力，不承认党的对资产阶级联盟和采取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形式这一根本政策的正确性，这种观点无疑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还批驳了一个自称为“上海工人”的来信中否定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反对党的和平赎买政策的主张，认为这是以“左”的面貌来反对我们党的正确路线，是一种挑衅，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工人阶级的。

用和平赎买的方法改造民族资产阶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保护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一次，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曾就赎买问题说，我们很重视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有700万人。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原因有二，一是他们有文化，二是他们有技术。一般地说，他们文化和技术都比较高。毛泽东特别指出：中国如果不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就要犯很大的错误。在革命时期如此，在建设时期也是如此。民族资产阶级有很高的文化，又有管理经济的经验，因此我们不仅在民主革命时期团结他们，而且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必须团结他们。他们对国家有很大贡献，我们对他们要采取耐心等待和说服的政策，有些

要办的事情，他们不同意，我们可以暂时不办，再商量，等待一下。在经济建设事业上，我们也事先和他们商讨。我们对私营经济采取统筹兼顾也就是公私兼顾的政策，对于国营和私营工商业同等对待。

毛泽东认为，民族资产阶级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他们自己是有好处的。他指出，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看到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在和我们合作搞五年计划中间，我国日有进步，比以前好，物价稳定，生产年年增长，他们的工作也得到安排，政治上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们的代表人物参加了中央和地方的人代会和政协，所以他们就会考虑合作好还是不合作好，跟那一个走好。他们的子女也一样有机会上大学，毕业后也一样分配工作。了解了这些，就会了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什么愿意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为什么要合作呢？如果没有好处，他们就不会愿意合作。合作对他们来说，有暂时的好处，也有永久的好处。

1955年10月27日和29日，毛泽东邀集工商界代表人物座谈，他在谈话中着重指出：关于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加工订货就是初步基础了，公私合营是第二步了，然后再到第三步。工商业改造并不容易，相当复杂，全体工商业者连家属共3000万人以上，包括小商贩、手工业主、手工业者（不包括店员、手工工人）、船主、渔业资本家等等，其中雇工的厂主、店主连家属约700万人，情况是很复杂的。逐行逐业要安排，要有事做，还要教育。

毛泽东分析了私营商业者的情况后认为：私营工商业者，中小户漏税多，大户要好些，有的工商业者因为是知识分子，听报告多，要开明些，中小的听报告少。如果讲得资本家一点好处都没有是不好的，守法户总是多数，三反五反作了结论的，绝大多数基本上是好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总的说来，基本上做了好事，有益于国计民生。有些人偷税漏税不好，因为还有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这个制度，就有这些问题，但是说百分之百偷税漏税，我不相信。

毛泽东指出，对于民族资产阶级，要安排好，要使这些人过得去，一个工作岗位，一个政治地位，要安排好。民族资产阶级同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不同。资本家如果将来饿肚子，这个制度就不好。如大家生活不提高，革命就不必要，生活福利都要提高。

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工商业者对于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改造的认识普遍提高，纷纷要求走公私合营道路，形成了全行业申请公私合营的高潮。

1955年11月9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展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的指示（草案）》进行修改时，强调指出，必须在私营工商业者中间培养一批由于接受党的教育，提高了政治觉悟，逐步地解决了下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的核心分子，“党委应当经过党委负责人、政府工作人员及统一战线部门的工作人员和经济机关的工作人员，经常教育这些核心分子”。

1955年11月14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社论《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清样稿作了修改，他指出，“资本家一旦放弃了剥削，他们的社会成分就不再是资本家，而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他们和工人、农民就没有矛盾了，他们就一身轻快不受社会责备了。这里说放弃剥削，不是说马上就要这样做，而是说现在要做思想准备，要在各城市的资本家的学习组织中逐步地适当地展开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如有疑问，要有适当的人给予解答，要准备经过公私合营，逐行逐业的改造，在条件完全成熟以后，最后达到国有化。”

1955年11月17日，毛泽东对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进行修改时指出：对资本家的各项教育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引导资本家自己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应当有领导地普遍地加以推广。要根据情况的变化，有时着重鼓励，有时着重批评。在批评的时候，也要对他们指出改正的希望。

毛泽东还指出资产阶级分子腐蚀我们和我们反对资产阶级分子对于我们的腐蚀的斗争将是长期的。但是三反五反以后，资产阶级已被孤立，心中惶惶无主，想靠拢我们，许多同志不了解这种变化，他们被三反五反的斗争吓怕了，因而对于（工商业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产阶级的改造问题存在着悲观主义，怕和资本家接触。有些人对资本家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有些人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对于资产阶级的实际情况不作全面分析，以为如果要

说到资产阶级除了消极的一面之外还有积极的一面似乎便将“伤害马克思主义”。他们也没有主张没收资本主义企业，但又不相信党、群众和国家的力量可以经过教育说服的方法来改造资产阶级。因此，放任自流，使自己陷于被动。这种倾向在表面上是“左”的，而实质上却是右的。

在这之后，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提到，和平改造工商业者，要采取批评这种斗争的方式。1955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信中说：“工商界改造工作有进步，令人欣慰。惟须加强教育，使之普及到大中小城市的各行各业。看来工商界是可以采用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的，这次工商联合会讨论的经验可以推广。”^①

其后，毛泽东又在对李维汉的一篇讲话稿所作的修改中指出：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已经接受了公私合营或者准备接受公私合营这样一种改造。对于资产阶级，一般以教育为主，不放弃必要的斗争，因此，除了大约占百分之几的具有严重情况的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以外，其余的，应当肯定是可以又鼓励又批评的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批评就是对于他们的主要的斗争方式，当然还要有对违法者给予罚款等等一些斗争方式。

毛泽东还在一次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会议上说，现在资本家已经一只半脚踏进社会主义，快要变成工人阶级了，应当在党内进行广泛的解释和教育，使广大党员提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03页。

高认识，取得工作的主动权。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从去年夏季以来，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展开起来。大约再有3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毛泽东还就和平改造问题指出：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过去几个月来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意料，过去有些人怕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现在看来，这一关也还是容易过的^①。

在这次最高国务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在谈到我们把制度改变以后，需要学习科学知识时说，我们应该向科学家学习，资本家也有一些好的东西，我们也应该学习，当做民族遗产留下来。用得着的东西，不要统统丢掉，革命不要把这一部分积极的因素改掉了。科学家李时珍的东西，一些好的古典作品，几千年前的诗经、楚词还在学习，为什么现在的资本家我们不能向他们学习一点好东西呢？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他们还可以当先生。他们的制度、习惯、思想应当改变，他们应该学习，但其他的科学管理方法、经营方法不如他们的，应当向他们学习。全国人民都应该学习科学，没有这个东西，光有党的政治是解决不了

^① 见1956年1月26日《人民日报》。

问题的。

在此之后，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或在别的有关场合，曾作过多次与上述内容相同的谈话，他说，学习资产阶级的知识和技术是为了加以利用。在经济建设事业上，我们事先要与他们商讨。总的目的，也是为了发展生产力。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赎买基本结束以后，毛泽东还就定息问题、民族资产阶级的安排问题 and 自我改造问题发表过意见。毛泽东说：对资本家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物质问题，一是思想问题。物质问题就是有职有权，有工资可拿，拿到工资能过生活。定息时间要长一些。思想问题要资本家改造自己，发挥他们的作用，不但使用老经验，而且使得他们能够发展新的经验。

毛泽东说，现在看起来苏联消灭阶级，消灭太早了，不能够使用资本家的能力。当然历史条件不同，中国比苏联、比东欧兄弟国家，比他们来得有利。又说，资本家学习是为了自己，同时也为了国家。中国过去是不行，经济落后，现在虽然是好了一点，但还要大家努力。让资本家多拿几年定息，安心工作，安心学习，对工人阶级是有利的。对资本家要从两方面看。我们把资本家当成真正的财富，重视工商界，他有进步的文化。

在随后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中，毛泽东批驳了说资产阶级是反革命阶级和不革命阶级的论点，说现在有“左”的空气。资产阶级是有进步的，反革命、不革命的只是个别的，与工人阶级的矛盾不是对抗的，妥协了，还有什么对

抗？资产阶级，作为阶级，不能讲不革命或反革命。现在有些文章太“左”了。合营了，没有对抗了，合营前已经没有什么对抗。要组织人写文章。资产阶级三反五反后没有对抗，三反五反也不全部对抗，只是一部分对抗。以前孙中山同盟会，他在帝国主义压力下，一面对抗，一面妥协。现在是否一面对抗，一面合作，两面性是一面进步，一面落后。阶级多年形成，怎能只有一面性？如果认为只有一面性，结果就没有改造了，大家尾巴会翘起来。定息完结后，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有两面性。说只有一面性，不利于改造、进步。现在资本家学习热情很高，看来民族有希望。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以及基本完成工商业改造以后的1956年下半年，毛泽东就对资改造问题有一系列重要论述，他在对资改造问题上花费了大量精力。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对资改造的许多言论、著述，至今仍然是正确的，并没有因时光的流逝而失去其意义。当然，也有一些话，当时看来是正确的，但为尔后的实践证明未必完全符合发展了的实际情况，这应当视为历史的局限，是任何一个伟大人物所避免不了的。

例如，毛泽东对彭真的一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发言稿作修改时，加写了一段这样的话：农业合作化“是使城市资产阶级彻底地孤立起来，造成一种使他们非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不可的形势，因而可以彻底地消灭一切资本主义痕迹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

“彻底地消灭一切资本主义的痕迹”这句话，与毛泽东

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加写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这句话一样，现在看来显然是需要加以重新认识的。首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彻底地消灭资本主义的一切痕迹是不可能的，恐怕也是不必要的。其次，实践已经证明，所有制的成分和形式不应是单一的，而应该是多样的，只有在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情况下，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等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才能促进生产力的提高。这些非社会主义成分的经济形式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人为地取消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在分配领域，要在贯彻按劳分配这个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形式，如私营企业主的收入，就是非劳动收入，三资企业中的外资、外商是按照其投入的资本多寡来进行分配的。看来提出消灭一切资本主义痕迹这句话本身，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估计不足的。应该说，在社会主义改造结束之后，我们国家逐渐形成的过分单一的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所有制结构，以及产生不利于生产力高速度发展的“大锅饭”等分配中的弊病，在理论上与毛泽东的类似这样的观点是不无关系的。

四、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平赎买资产阶级，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一化三改造”的任务之一。毛泽东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两者是互为作用，互相促进的。我们在对这两者的改造中，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是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贡献和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曾提出过用和平赎买的方法，把资产阶级的企业实行国有化的设想。他们认为，这种设想如果能够实现，对于无产阶级是最便宜的事情^①。

列宁曾主张对愿意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的“文明的资本家”实行赎买，对不愿意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的“不文明的资本家”加以无情的惩治。但是无情的事实是，俄国的资产阶级都不愿意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的和平赎买方式，于是，只好采取了剥夺的政策。用赎买的办法把资本主义企业完全国有化的设想在苏联没有成为现实。

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资本主义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4页。

工商业的改造中，根据中国国情实际，制定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由低级到高级的形式，逐步地将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引上了国营经济的道路，胜利地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能够完成的和平变革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使命，而且又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

我国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中，包括基本完成所有制改造后的全部赎买（即定息）过程中，共花了 32.5 亿元人民币。虽然这点钱已经超过了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私股股金总额 24 亿元的数额，但还是合算的。毛泽东说：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这对无产阶级是十分有利的。因为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一般都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和一定的经营管理经验。我们把这个阶级买过来，既照顾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又减轻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阻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调动了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说到和平赎买政策所取得的胜利，毛泽东指出：这个政策，中央是仔细考虑过的^①。实行这样的改造政策，不仅生产没有受到破坏，而且有些私营工厂在过去几年中还进行了部分的扩建。资本家由于在过去几年中有利可图，有些人也还自愿地向工厂进行投资。我们在处理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有很丰富的经验，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例如，公

^① 毛泽东 1957 年 1 月 18 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私合营以后给资本家定息，就是一个新经验^①。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对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改造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先河，它丰富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宝库，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贡献。

^① 引自毛泽东谈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时的谈话记录稿。

毛泽东、刘少奇、陈云、邓子恢 农业合作化思想之比较

——兼谈党内关于合作化问题的几次争论

孙 业 礼

五六十年代，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在党的主要领导人之间曾经有过几种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实际上体现了党的老一辈革命家根据各自的实践对我国农村发展道路作出的不同探索。认真分析和研究这些观点，对于我们今天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发展道路将是不无启发的。本文将以前五六十年代党内关于合作化问题的几次争论为线索，试着对这些不同的观点进行一些比较研究。

一、1951年关于生产合作与供销合作的争论

1951年的争论，主要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两种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当时要不要在农村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1年4月，山西省委向中央、华北局写了一个题为《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报告根据华北地区由于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一部分农民已达到富裕中农的

程度，某些互助组开始涣散，农民自发势力增强等情形，提出：应该扶植与增强互助组内“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两个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的自发趋势，引导互助组走向更高一级的形式，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制的基础^①。刘少奇接到山西省委的报告后，当即明确表示：现在采取动摇私有制的步骤，条件不成熟。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不要急于搞农业生产合作社^②。5月7日，针对这一问题，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又指出：“山西省委在农村里边要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苏联叫共耕社），这种合作社也是初步的”。“当然这种合作社是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可是单用这一种十家八家组织的农业合作社、互助组的办法，使我们中国的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实现不了的，我们中国党内有很大的一部分同志有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要纠正。”^③以后，刘少奇又在许多不同的场合发表了类似的意见，认为将来在实现机械化以后组织起来的集体农场与现在的生产互助组织完全是两码事，现在的生产互助组织不可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场^④。

毛泽东了解到此事后批评了刘少奇关于互助组不能生

^①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一九四九——一九五七），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35—36页。

^{②③④}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87、188、189页。

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制基础的观点，并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①。针对刘少奇的观点，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9月份，毛泽东倡议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会后起草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草案）》肯定了在土地私有或半私有基础上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11月20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央的批语，批转河北省委向华北局的综合报告，赞成河北省委年内年内把互助组由60万个发展到100万个，并把部分互助组发展为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做法。12月15日，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印发9月会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的通知，要求各地把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来抓。

此后，刘少奇作了自我批评，争论暂告结束。

然而，在关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后，不应直接剥夺农民，而必须立即用合作化的形式引导农民自愿地走集体化道路的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理解是一致的。毛泽东的这种思想众所周知，自不待论。刘少奇也早就有过类似的论述。1948年，刘少奇在《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的手稿中就指出：“合作社这一个组织形式，是无产阶级及其所领导的国家去帮助、教育、组织与改造千千万万的小生产者最主要的形式。可以说，如果没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页。

有合作社，如果不把合作社办好，因而使全国极大多数的人民获得极大的利益，并取得他们有力的支持和拥护，如果不把全国极大多数（如果不是全体的话）的小生产者都组织到各种各样的合作社中，那末，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就无法系统地领导、组织与改造千千万万的散漫的小生产者。”^① 同年，他在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再次指出：“没有合作社，无产阶级就不能在经济上领导农民，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合，这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是一个带决定性问题^②。”稍后，他又进一步指出：毫无疑问，中国的农业“是可以经过合作社的道路逐步前进到社会主义的^③”。

可见，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不在要不要在民主革命胜利后立即实行合作化的问题上，他们的根本分歧在于对合作化的内涵理解不同：毛泽东所说的合作化主要是指农民的生产合作，而刘少奇所说的合作化主要是指农村的商业或供销合作。

事实上，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和刘少奇对于革命胜利后，用怎样的合作化形式引导农民向社会主义集体化过渡的问题，都已形成了各自的构想。只是那一时期，由于忙于战争，这个问题尚未提上主要议事日程，因此没有发生明显的争论而已。

^{①②③}《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1、32页。

1943年10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作的《论合作社》的报告就曾高度评价了农业生产中的互助合作运动。他说：“今年边区在发展生产上又来了一个革命，这就是用合作社的方式把公私劳动力组织起来，发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劳动效率，并大大发展了生产。”“如果不从个体劳动转移到集体劳动的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建设在以个体经济为基础（不破坏个体的私有财产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非常需要了。只有这样，生产力才可以大大提高。”这里，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这办法可以行之于各抗日根据地，将来可以行之于全国。这在中国经济史上是要大书特书的^①。”

同年11月，毛泽东又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发表了《组织起来》的演讲，再次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在边区，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了许多农民合作社，不过这些在目前还是一种初级形式的合作社，还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才会在将来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②。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1页。

在毛泽东上述论述中，有两点是比较明确的：第一，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已经形成了用合作化的方式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设想；第二，他设想的合作化，主要是指生产中的合作。尽管在他的一些论述中偶尔也提到其它形式的合作社，但他注意的中心还是农民的生产合作。

从历史上看，刘少奇关于用供销（或商业）形式的合作化引导农民逐步走上集体化道路的设想，形成稍晚一些，但到1948年也已有了比较明确的表述。

1948年9月，刘少奇在《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的手稿中即指出：“中国还是一个小生产占极大优势的国家，还是一个农业国。在这样的国家中，千千万万的分散的独立小生产者，是经过一种商业关系把他们联系起来，并使他们与大工业联系起来，构成国家和社会的经济整体。”要利用这种商业关系“逐步地引导小生产向着集体方向发展，以改造他们。”如何利用这种商业关系呢？刘少奇认为，利用的方式即是普遍地组织商业性的合作社，“试想，如果我们在极广大的范围内，将来在全中国，不建立健全合作社系统，不建立合作社的商业系统，那我们是否能够和投机商人斗争呢？是否能够与旧资本主义成分斗争呢？那是不能进行这种斗争并获得胜利的。因为这种斗争中，合作社，特别是合作社的商业，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①

关于商业或供销合作社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关系，刘

^① 《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2—8页。

少奇在这一时期也作了专门的论述。他认为合作社可分两种，即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但“从目前解放区的情形，以及在革命胜利后全中国的情形来看，由于中国工业的落后，在革命胜利后进行经济建设的最初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广大的范围内组织消费合作社是极端重要的。”^①“特别是在今天要着重提出商业问题，提出供销合作社的问题。因为我们历来重视工农业，而忽视了商业的重要性。”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刘少奇还引用列宁和斯大林的话，指出：“列宁与斯大林都说过，合作社首先是销售小生产的货物，然后是提高到生产合作社。”“我们也应当是这样。”^②刘少奇甚至在这时就批评了急于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作法。1948年12月，他在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上作的《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与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今天我们对农业合作社不能有过高的要求，只有在有了机器时，生产合作社才能发展和巩固。”因此，目前提出“巩固变工队”等口号是不适宜的，是“左”的。

与毛泽东相比，刘少奇对农村的生产合作注意不够，但对商业或供销合作则寄予了极大的希望，他在这方面也花费了巨大的精力。这点，从刘少奇专门论述这一问题的论著中即可看出，这一时期能见到的刘关于供销合作的论著，1948年有4篇，1949年有4篇，1950年有8篇，1951年

^{①②}《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12、23页。

6篇。刘在这些论著中主要论述了供销合作社的问题，很少提到生产合作的问题。1950年，他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草案)》所写的总则中提到了4种合作社的形式，但没有一种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可见，刘少奇这一时期的观点是比较明确的。

生产合作与商业合作的区别是很大的。商业合作不直接涉及生产的问题，因此，不会相应地提出变革生产关系的问题；而生产合作的巩固和发展，必然直接涉及到生产关系的变革。这也就是1951年毛泽东和刘少奇争论的原因所在。

毛泽东和刘少奇同是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产生如此大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与他们各自经历和思想方法有关。刘少奇似乎更多地受到列宁的论述和苏联经验的影响，而毛泽东的设想则来源于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

关于合作社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前后也不太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和《论土地国有制》等著作中对这个问题曾有过论述，他们设想的基本形式是“把土地交给联合起来的农业劳动者”^①，把农民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②。

① 马克思：《论土地国有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54页。

② 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10页。

他们所设想的实际上是一种生产资料归公社所有，集体劳动的“共耕制”。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开始也是这样实践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他们试办了几种组织，如农业公社、合作社等，这些组织都是集中劳动，实行余粮收集制，并且关闭市场，准备取消商品和货币，但试办的结果，农民并不欢迎。列宁也多次批评了这些严重的缺点，认为当时还不能奢谈集体化的问题。于是，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提出了通过商业合作社把农民组织起来的设想。1921年4月，他在《论粮食税》一文中指出：商业形式的合作社“便于把千百万居民，尔后把全体居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而这种情况，从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又是一大优点^①。1923年，他在《论合作制》一文中又进一步指出：“新经济政策时期，使俄国居民充分广泛而深入地合作化，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这种商业性的合作社“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足够的一切”^②因此，在整个新经济政策时期，商业性的合作社一直是苏联政府组织农民的主要形式，直到斯大林开始推行集体农庄。

而刘少奇正是在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来到苏联的，从他后来在关于商业性合作社的论述中经常引用苏联的经济和列宁的论述这点可以看出，苏联的经验和列宁论述对他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另一方面，民主革命时期，刘

^{①②}《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22、681—682页。

少奇在白区搞工人运动的时间较长，城市的商品经济可能对他影响较大，因此使他考虑问题时更多地从商业这方面着眼。这也可能是刘少奇重视在农村组织商业性合作社的一个主要原因。

解放前，毛泽东没有去过苏联，他更重视中国革命的实践，重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善于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长期以来，中国农村的商品经济并不发达，农民在商业方面联合或合作的愿望及实践较少。相反，由于贫困落后，生产工具缺乏，以及旱地兴修水利的需要，农民在生产中合作的愿望较强，实践也较多。互助合作也正是中国农民自己的创造。中国农村长期以来就存在着各种互助合作组织，特别是北方旱地地区。如延安地区，历史上就存在着“人工的变工”、“人工变牛工”、“伙格牛”、“并耕”、“伙种”、“扎工”、“唐将班子”等多种民间生产合作的形式。毛泽东把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农民的这些实践经验相结合，重新对这些经验进行了总结、提高并赋予其以新的意义。另外，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前长期处于武装割据的根据地之中，这些根据地往往受到敌人的严密封锁，发展商品经济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生产中的互助合作比商业上的合作就更为重要。因此，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总结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提出重视生产合作的理论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从上述情况看，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合作化思想都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依据。从后来的实践看，毛泽东的思想的

确代表了大批农民的愿望，而且中国共产党正是按照这种思想，迅速地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后来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产生的一系列不良后果，如生产关系变动过快，生产中的大呼隆、分配中的平均主义等也都是与毛泽东的这种思想分不开的。

刘少奇的思想未能全面付诸实施，但从今天的情况看，刘少奇的思想的确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这种思想也有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很难用商业合作的形式引导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也无法满足由于工业的迅速发展而对农产品的大量需求。这点，苏联的情况即可佐证。苏联推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农户的财产越是富裕，他的剩余商品越多，它的占有者越愿意参加合作社组织。”“贫农户和力量薄弱的农户由于没有足够的剩余商品或完全没有剩余商品，较少对农业合作社组织，尤其是较少对它的商业业务感兴趣。”^①这样，这种商业性的合作社组织，往往被农村的富农把持，从而使国家对粮食等农产品的收购也产生了很大的困难。

从今天的角度看，也许在当时，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观点结合起来，情况会更好些。但这种结合谈何容易，即使在今天，我们在这方面已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也只能说，还只是刚刚开始。

^①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467—468页。

二、1955年关于个体经济与集体经济的争论

党内关于农业合作社问题的第二次争论发生在1955年，党的高级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陈云、邓子恢都不同程度地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这场争论，但争论的主角是毛泽东和邓子恢。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邓子恢和毛泽东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特别是1951年的争论之后，邓子恢也赞成通过生产中的互助合作逐步引导农民走上集体化的道路。1953年，他在全国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中就指出：“互助合作是走向集体化的不可逾越的过渡形式，不能跳过这一关。”^①此后，他在许多地方也反复表述了类似的观点。

毛泽东和邓子恢的争论焦点是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速度问题。产生速度问题的争论与毛泽东过分担心个体经济的自由发展，会产生两极分化，因而，希望早一点向社会主义集体化过渡有关，这固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仅此还不足以说明这次争论的全部实质。实际上毛泽东和邓子恢对于发展农业生产方式的不同见解才是导致他们发生争论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毛泽东认为，合作化更有利于发

^①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一九四九——一九五七），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32页。

展农业生产，而邓子恢则认为个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更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用互助合作的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更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的观点，可以说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早在延安时期他的这一观点就已形成了。1943年，他在《论合作社》的讲话中即指出：“如果不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的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只有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式把农民组织起来“生产力才可以大大提高”。他还举了当时陕甘宁边区的例子作为证据：“现在陕甘宁边区的经验，一般的变工扎工劳动是二人可以抵三人，模范的变工扎工劳动是一人可抵二人，甚至二人以上。如果全体人民的劳动力都组织在集体互助劳动之中，那末现有全边区的生产力就可以提高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一百。”^①

解放后，毛泽东要求加速农业合作化，还是希望用互助合作的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发展农业生产。1953年10月15日，他在谈话中指出：“各级农村工作部门要把互助合作这件事看作极为重要的事。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发展合作社“最后的结果是要多产粮食、棉花、甘蔗、蔬菜等等。不能多打粮食是没有出路的。于国于民都不利。”^②在同年11月4日的谈话中，他进一步指

^① 《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889—891页。

^②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一九四九——一九五七），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199页。

出：“搞农货、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作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①毛泽东在这里说的社会主义，就是指合作化。

1955年7月，在同邓子恢争论的那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仍然特别强调合作化对于发展农业生产的作用。他说：“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生产上，必须比较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决不能老是等于单干户或互助组的产量，如果这样就失败了，何必要合作社呢？更不能减低产量。已经建立起来了的六十五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都增加了农作物的产量，这是极好的情况，证明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是高的，合作社胜过互助组，更胜过单干户。”^②看来，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合作化比个体经济更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的观点是坚定和一贯的。

与毛泽东相比，邓子恢则认为个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农业生产的发展比合作化更为重要。这点也可以从历史

^①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一九四九——一九五七），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00、366页。

上找到根据。1941年，邓子恢在津浦路东临时参议会上的报告中，对于发展农业生产曾提出了6点措施，如保护耕牛、办理低息贷款等都是针对个体农民的生产而言的^①。1942年在淮北高干会议上的发言中，对于如何搞好春耕，邓子恢又提出了4条措施：垦荒、救荒、发动私人借贷和调节粮食，其中仍然没有一条是互助合作。在提到部队的集体生产时，还特别指出：“集体生产，专人管理是部队生产的胜利经验。”^②由此可见，邓子恢比较重视个人管理的作用。

建国后，特别是1951年发生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争论以后，邓子恢也开始强调农业生产中互助合作的重要性，但它只是把互助合作作为向集体化过渡的一种手段，没有把它当作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一种方式。他在农村工作部时，经常告诫该部的同志：土地改革后焕发起来的个体生产积极性，是农村生产的主要方面，要加强对个体生产的领导和支持，无论如何要避免“合作社生产没搞起来，而个体生产又消沉下去的那种两头落空的局面。”^③1953年，他在全国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提出了雇佣、借贷、租佃、贸易自由问题，尽管他提的这些自由都是有条件

^① 《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一），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3—186页。

^② 《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二），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8—129页。

^③ 《邓子恢农业合作思想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农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39页。

件、有限制的（不象后来批评的四大自由），但这些的确是针对个体经济而言的，有利于个体经济的发展。1953年他还特地批评了山东聊城地区在布置农村生产任务时，对小农经济的私有性、分散性这些本质属性的特点认识不足，不予照顾的做法，提出在发展农业生产时要“时刻记住并且照顾到小农经济的特点。”^①

1955年5月，在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邓子恢还进一步明确地批评了有些同志以为只要办了合作社就能增产的观点。指出：“我们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工业化，可以想见，真正使合作社增产，那是很费劲的。”“认为合作社只要办起来自然就会增产，那除拜天老爷保护它。”^②

这样，在邓子恢的思想中就产生了一个矛盾，既要用合作化的方式引导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要在合作化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个体生产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邓子恢试图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因而他提出，要放慢合作化的进程，在合作化的过程中要充分照顾到个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这恰恰与毛泽东只有加速实现农业合作化，农业生产才能大发展的想法是矛盾的。于是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争论。

^{①②}《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一九四九——一九五七），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06、338页。

毛泽东和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思想差异，主要也是由于他们各自不同的经历造成的。如前所述，毛泽东关于合作化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的观点，主要是在延安时期形成的。因此，延安的经验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很大的。他在与邓子恢争论的过程中就曾多次引用延安时期的经验，并且批评邓子恢不注意党在历史上的经验。事实证明互助合作对于陕甘宁边区农业生产的发展的确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毛泽东据此得出合作化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的观点也是不难理解的。

邓子恢的经历与毛泽东很不相同。邓子恢从参加革命到出任农村工作部长一直在中国东南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工作和生活，这里的生产情况与陕甘宁边区大不一样。这一地区土地肥沃，人口稠密，生产技术比较先进，农业生产主要依靠长期以来形成的精耕细作的传统。在这里，生产过程中的分散管理有着更重要的意义，而互助合作的重要性则大为逊色。

首先，在这里传统的小型水利设施的兴修已无多大潜力（而这正是互助合作发挥作用的一个最重要的形式）。这里本来降雨量即比较充足，加之经过长期的开发，用简单的人力能修成的水利设施基本上都已修成。其次，东南地区的农民相对来讲比较富裕，生产工具的缺乏程度与西北地区相比不是很严重，一家一户也能应付。第三，这一地区荒地很少，不需要集中开垦。在已开垦的土地中，被水网割开的小块土地较多，比较适于个体农民分散劳动、管

理。集体种，效益不好。另外，与西北地区相比，这一地区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农民除经营农业外还经营其它副业，而这些副业更适于家庭经营。鉴于这些情况，邓子恢在农业生产中比较注意发挥个体生产积极性，应该说也是很自然的。

在 1955 年的争论中，比较值得注意的是陈云的观点。陈云没有直接参与争论，但他的观点客观上对这次争论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与毛泽东和邓子恢不同，陈云更多的是从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和粮食供应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的。

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是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建国后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重点主要是工业，对农业的投资很少，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又要求农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陈云认为，在不能大量投入资金的情况下，农业生产的发展只有依靠农业合作化。这点，1954 年他在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向中央的汇报提纲中说得很清楚。他说：“我们要完成农业计划是很吃力的，主要靠合作化。”“农业增产有三个办法：开荒，修水利，合作化”。“以开荒来说，新开垦五亿亩土地，可以收粮食八百亿到一千亿斤。但这甚至在十年内都难以做到，因为没有机器。”“以修水利来说。大型水利工程首先在北方。要是把淮河以北的水都蓄起来，可以灌溉两亿亩土地，即可以增加二百多亿斤粮食。这个工程是很大的，没有十年完不了。”“搞合作化，根据以往的经验，平均产量可以提高百分之十五到三十。”“并

且只有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各种增产措施才更容易见效。所以合作化是花钱少、收效快的增产办法。国家在财力上应该给予更多的支持。”^①。

陈云赞成加速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另一个原因是粮食问题。50年代初,由于工业的迅速发展和城镇居民的大量增加,粮食的供应出现了严重的困难。从1953年起,国家不得不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但统购统销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陈云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认为:“我们面对着这样为数众多的个体农户,在粮食的统购和统销方面是遇到了困难的”,“主要的是对这样众多的农户要估实产量,分清余缺及其数量,很不容易。”因此,他主张“应该积极而稳步地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把一亿一千万农户组织到生产合作社里来”,到那时,我们的统购统销工作就要“容易得多,合理得多”^②。

尽管陈云主要是从另外的观点来看这一问题,也没有直接参与争论,但他当时主管全国的财经工作,他的观点在党内影响很大,因此他的意见客观上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综上所述,1955年前后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邓子恢、陈云等党的老一辈革命家根据自己的经验对我国农业发展道路作出的不同探索。这些探索都包含了部分真

^{①②}《陈云文稿选编》(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3—225、253页。

理，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和毛泽东听不得不同意见，邓子恢的观点受到了错误的批评。此后，毛泽东在他的理论上进一步错误地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从而使我国的农业合作化陷入了更大的失误。需要指出的是，1955年的争论并未到此结束。人民公社化运动失利后，特别在是三年困难时期，邓子恢结合自己的经验在农村进行了大量的调查，提出了在农业生产中推广包产到户等形式的责任制的观点。这一时期，陈云经过调查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们的观点得到了刘少奇的支持，在党内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然而，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听不进不同意见，邓子恢再次受到严厉的批评，陈云和刘少奇也因此受到牵连，对这一问题的探索被迫中断，从而使一种新的，适合中国农村情况的生产方式的出现推迟了近20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遗憾。

三、通过比较、分析得出的几点看法

通过上述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看法：

(一)任何正确思想、理论的提出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党的领导人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注意集中集体的智慧。毛泽东固然伟大，但他个人的智慧毕竟是有限的；他的观点虽然也是通过实践得出的结论，但他的实践毕竟是局部的，有条件限制的。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他能够结合其他同志的经验、见解，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就要健康得多。

(二) 所谓集体智慧并不是各种不同思想的简单相加。各种不同的思想必须经过长期的交流、碰撞、甚至斗争，并且要经过反复的实践最后才能溶合为正确的思想。因此，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应当看作是正常的和有益的事，决不能把不同意见争论看作是不正常的和有害的，更不能以个人意志压制不同意见。另一方面，只要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就应该敢于坚持，即使一时受到不公正的批评，历史终会作出公正的评价。

(三) 毛泽东在领导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中确实有过失误，特别是人民公社化以后，错误比较严重，但我们不能因此完全否定他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思想，更不能简单地斥之为一种纯粹的乌托邦。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也是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包含了真理的成份，在一定时期确曾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合作化的一些优点，如便于进行农田水利建设，便于增加公共积累，便于推广新的技术等至今仍是我们应该加以注意的。

(四) 通过上述比较，我们也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农村实行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充分吸收了历史上各种思想的优点而形成的，符合我国的国情，应该长期坚持下去。同时，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也应该注意吸取各种新经验，从而使这一形式不断得到完善。

日本毛泽东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毕 剑 横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深受中国历史文化的影
响。在毛泽东研究方面，日本学者充分利用其地理、历史
和文化的有利条件，成立了学术研究和宣传机构，搜集整
理了大量文献情报资料，研究出版了大批学术论著。与国
外其它国家相比，日本的毛泽东研究规模大，学者众，成
果多，涉及面广。现仅就日本毛泽东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作
一概略的介绍。

日本毛泽东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抗日战争
时期。早在本世纪 30 到 40 年代，日本官方或准官方的调
查机构，为了其政治需要就开始系统搜集中国共产党的报
刊和文献，其中包括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著作和讲话。以
后又有一些学者从学术研究出发，专程来华搜集资料，搜
集了当时在各抗日根据地出的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和
毛泽东著作单行本。还有当时在华的一批日本共产党成员，
他们参加了“反战同盟”，反对日本侵华战争，支持中国人
民的抗日运动，有的还参加了“延安整风”，因而对毛泽东
的生平事业及其伟大思想，有着较为深刻系统的了解。他
们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回到日本，积极运用毛泽东思想指导

本国具体革命实践，从而使日本的进步人士接触到了毛泽东的著作。

毛泽东及其思想为日本广大人民特别是为其知识界所了解，则是在本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不仅公开发表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还从1951年起，相继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这些都很快被翻译成日文。此外，中国还出版了一些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宣传介绍性著作，使之在日本广大群众中，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接着，一些学者开始从事对毛泽东生平事业和思想的研究。最初出现的成果是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上。如1951年出版的由日本著名学者松村一人所著的《辩证法的发展》一书即对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卓有见地的学术观点。当时在对毛泽东生平事业的研究上有较大影响的论著，当推竹内好的《毛泽东评传》（载《中央公论》1951年4月号），该书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提出了独到见解。这一时期由于新中国的成立在日本产生了巨大影响，引起日本学术界的关注，相继成立了两个以研究现代中国为中心的学术团体：一是现代中国学会，出了《现代中国》会报；一是亚洲政经学会，办了《亚洲研究》季刊。它们在对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多方面的学术研讨活动和出版的研究丛书中，都涉及到对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的生平事业和思想的研究。

从 50 年代后期到 60 年代中期，日本的毛泽东研究又进一步活跃起来。从国际上看，这一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展开了大论战，中共连续发表了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若干原则问题，系统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这对日本政界和学术界人士都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使他们围绕毛泽东思想所展开的争论更趋活跃。从日本国内来看，这一时期日本经济有了迅猛发展，但随之而来也出现了若干严重的社会问题亟待解决，这也促使一批进步学者力图从研究毛泽东的思想中，来寻求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途径。基于上述历史背景，日本毛泽东研究活动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日本学术界一反以往研究中国不过多涉及现代的传统倾向，而注目于毛泽东及其思想与现实问题的研究。据初步统计，从战后特别是在这一时期，日本学术界对中国近现代人物研究的论著有 300 余篇（本），其中就有 80 余篇（本）是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占 1/4 强。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日本政界和学术界人士十分关注这一时期在毛泽东的中国所发生的两件大事：一是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一是大跃进运动。对于中苏之间的矛盾，特别是意识形态的冲突，日本前首相岸信介在其《十年回顾》（新潮社 1957 年版）中，已预见到这一分歧将会扩大而导致中苏关系的恶化，因而提出了日本的对策。中岛岭雄在《现代中国论——对意识形态与政治的深入考察》（青木书店 1964 年版）中，提出了“今天中国的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

义的思想格格不入”的看法，这形成了他后来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持否定态度的理论基础。对于大跃进运动，中岛岭雄在书中，从毛泽东思想史的角度，联系到1956年至1957年中国对斯大林的批评、“双百方针”的提出等，认为这是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的“转换期”，这一见解是令人深思的。石川滋则以其经济学家特有的眼光，在《中国资本的积累机构》和《中国经济的发展与不断摸索》（《世界》杂志1963年6月号）等文章中，一方面肯定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摸索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各国工业化过程最扎实最灵活的道路；另一方面则对大跃进中，中国发表的各种显然浮夸的数字，提出了质疑，同时又对美国某些学者武断认为中国经济行将崩溃的悲观论调，加以驳斥。其论述是比较客观公正的。

这一时期，日本还成立了亚洲经济研究所（1958年）该所创建初，就对毛泽东的中国的经济问题进行了研究，创办了《亚洲经济问题》月刊，《亚洲动向年报》，出版了《放眼亚洲》、《研究丛书》等。继而日本又成立了国际问题研究所（1960年），该所不仅出了大量研究成果，还整理出版了不少资料集，如《中国共产党资料集》12卷，《新中国资料集成》5卷，《中国大跃进政策的展开——资料与解说》等，其特点是刊用原版，并附有解题、文献年表及索引。这些，对研究毛泽东的思想颇有资料价值。

第二，大大拓宽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领域，不仅多角度、多侧面地对毛泽东思想的各个部分及其发展过程的

各个阶段进行深入探讨和系统研究，还特别着力于对其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进行探讨和研究。如著名学者新岛淳良于1966年问世的《毛泽东的哲学》，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作品。其它如对毛泽东的民族解放理论，也成为一时期日本毛泽东研究的重点之一。

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是中国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时期。中国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对日本的政治、思想和学术都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在政治上，中共和日共之间出现了对立，日共内部也出现了分裂，因而在思想和学术领域对毛泽东思想的争论也愈趋尖锐。这时日本出现了“新左翼运动”，形成了“三M热”。所谓“三M”，即马克思、毛泽东和马尔库塞（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三个英文名字的字头。“三M热”主要体现在青年学生中。当时许多大学都象中国一样，出现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小组”，学习和讨论毛泽东著作的气氛非常热烈，讨论的中心和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对“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性质、作用及其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认识和分歧上。支持“文革”并赞同其理论的人士认为，“文革”的起源是“干部不知不觉地踏上了过去旧官僚的足迹，而且干部长期占据同一领导职位，使人民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宫岛市定《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意义》，1968年）“文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继续。”（新岛淳良在现代回顾中国座谈会上的发言，载《中国研究月报》第421号）“文革”的历史作用是“想把辛亥革命没有完成的

部分现在来完成。”（吉川幸次郎“关于传统与反抗”的发言，载《旧体制的中国》，1967年）反对“文革”并否定其理论的人士则认为，“文革”起源于“党中央对大跃进政策评价的意见分歧。”（德田教之《毛泽东主义的政治力学》，1977年）“是继1958年末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出现的第三次冒进。”（卫藤沈吉等《中国革命中的稳步与激进》，载《中央公论》1967年7月号）“文革”的性质是“是毛、刘两个最高层权力集团的对立。”（见《中国研究》季刊第6号上中岛岭雄文）“文革”的作用是一场“破坏运动”，是一次“碎石革命”。（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等批判“文化大革命”的联合声明），这一期间日本还发表了一批把“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思想”联系起来加以研究的论著，如高桥勇治的《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思想》（1973年）、中西功的《中国革命与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史的重新探讨》（1969年）等。但无论是支持或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及其理论基础的两派日本学者，他们都遇到这样一个“两难”问题：否定“文革”和批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则导致贬低和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结论；坚持和捍卫毛泽东思想，又无法解释毛泽东晚年关于在“文革”的理论和实践上的严重失误。因而在思想理论上陷入混乱，甚至在青年中还产生过“武斗”。

为了澄清思想理论上的严重混乱，正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特别是为了正确的认识和评价毛泽东思想，日本毛泽东研究学者从纵横交错的角度，全方位、多侧面地研究

毛泽东及其思想。从纵的方面分析毛泽东思想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揭示其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从横的方面，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相互联系，揭示毛泽东思想的内在本质，力图从总体上完整地把握毛泽东思想。正是在这一广泛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在60年至70年代，日本涌现出一批毛泽东研究者，出版了一批学术论著，主要有：

新岛淳良：《毛泽东的哲学》（1966年）

松村一人：《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意义》（1967年）

中西功：《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1969年）

永野英身：《毛泽东二十年代的思想》（1977年）

加地伸行：《中国人的逻辑——从诸子百家到毛泽东》（1977年）

竹内实：《毛泽东笔记》（1978年）

野村浩一：《毛泽东》（1978年）

城野宏：《中国学原理》（1978年）

新岛淳良：《我的毛泽东研究》（1979年）

今城堀二：《中国革命与〈毛泽东选集〉》（1979年）

这些论著虽然有一部分是在1976年中国“文革”结束后出版的，但大都是写作于“文革”期间。

70年代末到80年代，由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中国在恢复毛泽东思想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上，把全党工作的重点，真正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始了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这历史的大转折关头，日本一些受到“文革”影响较深的毛泽东研究学者，始则感到震惊和不解，陷入了惶遽矛盾状态；继则进行了深沉的反思，重新审视自己以往研究的思路。尤其是对于如何根据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并把它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区别开来的问题，作了认真的思考。这当然也就涉及到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对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剖析；更触及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新情况的了解，并将这一时期的理论和实践与其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发展关系进行比较研究。为此，日本学者抓住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有利时机，来华进行或长或短的实地观察，单独或合作进行研究。他们充分利用这一时期中国对资料情报扩大开放，新出版了一批有关毛泽东的各类著作和研究成果这一有利条件，对毛泽东的著作及有关中国学者的研究性论著进行了广泛搜集和认真钻研。他们还把注意力放在研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上，研究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的著作和讲话，研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开始写出一些独立或合作研究的新成果。如天儿慧的《中国改革第一

线——邓小平政治的展望》(1988年)、小岛朋之的《中国的政治社会——探索邓小平以后》(1986年)、《不断变化的中国政治社会——转折时期的矛盾与摩擦》(1988年)、《中国的动向》(《东亚》月刊1988年5月起连载)、石田浩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研究》(1988年)、《对中国农村的变化分析——从解放前到现在的传统农村实况》(1987年)等。以鹤见和子为首的一批日本学者还与中国学者费孝通合作,在中国江苏南部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关于中国“小城镇”建设的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日本出版了《岩波现代中国讲座》,书中发表的讲稿和文章表明,日本学者已运用社会学、人类文化学、民族学等多种方法,把研究的焦点,集中在邓小平时代变动着的中国社会上,说明日本学者对“中国学”的研究,更贴近于现实这一显著特点。与此同时,日本学者对自己过去有关毛泽东研究的论著,进行了系统的清理,对其中一些错误观点作了反思。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80年代以来,从表面上看,日本关于毛泽东研究的成果数量虽然下降,出版的毛泽东研究著述有所减少,比起60到70年代“三M热”时期,毛泽东研究明显降温,但实际上却是向深层次发展,正酝酿准备着又一次毛泽东研究高潮。

90年代以来,尽管由于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剧变,苏联这个世界上最早的社会主义国家迅速解体,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逆转,但只要11亿中国人民始终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并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迈步前进，那末，东邻日本在中国的影响下，其关于毛泽东和“中国学”的研究不仅不会中断，还会在新的基础上继续开展，并不断取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实际上日本在进入90年代前后，已陆续发表和出版了一些关于毛泽东事业和思想新发展与当代中国的新著，如：

竹内实：《毛泽东》（1989年）

知欠晋：《文化大革命》（1989年）

野村浩一：《现代中国的政治世界》（1989年）

宇野重昭：《平稳的社会变动》（1989年）

小岛晋治：《历史与现代化》（1989年）

天儿慧：《彷徨中的中国》（1989年）

毛里和子：《毛泽东时代的中国》（1990年）

平松茂雄：《邓小平的军事改革》（1990年）

小岛朋之：《在歧路上徘徊的中国》（1990年）

野村浩一：《近代中国的思想世界》（1990年）

加加美光行：《现代中国的黎明》（199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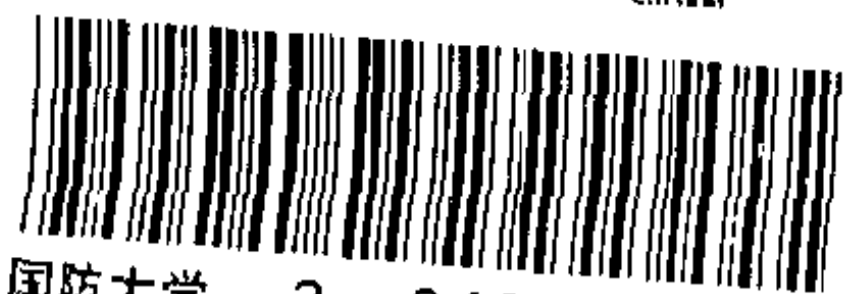
中岛岭雄：《何谓中国革命》（1990年）

天儿慧：《中国现代化的调查记录》（1990年）

山内一男等：《中国经济的新局面》（1990年）

上野秀夫：《中国与世界经济》（1990年）

从近年来的这些新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学者已把毛泽东研究的重点，放在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



国防大学 2 060 1181 2

设新时期,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继承发展的比较研究上,并从搜集到的最新信息和资料中,概括提炼出自己的学术观点,这在日本的毛泽东研究领域,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中共党史资料 第四十八辑

作者 =

页数 = 2 5 0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